

# 甘肃史志



2015.2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传达学习全国会议精神 总结交流经验 安排部署今后工作

## 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



5月11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由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张正锋主持,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夏红民作了重要讲话,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作工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森出席会议。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钱旭、李振宇、孙奇明,各市政府分管领导、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省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分管修志工作领导及修志机构负责人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今年四月份在合肥召开的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会议精神,回顾总结了两年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安排部署2015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任务。武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白银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省检察院和省地税局修志机构负责同志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 大与小

钱 旭

再大的江湖  
对每一滴雨水,都不相拒  
没有天雨,何来地水?  
江湖的美丽,是由无数水滴  
汇集的

再大的草原  
对每一根小草,都很珍惜  
没有小草,何成草地?  
草原的美丽,是由无数小草  
编织的

再大的森林  
对每一片叶芽,都不放弃  
没有叶芽,何以为绿?  
森林的美丽,是由无数叶芽  
装点的

再大的国家  
对每一位百姓,都要尊贵  
没有百姓,何谈国立?  
国家的美丽,是由无数百姓  
建成的



# 甘肃史志

季刊

2015年第2期  
(总第22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 卷首语

大与小 .....钱旭(1)

## 领导讲话

认真落实“一纳入、八到位”

大力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会议上的报告……王伟光(4)

开拓创新,顺势前进,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新局面

——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李培林(13)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夏红民(18)

依法推进 强化落实 奋力书写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李虎(20)

## 乡土民情

秦人、白马氏与乞巧风俗

——以甘肃陇南西汉水上游“跳麻姐姐”为个例考述

.....彭战荻(25)

高台县乐善忠义班秦腔发源及其传承 .....王兴和(37)

简述政教合一的卓尼土司制度及其演变

.....闹尔东主(38)

# 录

## 陇原春秋

- 风雨沧桑说小屯 .....牛学伟(43)
- 武威会馆考述 .....宋立彬(44)
- 明清民国时期定西的工业和商业 .....张 慧(49)
- 董振堂三出三进高台城 .....银开源(50)
- 《韩正卿日记》介绍 .....张志纯(51)

## 地情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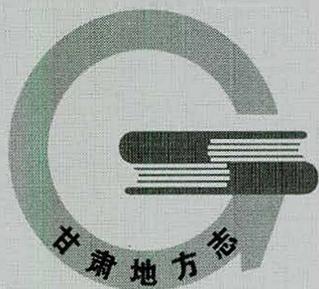
- 再述汉晋金城故址 .....薛方昱(57)
- 论地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  
——以兰州市军事地名为例 .....张庆祎(61)

## 经验交流

- 《庆阳市志(1986—2010)》基本内容  
的归属范畴及层次辨析 .....张芹鹤(66)

## 志苑随笔

- 战争与水 .....车安宁(71)
- 鉴真成功东渡地寻踪 .....俞慧军(74)
- 古寺古台忆古人 .....程对山(76)



##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张正龙 李拾良  
贺红梅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 期 责 编:高天成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 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 认真落实“一纳入、八到位” 大力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2015年4月17日)

王伟光

现在,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就2014年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2014年,是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地方志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2月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将史志编修工作提升至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12月,在澳门大学考察时,向学校赠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书籍,充分体现了对地方志工作的厚爱和对志书价值的肯定。李克强总理4月就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召开专门作出重要批示,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11月,就《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再次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志书总结的汶川抗震救灾经验,对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刘延东副总理4月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11月,就指导小组上报的《当前全国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情况报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住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好形势,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地方志事业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重要讲话、重要批示,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为地方志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 一、2014年主要工作回顾

一年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成功召开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地方志事业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大力推进《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拟订和报批工作,科学绘就发展蓝图;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努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做好《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凸显方志的存史资政价值;积极推进国家经济欠发达地区志书出版资助工程、中国地方志精品工程和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全力打造全国地方志专业出版基地,确保二轮修志任务高质量完成;重点依托中国地方志学会和《中国地方志》期刊,全面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和学科地位;着力抓好指导小组办公室制度建设,逐步实施国家方志馆改造工程,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和工作水平。总体来看,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始终围绕地方志事业发展实际和需要,积极作为,推进工作,但依然重任在肩,还需继续努力。

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其中,以下方面成绩显著:

(一)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扎实到位。全国各地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重要批示、重要讲话精神 and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行动

快、范围广、领悟深、效果好。黑龙江、山东、陕西、新疆等省区政府领导作出批示,大力支持地方志工作。辽宁、吉林、山东、湖南、宁夏等省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省领导出席讲话,传达贯彻精神,总结部署工作。天津、福建、湖北、四川等省市由政府出台文件,推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二)修志工作取得新进展。二轮修志再结硕果。全国二轮志书规划 5900 多部,2014 年出版 350 多部,累计出版 1900 多部。广东省全面完成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吉林、上海、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宁夏等省区市,二轮市县两级志书编修任务完成过半,其中个别省区今年明年内可全面完成。吉林、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宁夏等省区,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修任务完成过半。西藏自治区借兄弟省市修志援藏东风,修志进度加快。

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编修丰富多样。一年来,出版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 540 多部,累计出版 23000 多部。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湖北、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市以风景名胜、特色风俗、地方特产、重要工程或重大事件为内容,编纂出版了各具风格的专题志。

乡镇志、村志编修有序展开。一年来,出版乡镇志、村志 210 多部,累计出版 4300 多部。山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制定《关于做好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意见》,推动全省有条件的乡镇村开展修志工作。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做好乡镇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启动全省乡镇志编纂工作。山西、湖南、陕西等省通过编纂乡镇村简志,引导全省乡镇村志编纂工作。

志书质量建设稳步推进。各地十分重视志书质量,通过严格志稿评议、审查验收、质量评估等制度,采取制定编纂规范、编写编纂手册、建立评审专家库、开展质量建设年、举办优秀志书评比活动等措施,千方百计提高志书编纂质量。

(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一年来,全国新创刊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 390 多种,编纂出版 2300 多种。北京、上海、安徽、

广东等省市实现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吉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市地方综合年鉴覆盖率达 80% 以上。《上海年鉴》《江苏年鉴》英文版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地加大指导和规范年鉴编纂的力度,采用集中审读、逐级审查等方式,不断提升年鉴时效性和编纂质量。

(四)旧志整理工作整体推进。一年来,上海市、江苏省、四川省分别开展《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四川历代方志集成》整理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果。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分别启动《黑龙江旧志》《山东历代方志集成》《河南历代方志集成》《陕西历代旧志文库》整理工程。截至年底,全国地方志系统整理出版旧志累计 2400 多部;广东省率先整体完成全省旧志整理工作。

(五)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稳步开展。网、库建设水平逐步提升。一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新建网站、网页 150 个,累计建设网站、网页 1000 多个。山东、广东等省实现地情网省市县三级全覆盖。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省区实现地情网省市两级全覆盖。吉林、江苏、广东、广西等省区利用移动网络,为社会公众提供读志用志服务。各地加快志书、年鉴、地情资料等地方志成果数字化速度,不断完善地情资源数据库。

方志馆建设步伐坚实。一年来,全国新建省级方志馆 2 个、市县级方志馆 49 个,累计建成方志馆 370 多个。河北、山西、福建、广东、海南、四川、青海等地的省级方志馆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运行中的北京、吉林、黑龙江、江苏、江西、山东等省级方志馆,不断丰富馆藏,向社会公众开放,展示地情、提供服务。

(六)服务中心工作成效明显。一年来,北京、山西、辽宁、上海、安徽、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方志工作机构深入开展地情研究,编辑资政刊物,编写志书干部读本或地情书籍,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海南省史志办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联合开展“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解放军、武警部队史志机

构积极服务国防建设。各地积极参与规划编制、旅游开发、教育研究、环境治理、人口控制、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北京、内蒙古、江苏、安徽、甘肃等省区市依托地方志资料,与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合作,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宣传地方历史文化。

(七)地方志理论研究收获新成果。各地通过举办学术年会、理论研讨会或方志论坛,设立地方志研究课题,组织优秀论文评选,编辑出版论文集,努力推动地方志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和管理工作研究。一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志鉴论文100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40多部。

(八)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实施力度加大。一年来,北京市将以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编纂许可,纳入政府行政审批目录清单。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与省人大联合召开座谈会,编委会机关执法人员申领执法监督证,规范依法行政活动。江苏省、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分别下发通报,对二轮市县志编修进行督察。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与省委督察室、省政府督察室,联合对二轮省志编纂工作开展督察。福建省地方志系统联合开展地方志法规宣传月活动,营造依法治志的社会氛围。

(九)地方志队伍建设日益加强。一年来,各地不断完善学习制度,拓展学习方式,通过专题培训、举办讲座、与高校联合办学、出国出境考察学习,提高地方志机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改善队伍知识结构。通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如浙江省在全省开展“最美方志人”宣传教育活动,云南省对从事地方志工作30周年的人员进行表彰,激发队伍干事创业的热情。

一年来,全国地方志工作成绩令人振奋。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离不开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强力推动,离不开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帮助和积极参与,离不开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精心筹划和艰苦奋斗。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国地方志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敬意!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地方志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地方志事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特别是基层地方志工作基础普遍较为薄弱;部分地区和部门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法规规章落实不到位,机构不健全,编制、人员和经费不到位;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结构不尽合理,创新意识不够,素质亟待提高;二轮省志编修速度缓慢,年鉴编纂管理体制还未彻底理顺;理论研究水平整体不高,学科建设亟需加强,等等。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有重点、有步骤地努力加以解决。

## 二、当前地方志工作的总体要求

当前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and 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重要批示、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以及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工作部署,切实做到“一纳入、八到位”,即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坚持依法治志,狠抓质量建设、理论建设、队伍建设,为构建以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打好基础,大力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国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大好的时代氛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地方志事业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发展再上新台阶,永葆春天气

息,关键是贯彻落实好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概括地讲,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灵魂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重要批示、重要讲话精神,总体要求就是做到“一纳入、八到位”。

“一纳入、八到位”是刘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明确提出来,并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中作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基本经验加以强调的。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深入领会其重要意义,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在实际工作中抓好全面落实。

(一)充分认识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重要意义

要增强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就必须深刻认识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重要意义。

一要从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高度,深刻认识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重要讲话、重要批示,明确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希望地方志事业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更大作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了到2020年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部署了今后五年地方志工作的主要任务。贯彻落实好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头绪多、任务重。必须抓住“一纳入、八到位”这个“牛鼻子”,才能理清思路,明确目标,才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干成什么样。也只有抓住这个“牛鼻子”,才能抓好落实,才知道缺项在哪,困难在哪,办法在哪。

二要从建设法治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角度,深刻认识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重要意

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地方志工作来讲,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着力点,就是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具体体现就是切实做到“一纳入、八到位”。《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责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以及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地方志工作的权利义务。“一纳入、八到位”工作要求与《地方志工作条例》在精神实质上是高度一致的,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各项规定的总体凝练和深化。认真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具体行动,也是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必然要求。

三要从争取党委政府更大支持、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层面,深刻认识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重要意义。“一纳入、八到位”是从地方志事业发展现实需要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提出来的,是对解决好地方志工作具有普遍性、关键性的高度概括,切中实际,具体明确。要真正重视地方志工作和切实解决有关困难,就必须按照“一纳入、八到位”的基本要求,逐条逐项落到实处。我们在调研地方志工作中发现,凡是对“一纳入、八到位”贯彻落实得力的地方,党委政府就重视,机构就健全,制度就规范,人财物就有保障,实际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成果就显著,工作也就生机勃勃;凡是“一纳入、八到位”贯彻落实不得力的地方,工作就比较滞后,甚至机构都不健全。因此,“一纳入、八到位”的落实情况,直接影响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水平,是检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是否重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标准。

(二)抓实抓好“一纳入、八到位”的全面落实

全面落实“一纳入、八到位”工作要求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必须坚持全局视野、问题导向、创新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一要准确把握“一纳入、八到位”的精神实

质。“一纳入、八到位”，表述虽短，但内涵极其丰富，既有目标，又有要求；既有对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又有对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的要求；既有对事业发展的全局规划，又有开展工作的重点举措。既是对修志经验的新总结、修志规律的新认识，对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的新把握、发展难题的新判断，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和地方志事业改革创新的新适应。既体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担当，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思考和谋划，也体现了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精髓和全面要求。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牢牢把握，惟其如此，才会产生出全面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要努力提升“一纳入、八到位”的影响力。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地方志工作机构对“一纳入、八到位”的认知程度、知晓范围，直接影响着落实情况。要搞好全员培训，使地方志工作者尽快认识、全面掌握“一纳入、八到位”工作要求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做到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采取多种手段，持续广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期望、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制定实施的新动态、地方志工作机构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新举措、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绩、地方志工作者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新事迹，使社会各界了解“一纳入、八到位”工作要求，了解地方志工作和方志文化。尤其是，要主动向各级领导请示汇报“一纳入、八到位”落实中的相关问题，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实践证明，对“一纳入、八到位”宣传普及工作做得越好，地方志工作开展就会越顺利。

三要大力弘扬方志人精神。毛泽东同志曾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做好人的工作，关键在不断提高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地方志工作是坐“冷板凳”，但是方志人要有热心肠，要热爱地方志事业，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更要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要以极高的事业心，使“冷部门”热火起来。要明确什么是地方志工作、什么是地方志事业、为什么从事地方志工作以及从事地方志工作的意义、地方志事业发展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等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就不怕坐“冷板凳”，就能坐得住“冷板凳”，就能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献身地方志事业，忠实记录历史，多出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修志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智慧，为未来发展服务，也才能以有为谋有位，争取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真正落实“一纳入、八到位”。

四要积极推进依法治志。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注重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思考谋划“一纳入、八到位”的贯彻落实。要建立健全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主体、地方法规规章相配套的完备体系，争取地方志工作进一步立法，坚持依法修志、用志、管志。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化依法对地方志工作进行督察，发现有落实不到位的，就依法补齐补强，纠正执行不力和违法行为。要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依法履行领导职责、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组织实施和管理、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支持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工作格局，切实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事实上，我们只有举起依法治志的大旗，运用好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我们的话语才会更有力度，腰板才会更硬气，宣传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才会更有底气。

五要切实干出成效。做工作贵在抓实，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任务一经确定，要求一旦提出，就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推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首先，希望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刘延东副总理提出的“一纳入、八到位”总要求，严格执行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确保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做好人、财、物等方面的保障；确保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与其有效履行职能、顺利开展工

作的要求相适应；确保解决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遇到的实际困难，为他们全身心投入地方志事业创造良好条件和优质环境。

其次，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围绕“为谁修志、修什么志、怎样修志”这一根本问题，坚持正确方向、履职尽责、真抓实干，以修志编鉴为基础，统筹兼顾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等工作。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参与的工作机制，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发展合力，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脚踏实地把切实可行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努力实现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再次，真正落实“一纳入、八到位”，要充分认识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统筹兼顾、全面落实，不能取其一面、不及其余。“一纳入”，就是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这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地方志工作的具体体现，也是保证地方志事业持续繁荣的必要条件。“八到位”中，认识到位是前提。只有认识到位，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者自重自爱，有干事创业的激情，工作才能打开局面。领导到位是关键。只有党委政府重视，地方志机构领导高度负责，有政策支持，才能解决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人员待遇、队伍稳定等问题，事业才能快速发展。机构到位是基础。只有设立专门固定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才有依托，事业发展才有稳固的根基。编制到位是基本。地方志编修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保证人员编制，配齐配强队伍，才能更好地干事创业。经费到位是保障。有充足的经费投入，事业发展才有保障，才能拥有强劲不竭的发展动力。设施到位是保证。办公用房、方志馆、数据库等设施设备是修志编鉴和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宝藏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完备，才能更好地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才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界的文化需求。规划到位是指针。制定出科学、有前瞻性的规划，才能避免工作盲目性和随意性，才能保证事业发

展健康有序前行。工作到位是目的。只有把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努力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方志文化成果，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才会增强，社会地位才能提高，才能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多关心和更大支持。总之，“一纳入、八到位”只有全部落实、齐头并进，才能有力促进地方志事业的繁荣发展。

### 三、下一步主要工作部署

下一步要着力完成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精神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首要任务仍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重要批示、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精神。要通过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研讨与专题辅导相结合等方式，开展主题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通过学习，增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热爱地方志事业、献身地方志事业、干好地方志事业的决心与信心；培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担得起使命的意志品质。通过学习，确保充分认识到地方志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到做好地方志事业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毫不动摇地做到地方志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坚持修志主线，努力编修优秀方志成果

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实施好国家经济欠发达地区志书出版资助工程，推动各地二轮修志工作协调发展。开展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策划好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继续加大对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推

进国家精品志书工程,建设全国地方志专业出版基地,努力推出一批优秀志书。做好《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出版及经验总结工作,开好志书首发式,提升地方志工作在全社会的影响力。认真组织有关学科专家学者,与相关部门机构沟通联系,开展中华一统志编修可行性研究。

要加快推进二轮修志工作。二轮修志已进入攻坚期和收获期,规划任务已经完成的地区,要认真总结首轮、二轮修志经验教训,做好三轮修志启动前的准备工作;规划任务未完成的地区,应倒排工期,尤其是省级志书编纂要制定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确保按时完成任务。继续做好二轮修志试点总结工作,为顺利启动三轮修志工作提供借鉴。加强与香港、澳门地区及台湾地区史志编修机构的联系交流。继续鼓励、规范、指导社会力量参与修志,提升修志的社会关注度、参与度。

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开展质量建设的好思路好做法,创新志书评议和审查制度,将精品意识贯穿于志书编纂出版的全过程,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名志佳作。

(三)继续做好年鉴工作,创造更多更优秀的年鉴精品

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着手制定《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管理规定》,完善年鉴工作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建立健全年鉴编纂评议机制,逐步推广年鉴出版前的审读制度。开展全国年鉴质量建设试点工作,推介先进编纂经验。适时启动国家精品年鉴工程,努力推出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年鉴。充分发挥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和各地年鉴社会团体的作用,推动年鉴理论研究。继续办好《中国地方志年鉴》,更好地为保存地方志工作文献、交流地方志工作信息发挥作用。

各地要继续高度重视年鉴工作。没有理顺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管理体制的地区,要严格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争取本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做好县级地方综合年鉴启动工作,努力扩大本地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覆盖面。密切与专业年鉴编

纂机构的联系,加强对专业年鉴编纂的业务指导。

(四)大力加强资料建设,推进地方志资料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要进一步加大依法征集地方志资料的力度,建立地方志资料收集、保存、管理、使用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规范资料年报工作,提高年报资料质量。进一步运用社会调查、口述史等方法,大力拓展资料搜集范围和渠道。探索建立专题培训和研讨制度,培养一批地方志资料搜集、研究方面的人才。继续鼓励对资料建设进行探索,逐步建立能够全方位适应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需要的地方志资料保障机制。

(五)积极推进旧志整理工作,保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更大支持,有计划、高质量地集中整理本地历代方志。要多方收集留存的旧志孤本、善本,花大力气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要分类整理旧志资料,做到古为今用。要加强与海外藏书机构的联系,积极稳妥地开展海外藏中国旧志的引进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要继续做好中国地方志善本数字化项目,积极推动旧志数字化建设。

(六)加大对地方志工作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更好地发挥网、库、馆的平台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指导小组办公室要进一步做好中国方志网建设,稳步推进中国方志网与各省方志网联网工作。各地要积极推进省、市、县三级地情网站改造升级和联网工作,加快地方志成果数字化进程和数据库建设,逐步实现全国方志资源共享。

要进一步推进方志馆建设。认真谋划国家方志馆建设工作,加大馆藏图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力度,争取早日正式开馆。已建成开放的各地方志馆,要积极开展收藏、借阅、展示、交流、咨询、研究等基础工作,逐步将方志馆建成地方志和地情资料收藏展示中心、地情研究咨询中心、地方文化对外交流中心,建成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基地。科学推动数字方志馆建设,为实现方志馆资源共享打好

基础。

(七)高度重视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添砖加瓦

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适时启动以《中国地情报告》为主体、《中国方志发展报告》《中国年鉴发展报告》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地方志文化工程,发挥地方志资源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加强与各类媒体的合作,加大对地方志工作、地情信息和方志文化、地域文化的宣传力度,满足社会各界对方志文化资源的需求。继续编辑信息简报、编写地方史和地情书籍、开展专题研究,为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提供服务。大力推动地方志成果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发挥地方志资源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八)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要深化地方志理论研究。继续加强方志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等学科的关联性研究,积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充分发挥中国地方志学会的平台作用,做好学会及其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换届工作,办好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中国地方志学会城市区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和方志论坛。认真组织优秀方志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不断加强对方志期刊工作的指导,大力推进《中国地方志》名刊建设。

要逐步构建较为科学的方志学学科体系。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研究制订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增强方志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组织编写方志学、年鉴学通用教材,编制年度方志论文索引,撰写研究综述,完成《方志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争取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力争设立方志学专业,招收、培养方志学研究生。争取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培养方志学高端人才,提升方志学的学科地位。

(九)深入推进依法治志,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志,完善地方志法规规章体系。没有制定或正在制定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地方,要力争早日出台;已经出台的,要抓好贯彻落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立法可行性研究,提高地方志工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推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建立健全与法规规章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推动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贯彻落实。继续做好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宣传工作,加大普法力度,营造依法治志的良好社会环境。

(十)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全国地方志工作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定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对地方志工作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指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工作运行机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统计工作,办好《中国方志通讯》,发挥好指导小组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履职尽责,抓好各项工作的督促落实,及时协调解决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十一)努力做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工作,科学谋划地方志事业发展

目前,《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正在履行报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程序,要按照刘延东副总理重要批示精神,积极争取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一旦出台,各地要根据规划纲要的要求,抓紧抓好贯彻落实工作,并制定相应的地方发展规划。各地要继续争取本地党委政府支持,系统总结本地区“十二五”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认真制定“十三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并争取以政府名义印发或转发。同时,争取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任务之中。

还需要强调的是,地方志工作已被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优工程建设之中,与社科院报刊



# 开拓创新,乘势前进, 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

——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2015年4月17日)

李培林

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马上就要闭幕了。下面,我对会议作简要总结。

## 一、关于会议的总体评价

此次会议,既是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后召开的首次年度工作会议,对于今后更好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会议达到了总结经验、交流思想,探讨问题、推进工作,分析形势、明确任务的预期目的,是一次成功的年度工作会议。具体体现在:

第一,会议得到高度重视。此次会议从筹备阶段开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就对开好会议提出了要求。今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到会并作了很重要、很全面的工作报告。会前,安徽省省长王学军专门就此次会议的筹备作出批示;会议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学军会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就会议情况进行座谈交流,副省长谢广祥到会致辞。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是此次会议成功举办和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保障。

第二,会议准备工作充分。一是会议筹划较早。早在2014年1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就此次会议何时开、如何开等事宜进行过研究,并向指导小组领导作了专题汇报。二是会议材料内容丰富。此次会议经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积极准备,共形成了包括伟光同志的工

作报告在内的6个会议材料。这些会议材料内涵丰富、全面,质量较高,是会议成功召开的重要基础。三是深入开展调研。为开好此次会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于2015年1~2月,组成西南、西北、华东、海南4个调研组,分赴有关地方深入了解当前地方志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撰写出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都已吸纳到伟光同志的工作报告中。四是会议从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完善。会议的名称由“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改为“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会议名称更加科学规范,会议召开的目的、作用和定位更加明确,就是要按照工作会议的模式召开,相应的领导讲话内容也依照工作报告的形式拟定。

第三,会议内容丰富。这次会议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时间,但内容非常丰富。今天上午伟光同志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工作报告;今天下午与会代表围绕伟光同志的工作报告、此次会议主题以及各省的交流材料等,进行广泛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表示,会议开得很及时,是一次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研究新情况、提出新举措的重要会议。伟光同志的工作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点面结合,针对性强,对工作成绩的总结实事求是,对存在问题的分析透彻深刻,对形势的判断客观准确,对任务的部署清晰明确。工作报告体现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具体要求,所提出的工作任务和

具体要求,对做好今年地方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会代表结合本地区的工作,就工作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了广泛交流,对进一步做好今年乃至今后的地方志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会议还为陈强、刘淑坤、葛向勇三位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充分肯定了他们为地方志事业所作的贡献。

## 二、关于进一步做好2015年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

同志们,2015年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重要讲话、重要批示,以及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全力推动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十分重要的一年。下面,围绕伟光同志的讲话精神,结合大家的学习、讨论情况,我就进一步做好2015年地方志工作再谈几点意见。

第一,着力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开会不是目的,关键在于狠抓落实、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解决地方志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上来,一项一项地抓,一件一件地干,一个一个地落实,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在已有基础上有所推进、有所发展。一是要及时汇报、传达会议精神。大家回去后,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领导汇报此次会议的精神,重点是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讲话、批示精神,以及伟光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等。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此次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实质,尽快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传达给每一位地方志工作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此次会议的工作部署上来。二是要结合本地实际,做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根据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贯彻落实措施。要及时发现本地区地方志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拿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有必要,要及时上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三是从明年开始,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

议争取提前召开,希望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每年年底时,尽早尽快将当年的工作总结、来年的工作打算等材料,报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便能提前做好会议筹备工作。

第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志,加快第二轮修志工作步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是新常态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依法治志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地方志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各级地方志工作者要把地方志法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让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始终贯穿地方志工作的修志、用志、传志、管志全过程,不断提升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真正做到依法治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修志编鉴,是《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一项神圣职责,而地方政府负有主体责任。要向地方政府说明,国家建立修志队伍,配备专门的编制,列出专门的财政预算,就是要完成这项法定任务。所以第二轮修志工作,不是一项可完成可不完成的工作,而是按照法规规定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当前,我们要加快第二轮修志工作步伐,力争2018年基本完成。之所以将目标定在2018年,主要是考虑到要把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步。2017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按照惯例,十九大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总结,而且要提出2020年以后的奋斗目标。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要为第三轮修志做准备,2018年就应该对第二轮修志做总结,不可能等到2020年,到那个时候再去总结就来不及了。当然,我们还加了一个比较有伸缩性的词叫“基本完成”,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前,各地的修志进度差异比较大。广东省是率先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的省份,还有几个省如果进展顺利,明年年底可以完成,2017年多数省或2018年绝大多数省都能基本完成。但是还有一些省按照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完成,这就要重

点研究一下,这些省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不可能对各省具体的修志工作全部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现在设立了一个工程叫国家经济欠发达地区志书出版资助工程,但这只涉及志书出版方面,下一步可以把这个资助计划稍微扩展,就是不仅仅涉及出版方面的援助。这次会议结束后,中指办要先进行调研,特别了解一下现在广东、北京等省(直辖市)的援藏计划是不是已经支持了一部分,还要了解一下新疆、西藏到底还有多少个县可能无法按期完成修志任务,调研之后可以开个协调会,看看地方志系统有多少力量可以投入援助计划。从目前来看,可能地方志系统也没有力量把这些后进地区的修志工作全包下来,但是西藏、新疆一些历史上没有修过志的县不能再没有志书,这涉及我们的边疆、我们的国土。此外,海南省是否可以编《三沙市志》,也要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修志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等,有没有可能一个省分别援助两个地区,先作为中指组的一项任务,然后各省地方志办公室再向省政府汇报,争取省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开展援助工作也是对队伍的训练,特别是像广东省,离2020年还有5年时间,很多市县修志工作已经完成了,也可以拿出一定的时间先把这项工作做起来。

总的来说,第二轮修志一定要超过首轮修志。当然,我们还要讲另一句话,速度要服从质量。中指办还设立了另一个工程,叫中国地方志精品工程,今年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2018年以后要全面启动中国地方志精品志书的评定,到时候各省精品志书能有几本,那就考验各省修志的质量了。所以,从中指办来说,要拿出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原来我们提出每季度要通报一次修志情况,如果觉得情况变化不大,那么至少半年,需要全部通报一下修志进度。要形成一个倒逼机制,中指组按照这个时间表、路线图来确定怎样推进第二轮修志工作。加快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这个要求一定要落实,这不是说想不想干的事,而是必须干的事。

在加快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的同时,还需要

抓好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督察工作。督察是《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法定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督察就没有落实,没有督察就没有深化。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作出的各项工作部署,不是只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个时期,至少是五年,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每年都要考虑如何深化的问题。督察工作就要围绕工作部署,督促检查各项工作实施的进展情况,工作还有哪些不平衡和滞后的现象,还存在什么困难需要解决,还有什么难题需要破解,等等。做好督察工作,其中的重点是由谁来督察。一方面是中指组要加强督察,有的省如果进展太慢,中指组就要直接函告地方政府,讲明该省修志工作按照依法治志的要求没有完成任务,促请当地政府加大领导力度。当然,事先我们也要和地方志工作机构沟通。另一方面是由省政府办公厅或者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进行督察,前者的力度可能更大些。如果做不到的话,可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督察,也有一定的力度。第二轮修志工作部署以后,完成什么样都不管,那是不行的,要有一定的抓手,有一定力度来保证完成目标。

第三,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把修志工作向乡镇志、村志、乡规民约、家谱、家训、民间书信文书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强调了创新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从伟光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看出,2015年地方志工作任务很多也很重,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观念、思路、模式做工作,是很难完成今年工作任务的。创新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前进、突破,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工作思路、发展模式的修正、调整。因此,全国地方志系统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树立勇于创新、不断创新的精气神,努力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突破、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工作上不断有新举措。

第二轮修志是我们的法定职责,编修乡镇村志、发掘乡土文化资源是我们的自选动作。这个自选动作,是大势所趋。现在中指办已经在财政部立了一个项目,叫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这套乡镇

志,不能像省、市、县三级志书那样,编成很厚的一大本,要限定字数,一本大约三四十万字,图文并茂。希望这种志书摆放在一些旅游景点,能够有人乐意自己拿钱去买,闲暇之余愿意看一看,而不要搞得志书编好以后,我们自己都不愿从头再看一遍。今年中指办将推出第一批,如果这个工程能成功,中指办很快就会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对此作了强调。据我了解,福建省编了一本《福建家训》,发行了几万册,影响很大。目前,中指办正在编纂《中华家训精编100则》,字数15万字左右。之所以编这么薄,就是要便于推行。《中华家训精编100则》包括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家训,也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些家训。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地方志工作,像收集整理乡规民约、民间书信等。

第四,实现中国地情网全国联网,扩大地方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几年大力推进名优工程建设,目前是“七名”工程,包括名刊、名报、名社、名馆、名网、名库,还有学术评价中心。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议在国家方志馆召开,会议决定把地方志纳入名优工程建设,叫名志,“七名”工程就变成了“八名”工程。首先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拿出一笔经费,搭建中国地情网的全国平台。现在这件事情还在探索过程中。建成后的中国地情网吸引力会很大,可以想一想,当点开一个县,地形地貌、物产、风俗等内容都有了。下一步还可以和一些部门进行链接,当天的温度、PM2.5等当地情况,以及某个地方有什么山、有什么水,都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网络,把地方志这些“死”资料变成“活”资源。现在想了解某个县的某一方面情况,要查很大一本书,即使是有这本书,也不一定看,但如果有一个网,点击一下什么资料都有了,非常方便,影响肯定会不一样。当然,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们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这项工作要和方志馆建设联系起来,就是在建设实体方志馆的时候,同时考虑建设数字方志馆。方志馆中

的一些展品可以做成三维的,在网络中直接展示图像。下一步要考虑地方志网络产品、微博产品、微信产品是什么,怎么来传播。各地方的名山名水,包括一些地方文化,有没有可能变成微信、微博产品在网上传播,大家可以考虑。还可以把家训之类的内容稍微编一下,当然要编得很短,便于传播。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事情。

第五,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创造性地开展地方志工作。我们到各地调研中发现,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都有自己的办法,但总的来说,点上的多,面上的少;具体的多,系统的少;独立的,全面的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大局的效果。今后我们要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方面,多作一些思考,创造性地开展一些工作。

从会议材料中可以看出,有些省围绕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所做的一些工作非常好。为什么山东能连续这么多次得到省长批示,就是说他们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了一些工作。前两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武汉召开有关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的长江论坛,同时中指组和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也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提出,有没有可能跨省编修一部《长江中游城市群志》,大概包括十几个城市,当时这几个城市的市长都非常感兴趣。再如现在京津冀提出协同发展,我们有没有可能配合做一些工作。地方志系统就是要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使“冷部门”热火起来。当然,还有许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工作,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地方志工作只有与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大局结合起来,才能做得更生动,才能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开拓出新的局面,也才能进一步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方志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第六,进一步加强调研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不了问题就更谈不上如何解决问题。自2013年12月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成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伟光同志和我先后带队到15个省份开展了

16次调研。2015年1~4月,中指办开展了6次调研。这些调研工作,为转变工作观念、理清工作思路提供了很大帮助。从中指办撰写的调研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提出的许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些建议经过研究后可以转化为工作思路和部署。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也要结合本地区地方志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深入一线开展调研,研究对策,制定措施,及时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成果,形成工作思路。

同志们,地方志事业需要谋划的事情很多,可

(接 24 页)

门志、行业志、单位志、乡镇村志的指导管理力度,规范社会修志行为。三要继续抓好旧志资料的整理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孤本善本,要采取有效措施抓紧抢救保护,组织力量进行校注再版。要加强史志资料的综合运用,推出更多史志衍生产品,丰富全省地情信息系统。

(六)科学制定“十三五”时期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中指组正在组织制定2016至2020年《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各地也要编制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并争取纳入当地政府“十三五”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2015年,省史志办将着手制定《甘肃省2016至2020年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地方志工作的发展作出总体安排。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提前着手,科学谋划,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全力做好本行政区域地方志事业“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工作。

(七)进一步加强修志队伍建设。事业发展,人才为先。编史修志人才尤为重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以战略眼光抓好人才培养。一要注意优化队伍结构,增编进人时应尽可能吸收学历层次较高、专业基本对口的新生力量充实业务力量。二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方志工作者把实现自身价值同岗位奉献联系起来,树立修志明志、修志励

以发挥的作用很大,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新时期地方志工作者的使命更为光荣,任务更为繁重。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重要讲话、批示精神,以及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和此次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健全的机制、更开阔的思路、更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志的境界。三要加大人员培训力度,建立培训工作常态机制。今年省史志办将继续举办二轮修志培训班和年鉴工作研讨班。各市州也要将业务培训列入工作日程,有针对性地做好培训。四要努力改进工作作风。今年是省委确定的工作落实年,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目标责任书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这次会议的安排部署,紧盯目标,明确责任,强化落实,真抓实干,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正在进行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于修志工作特别是对修志系统的领导干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各级志办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三严三实”要求的精神实质,联系修志干部修身、用权、律己具体实际和谋事、创业、做人具体要求,认真解决好律己“严”和工作“实”的问题。要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双十条规定”,做到“外塑形象、内强素质”,努力提高履行职责能力。

同志们,记录创业伟绩,书写时代华章,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振奋精神,凝心聚力,抓住机遇,奋力拼搏,以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全省转型升级、富民兴陇的伟大实践增光添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夏红民

(2015年5月11日)

同志们：

这次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两年来全省地方志工作，安排部署2015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刚才，李虎同志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对过去两年的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对2015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地方志工作做了安排，希望各级各部门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 一、统一思想，深化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地方志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2013年3月，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2014年2月，习总书记在考察首都博物馆时又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对地方志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广大史志工作者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刘延东副总理在会见与会代表座

谈时发表重要讲话，对下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她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经济实力，而且还要有文化魅力。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位领导同志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期地方志事业指明了方向。

省委省政府对于地方志工作是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省委王三运书记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三业”齐抓，抓祖业的传承保护，把祖宗留给我们的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抓事业的繁荣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抓产业的做大做强，真正把文化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认为，做好地方志工作，是传承保护祖业的重要内容，是我省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做大做强产业的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省政府每年将地方志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由分管副省长担任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与各市州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着力推动。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以战略目光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其纳入当地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不断推动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

## 二、明确目标，强化落实，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过去两年，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苦干实干,志书编纂不断推进,年鉴工作有序开展,志书质量有了新的提高,修志部门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地方志事业取得了新的发展。但也存在地方志工作机构不健全、工作制度不完善、工作进度跟不上以及修志机构自身能力不强等问题,尤其是与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相对照,还有较大差距。各级政府以及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进。

一是要始终坚持地方志工作的正确方向。第二轮修志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社会的发展变迁。总结编纂这段历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记述全省自然演进和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要以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理论与实践、修志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依法履行好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的职能。

二是要坚持依法修志。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全省地方史志系统要认真落实好《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实现地方志工作规范化、长远化和法治化。要以修志编鉴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靠实工作责任,开拓工作思路,切实做到“一纳入、八到位”(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要加强与各级人大、政府法制部门和出版行政部门的协同配合,通过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组织执法检查等活动,敦促有关方面落实法律规定事项,依法调节和规范社会修志、用志行为。要立足地方志工作和省情实际,探索建立促进地方史志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瞄准解决问题的着力点,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是要进一步加快修志编鉴进度。编修志书和编辑年鉴是地方志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根据李虎同志刚才的报告,我省的修志编鉴工作总体进展是好的,但是要按期完成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特别是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的2013至2015年目标任务,还需付出很大的努力,尤其是有的单位至今还没有启动相关志书的编纂工作,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完成二轮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志书编纂任务,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确定2018年基本完成省、市州、县市区第二轮志书编纂任务,而目前仅完成了32%,今后几年要完成近120部志书的编纂,任务相当艰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既然省政府与各市州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就必须按照责任书的要求,100%的圆满完成任务,这既是对各市州、各有关部门的一次能力检验,也是“工作落实年”给予我们的政治考量,更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必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二轮修志和年鉴编辑两项重点任务,充分发挥修志部门和审志部门两个积极性,进一步细化任务目标,明确工作责任,强化工作措施,不断加快修志编鉴工作进度。对工作滞后、进度缓慢、质量不达标的志书编修工作,要提前介入、靠前服务,认真查找原因,督促提高效能,尽快迎头赶上。

四是要不断提高志书年鉴的质量和水平。志书质量是地方志的生命所在。各级修志部门要把保证质量作为首要责任,将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编鉴工作的始终。要以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严格遵循地方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健全和完善志稿评议、质量评价、审查验收、批准出版等制度,精心把好各个关口,确保史实的真实性、准确性,绝不能在政治观点以及敏感问题上出差错,努力创编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要进一步发挥好省地方史志办统筹规划等职能,动员和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地方志事业中来,整体推进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

五是要加强与中心工作的融合。(转12页)

# 依法推进 强化落实 奋力书写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李 虎  
(2015年5月11日)

同志们:

经省政府同意,今天我们召开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编史修志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和刚刚结束的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过去两年来的工作,分析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研究部署2015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省政府对召开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夏红民副省长亲临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好夏省长的讲话精神。下面,我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 一、两年来的工作回顾

过去两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关怀指导下,全省地方志工作系统按照“以编纂三级志书为主体、以编辑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以服务社会为支撑”的总体发展思路,以认真落实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2013—2015年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为主要抓手,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突出重点,扎实工作,全省地方志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一)二轮修志稳步推进。按照“志为主体”的工作格局,全省各级修志机构通过加强业务指导,加大督导力度,划定时限要求等措施,全力推进志书编纂。一是工作进度明显加快。两年间,共出版省志分志5卷,终审4卷;出版市(州)志2部,终审1部,评议2部;出版县(市、区)志7部,终审3部,评议6部。到目前,72卷省志分志出版9卷,终审4卷;14部市(州)志出版5部,终审1部,评议2部;85部县(市、区)志出版36部,评议终审9部。从2014年度目标任务考核情况看,没有完成的市(州)、县(市、区)志,大多有望在今年完成。二是志书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在加快志书编纂进度的同时,各级修志机构进一步绷紧志书质量这根“弦”,严格执行志书编纂出版质量标准,不断强化“一评三审”工作制度,始终做到坚持质量标准不降低,坚持评审程序不变通,高标准把好志书政治关、体例关和史实关,新出版志书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二)年鉴工作取得新成绩。按照省政府提出的在2015年实现全省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全覆盖的要求,两年来,各地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年鉴工作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年鉴工作关系进一步理顺。一些年鉴编辑工作不在修志机构的,经过协调先后划入修志机构。平凉市、定西

市先后在2013年、2014年出版了首卷综合年鉴。庆阳市年鉴的编辑工作重新划归市志办。二是年鉴编辑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两年来,全省共有2个市、25个县(市、区)启动了综合年鉴的编辑工作。继白银市之后,2014年天水市也实现了市、县年鉴编辑工作全覆盖。到目前,全省已有13个市州、61个县市区编辑地方综合年鉴。三是年鉴编辑工作进一步规范。经过几年时间的持续努力,全省大部分地方综合年鉴做到了一年一鉴,及时出版。新出版的年鉴体例更加规范,内容更加充实,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三)史志工作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快。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省政府的要求,省史志办和各市州史志工作机构将信息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重要内容,抓紧建立互联网站,积极开展纸质版志书数字化转换,加强网上信息交流,地方志工作信息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两年来,先后有酒泉、定西、嘉峪关、张掖、金塔、高台、清水、西峰、正宁、渭源、临洮、会宁等20多个市、县建立了地方志网站。随着上传资料的增加,各网站访问量快速增加,加强了修志系统的信息交流,方便了社会读志用志,提升了地方史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四)方志库馆建设取得新进展。在2013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省政府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方志馆。两年来,一些市、县积极谋划,多方协调,反复申报,取得一定进展。目前,天水市政府已将方志馆建设列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占地4500平方米的市方志馆已审批立项。白银市方志馆2013年列入市政府“三馆一中心”建设规划,即将开工建设。各地在积极争取方志馆立项的同时,首先抓好方志资料室资料库建设,为建立方志馆积累资料。省史志办资料室存书达2.6万多种4.5万多册。

(五)史志工作范围继续拓展。一是加强了对部门志、行业志、乡镇村志编纂工作的指导。两年

间共出版各级部门志、行业志、单位志160多部,乡镇村志20多部。二是专门志编纂取得新成果。2014年嘉峪关市志办出版了《嘉峪关志》,会宁县志办编纂了《红军会宁会师志》。省史志办牵头编纂的《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完成初稿。三是史志撰著和资料编写方兴未艾。两年共编纂史志著述和专题资料120多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梁春秋记略》《崆峒金石集萃》《酒泉民俗研究》等20多部。四是旧志整理成果丰硕。两年来,全省共整理点校历代旧志11部。秦安县志办整理点校的《明清秦安志集注》获得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庆阳市志办整理点校的清乾隆《新庆阳府志》、民国《庆阳府志续稿》、武都区志办整理点校的《阶州志集校笺注》、清水县志办重印的《清水县旧志丛编》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六)依法修志不断推进。为了把《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不断引向深入,2013年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对各级政府、各有关方面依法履行修志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全面促进全省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落实依法修志,金昌市政府、嘉峪关市政府先后在2013年、2014年颁布了《金昌市地方志工作规定》《嘉峪关市地方志工作规定》。各地加强地方志工作法规宣传,增强了依法修志用志意识。政府有关方面运用修志工作法规调解地方志工作社会关系,很好地解决了修志机构参公管理、修志工作条件保障等问题。

(七)修志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一是地方志工作机构进一步健全。酒泉、庆阳市政府与所属各县(市、区)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书中,对各县区地方志办公室的人员编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是对一些在首轮修志结束后人员减少或机构撤销的县区,如玉门市、肃北县、合水县等,经过协调,

恢复了机构,补充了人员。两年来,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新增修志专职人员近40人。二是业务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大。省史志办两年来共举办志鉴培训班3期,培训人数近400人。各市(州)也分别举办培训班、研讨班,开展了多层次的培训工作。三是修志部门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按照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全省地方志系统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四风”认真查找突出问题,积极开展整改和建章立制,机关作风明显转变。深入推进效能风暴行动,慵懒散漫问题得到有效整治,机关效能明显提高。积极投入“双联”行动,在帮助联系村、联系户脱贫致富的同时,密切了修志人员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修志干部受到了教育和锻炼。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依法修志观念有待进一步增强。个别地方和部门领导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地方志工作“一纳入、八到位”要求有待进一步落实。二是全省二轮修志进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纵向看,市、县两级进展相对较快,总体实现了任务过半。而省志编纂进度较为缓慢,到目前72卷分志仅完成13部,加上进入审定阶段的几卷,占比也不到30%。一些省志承编单位甚至至今仍未启动二轮修志。横向看,部分进展较快的市州,如酒泉市已在全省率先完成市县两级修志任务,而有的市迄今还没有一部二轮志书出版。三是市、县综合年鉴工作仍有差距,目前全省还有20多个县区没有开展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四是部分修志机构工作开拓性不够,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强,处境“边缘化”问题仍未改观。以上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 二、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一是各级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2014年2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考察调研时指出,“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地方志工作者“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求真务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总书记和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2014年4月19日,刘延东副总理会见参加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期地方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我省地方史志工作也非常重视和支持。去年6月,王三运书记和刘伟平省长会见了来甘调研地方志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一行。刘伟平省长亲自审定《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方案,并对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去年12月夏红民副省长分管地方志工作以后,立即到省史志办调研,关心看望史志工作人员,研究解决地方志工作存在的问题。中央领导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地方志工作,给我们以极大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全省地方史志工作者不断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大省建设为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

标任务。国务院批准在我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地方志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承担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地方志工作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落实省委、省政府文化大省建设规划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离不开史志资料的支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向,紧紧抓住重大历史机遇,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更高的事业担当投入文化大省建设热潮,地方志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史志文化的需求为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前,我国已快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空前高涨。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社会包括海外华人在内寻根溯源、访亲谒祖的根亲文化不断升温,人民群众了解家乡历史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自发编纂部门志、行业志、单位志、乡镇村志,就是人民群众追根溯源、实现精神回归的具体体现。有需求就有机遇,大需求蕴含大机遇,大机遇带来大发展。全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顺势而为、不辱使命,以扎实的工作和高质量的史志成果回馈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盼,开辟了地方志工作的新天地。

四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为依法修志创造了良好条件。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两千多年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把修志工作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国家意志组织实施,体现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支持。2006年5月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标志着地方志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2009年1月省政府根据国务院《条例》的原则精神,结合我省具体实际,制定了《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地方志工作法规体

系。《条例》《规定》的颁布实施,使得地方志工作真正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法定职责和经常性工作。随着《条例》《规定》的深入实施,地方志工作环境不断优化,条件不断改善,队伍不断壮大,成果日益丰富,全省地方志事业进入了科学发展新阶段。

### 三、2015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

2015年是全面完成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的《2013—2015年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关键之年。今后几年是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进一步夯实地方志事业发展基础的重要时期。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和2015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志为主体,志鉴馆网用多元一体、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着力加快二轮志书编纂进程,着力推动年鉴工作正规化,着力提高志书年鉴质量,着力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奋力书写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一)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思想指导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完整准确地理解新时期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决策部署和战略举措,以“四个全面”为引领,推动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更高的站位、更高的要求抓好强党建、带队伍、转作风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着力解决强基固本、提高能力的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专题研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推动发展中出实招、破难题、见成效。要重视培养行业精神

和行业文化,教育修志人员树立热爱地方志事业、献身地方志事业、干好地方志事业的决心和信心,培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吃苦耐劳、奋发有为、勇于担当的意志品质。

(二)保证按时完成二轮修志任务。我省二轮修志启动已逾10年,总体上来讲进度比较缓慢。实现省政府确定的2018年基本完成二轮修志的目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省志编纂,10年仅出十几本书,无论什么原因都说不过去。有些承编单位工作机构已经建立,人员到位已经多年,但由于工作抓得不紧,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个别厅局甚至对省政府关于二轮志书编纂规划和要求不重视不作为,至今还未启动编纂工作,明显要拖全省的后腿。需要指出的是,二轮省志是70多个省直部门单位编纂的一套丛书,缺哪一卷都不完整。这些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按照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迎头赶上。已经建立机构并开展工作的,要落实责任,明确阶段性以及总体工作任务和完成时限,按计划拿出成果。尚未启动的单位,要尽快成立机构,配备人员,积极投入工作。省史志办将在近期编排《全省第二轮修志倒排工期计划表》,综合运用定期检查、专项督查、提请省政府公开通报等手段加大督促力度。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严格执行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加强志稿评议、审查验收和出版工作,以更高的标准和更强的手段,矢志不渝抓好志书质量。

(三)推进年鉴工作正常化规范化。编辑地方综合年鉴是国务院《条例》赋予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法定职责,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站在履法尽责的高度认识年鉴工作、抓好年鉴工作。一要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切实推动未启动年鉴编辑工作的地方尽快开展工作,按照省政府目标责任书限定的时间落实工作进度,力争在今年内实现全省县级以上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全覆盖。二要规

范地方综合年鉴的出版工作,县以上地方综合年鉴要尽快实现一年一鉴、及时出版。三要继续加强对各级年鉴的指导审定,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省史志办将加强对市州综合年鉴的指导和审查,市州修志机构也要履行好对所辖县市区年鉴的指导审查。另外,在抓好地方综合年鉴的同时,还要指导好行业、部门年鉴的编辑,确保全省年鉴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四)进一步提升地方志工作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是地方志事业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立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系统信息交流及为社会提供地情信息服务,加大地方志信息化工作力度。一是尚未开通地方志网站的市(州)、县(市、区),要按照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创造条件,尽快建立网站。二是已开通网站的地方,要继续抓好网站的完善升级和资料上传工作,尤其是对已经出版的志书年鉴,要做好数字化转换并尽快上网,实现资源共享。省史志办正在分步开展二轮志书的数字化转换,请各地各单位予以支持。三是尽快开展甘肃地方史志公共微信平台的调查论证及开通工作,力争在年内开通试运行。四是加快方志资料库建设。方志馆建设已立项的地方要抓好跟进落实。有条件的地方要继续做好方志馆建设立项争取工作,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方要加强方志资料室建设,把修志机构资料室逐步建设成为当地地情信息库,为建设方志馆创造条件。

(五)不断提升地方志工作服务社会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向,不断探索地方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实现地方志工作与地方重大发展项目的深度融合,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中发挥更大作用。一要积极投身文化大省建设,主动参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围绕“一带、三区、十三板块”建设布局,加大相关资料的发掘研究,为创新区建设提供资料支持。二要加大对部(转17页)

# 秦人、白马氏与乞巧风俗

——以甘肃陇南西汉水上游“跳麻姐姐”为个例考述

彭战获

**摘要** 秦人祭祖风俗和牛郎织女传说复合及其延生的乞巧节起源于西汉水流域。秦、氏战争与和平，民俗文化交融互渗，从而丰富了乞巧内容，得以规模化传承发展。经考证，麻姐姐原型为人类原始母祖女娲。麻姐姐不是单纯的纺麻布织麻布的能手，是由蛙姐姐、媧姐姐衍化而出。跳麻姐姐是古巫文化、蛙图腾崇拜的遗存。可以说，跳麻姐姐活动所祈求的美满婚姻才是西、礼两县姑娘们乞巧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 秦人 白马氏 跳麻姐姐 乞巧风俗

## 一、问题的提出

甘肃陇南西汉水流域是白马氏族古老的家园，也是秦人的发祥地。二者相较，白马氏要比秦人在此生息的时间更早更长，尤其是秦人东进后，白马氏杨氏还建立过仇池国等一些地方民族政权。这里盛行的姑娘群体乞巧风俗，经专家考证是源于秦人古老的祭祀仪礼，其巧娘娘原型为嬴秦先祖女修<sup>①</sup>，后与牛郎织女传说衍生成为乞巧节俗（亦称女儿节）。西和、礼县乞巧节与中国各地七夕文化同源同根，年代已经很久远了，然而，独具特色颇有亮点的跳麻姐姐仪项却一直让不少人觉着“非常突兀”，甚至于“大惑不解”。之前，甘肃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兰州大学教授柯杨先生曾认为麻姐姐就是“麻姑”<sup>②</sup>，陇南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田佐先生认为是“看山”的麻鸱，抑或为嬴秦鸟图腾崇拜下的“鸟形神尸”<sup>③</sup>，除此只言片语，对麻姐姐和跳麻姐姐整合论述的文章还很少见到。笔者的祖祖辈辈一直生息在西汉水上游，出于对家乡及地方文化的热爱，我也写过几篇有关乞巧调查研究性之类的文章，相继刊发见诸于《仇池》《陇南

日报》《甘肃文艺》《陇南师专学报》上，有的还被收入《西和文史资料》《西和乞巧志》《姜席史话》《陇南秦文化研究资料》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交流本上，至于乞巧中为何要跳麻姐姐？麻姐姐的原型是谁？乞巧风俗与白马氏有无关系等问题，一直处于观察了解和反复思考阶段，未敢轻率下笔专论。前不久，中国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原陇南市政协副主席张金生先生发来短信，约我实事求是写篇揭示白马人与西汉水上游乞巧风俗有无关联的文章，先交《陇南日报》发表，再递交中国甘肃首届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会暨陇南第二届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讨会交流，并提出了他的个人设想和一些观点，于是才有了这个命题。本文先简述跳麻姐姐的全过程，然后多方寻找相关例证，综合比较，加以分析，探找麻姐姐原型及跳麻姐姐的因由，进而推出“秦人祭祖、乞巧与白马氏民族文化递加杂糅”等结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重在地域性探讨，其中观点多属一孔之见，为的是抛砖引玉。不妥之处，还望专家、学者多多教正。

## 二、跳麻姐姐活动述略

要研究麻姐姐，必须得要首先了解跳麻姐姐的全过程。

跳麻姐姐，民间俗称“跳神”，是一种招魂、请神上马（脚马）、祈福问事的巫性活动。许多村寨的姑娘们一年一度成群结伙乞巧，大多数在农历七月初七晚上于神桌前举行此项庄严神圣的仪式，有问有答，歌舞并重，大约要持续三、四十分钟。承袭古俗，程式完整。可在照花瓣卜巧之前跳，也可在照花瓣卜巧之后跳。节点之外，平时从不乱跳。

要跳麻姐姐，事先要确定恰当的人选来充当

“脚马”(即“神尸”),负责主跳。而这脚马的择定,必须得具备相应的条件:一是平时梦见自己跳过神的,很想借此机会真实感受一番;二是认为自己或家中诸事不顺,求助于神灵附身,既是“事后禳解”,又是“事先设防”,诚心诚意主动来跳的;三是大家公认推选的,或曾经有过跳麻姐姐经验的<sup>④</sup>。姑娘们大多数年龄较小,涉世不深。为了确保活动有条不紊,往往要请法过神的“神婆”或富有跳麻姐姐经验的老太婆来从旁指导协助,并以防意外。

仪式伊始,集体祭神。礼毕,先由一人潜入神桌下的桌裙后面,主跳姑娘由两位大姑娘左右陪同面桌而立,其余姑娘相向恭列桌前两侧,开场是一番简短的对答唱和。如,一侧姑娘先发问:“麻姐姐,做啥着哩?”桌下姑娘答道:“磨面着哩。”姑娘们合唱:“东磨面,西磨面,磨磨簸下磨不转。”接下来,凡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都可以作为问答的话题,尤其是茶饭、针线、纺织之类的问答最多。这是跳麻姐姐活动的序曲,问答方式上各个巧点间大体相同,但内容上繁简不一。如此经过反复问答、集体唱和后,桌下姑娘高声呼叫道:“麻姐姐的神一来一了!麻姐姐的魂一来一了!”众姑娘一起附和应声:“麻姐姐的神一来一了!麻姐姐的魂一来一了!”至此,迎神招魂仪式结束,姑娘钻出桌裙,同大家一起用数板调跳唱《麻姐姐歌》。如:

#### 麻姐姐,快些来<sup>⑤</sup>

麻姐姐,快些来,香蜡表纸接你来;  
麻姐姐,隔山来,腰里裹的红缠来;  
麻姐姐,隔河来,手里端着栲栳来;  
麻姐姐,虚空里来,脚上穿的登云鞋;  
麻姐姐,神来了,黑天半夜行(步行)来了;  
黑天半夜咋(干什么)来了,端的杏核茶来了;  
黑天半夜走来了,端的蜂坛酒来了;  
杏核茶,蜂坛酒,麻姐姐一双好巧手;  
云里头走,虚空里行,麻姐姐只爱勤户人。

流传到今天的《麻姐姐歌》比较多,虽长短不一,但内容上却大同小异,多属叙事、赞颂之词。不同的歌词有“麻姐姐,隔河来,手里打着响锣来”;“麻姐姐,翻山来,脚踏铺下的红毡来”;“麻姐姐,

水火头来,脚上穿着大红鞋”;“麻姐姐,地下走着来,脚穿一双绣花鞋”;“虚空里来,云里头走,麻姐姐手拿降妖斗”;“虚空行,云里走,上河里来了下河里走”(上河:指天上的河,也俗称“天河”)等等。

跳麻姐姐带有一定的神秘、浪漫色彩。《麻姐姐歌》一旦唱起,神桌前主跳的姑娘和左右陪伴的两位姑娘便开始踏着节拍手舞足蹈。基本动作是双足原地跳跃,两臂前后甩动。起初,节奏舒缓,轻跳曼舞,富有韵律;随之,节奏逐渐加快,跳摆也越来越剧烈,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如此持续大约十分钟左右。若陪跳姑娘体力不支,可以中途由别人替换,但主跳姑娘必须要坚持到底,直至“神灵附体”才算告一段落。主跳姑娘倒地不起时,众人高呼“请神上马”,并由大姑娘将其抱起,便试探性地问道:“你是麻姐姐神还是巧娘娘神?”若回答:“是麻姐姐神”时,便证明神灵已经上身脚马。否则,还要继续跳下去。这是跳神的第二阶段。

在“跳麻姐姐”活动中,主跳姑娘是麻姐姐神的“脚马”,是神的“代言人”,也是人、神、鬼相通的媒介,其内在本质,和巫婆法神的角色一致。神灵一旦附体,姑娘们便一起跪地祈祷:“麻姐姐,麻姐姐,您是救世女皇、至灵至应的大神,请你嘴里头莫留言,舌头底下莫压话,给糊涂的阳人指一条明路吧!神前一炉香,人前一席话,若我们那个曾经无意冒犯了您,还请高抬贵手,千万不要计较……”接下来,人人虔诚上香磕头,逐一求福问事,有求必应,皆大欢喜。

最后,姑娘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又是一番泼又泼的尽兴狂舞。大多数乞巧点上的舞蹈动作仍以跳麻姐姐时的为主,同时有的还伴有牵手摆臂式。域内传承的《泼又泼》有好几首,现择其主流歌词摘录两首:

#### (一)

泼又泼,泼又泼,青草芽儿乐又乐;  
称线来,拿线来,白綾子扎起裹脚来;  
扎花要扎扣线来,扎下的花儿动弹来;  
扎花要扎麻叶来,要扎十朵莲花来;  
扎花要扎金绛来,要扎半个月亮来;  
十朵莲花九朵开,将有一朵没开开,

拿到坡上风吹开<sup>⑥</sup>。

## (二)

泼又泼呀，泼又泼呀，姊妹乞巧乐又乐呀。  
用心梳妆打扮哩，要显姐姐的手段哩。  
红缎子的绣花鞋，手拖手儿跳起来。  
前一跳，后一摆，尽着兴子放心载。  
帽盖子后面耍长虫，瓦眉儿上下像扇风。  
妹子的脸蛋儿跳红了，姐姐的小脚跳疼了。  
跳疼了呀跳酸了，一双花鞋拐偏了。  
泼又泼呀，泼又泼呀，姊妹乞巧乐又乐呀。  
跳乏了，唱乱了，一双花鞋拐烂了。  
跳得高兴没说了，只怨缠成小脚了。  
妹子赌咒不再缠，老天劝说也枉然<sup>⑦</sup>。  
至此，整个跳麻姐姐活动才算圆满结束。

### 三、到底有没有麻姐姐的原型

七夕风俗的内核是乞巧，几乎风行全国各地，甚至还流行到了日本<sup>⑧</sup>，但乞巧中跳麻姐姐仪项仅西汉水流域一“家”，除此再“别无客店”。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西和县能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乞巧风俗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这一独特的跳麻姐仪项。

一年又一年，乞巧乞了数千年。传承发展到今天的乞巧文化，程式完整，内容太丰富了，实在让姑娘们兴喜若狂。可是，为什么要跳麻姐姐？麻姐姐是何方神圣？麻姐姐有没有原型？疑问太多！下面，侧重于麻姐姐原型方面作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 (一)文献记载中的原型

东晋葛洪《神仙传·卷七》、唐代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晚唐李亢的《独异志》、南宋刘敬叔的《艺苑》，以及袁柯编著的《中国神话词典》，还有《古小说钩沉》辑《列艺传》等，见诸于记载的虽然前后有些差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东汉时修道成仙，曾三次见沧海变桑田，手爪四寸长，能执米成珠，用灵芝酿酒的麻姑。

第二个是五代后赵胡人麻秋之女。麻秋为人强悍，筑城严酷，督责工人，昼夜不止。其女有惜民

之心，于是假作鸡鸣，群鸡相效而啼，众工役才得以休息。后来，麻秋知其所为，一再毒打麻姑。麻姑寻机逃入深山古洞，竟修成大道。

除此，《武都备志》记载有一则传说。说的是天仙女转世的红女受不了婆婆百般折磨与小姑子的气，负恨离家，修成正果，度人向善，人们建红女祠祭祀的事。

另外，甘肃武山水帘洞有尊“麻线娘娘”塑像，传说是为纪念真秀而立。真秀是位民间女子，从小纺麻线，因婚姻不如意逃出家门，在水帘洞修成正果。再如，媒体上新近出现了一则故事，其内容跟麻秋之女的传说雷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将麻秋之女替换成了秦始皇之女，二是将筑城改为修长城。是民间故事还是文人再创作，真假难辨，不足为凭。

#### (二)域内史实或传闻中的相关线索

麻姐姐肯定有其独特的生长土壤及地域历史因素。暂且抛开文献记载中的麻姑不说，再来谈谈当地与“麻姑”“麻姐姐”相关联的几条信息，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共同理清麻姐姐原型的一些头绪。

##### 1.与仇池“麻姑仙洞”有关的传说

仇池山位于西和县城南五十公里处的大桥乡南部，西汉水自西北绕山脚南下，洛峪河从东南沿山麓西来汇入西汉水，二水汇流山下，形成三面环水、一面衔山的险峻地势。这里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和刑天葬首的地方，也是白马氏族的发祥地和仇池国的故土。据地方志称，山上伏羲仙崖、石勺奇潭、金龙滚珠、八仙上寿、麻崖石洞、东水无根、洞涌神鱼、小有洞天等八大景观，构成了仇池山峰、泉、云、洞、石五绝的特有美景。另外，有民谣唱道：“伏羲仙崖第一景，轩辕神修滚龙珠。东水无根西石勺，中洞潜藏小有天。四大菩萨云霄殿，八仙上寿吉祥山。一上仇池百顷田，麻姑仙洞几千年。”

“麻姑仙洞”是当地民间的俗称，其实指的是仇池山东崖间那处幽深险怪的“麻崖石洞”。关于此洞，民间传说颇多。现择要简述几则：

(1)传说上古年代，居住在仇池山上的华胥娘娘于雷泽踩大人足而身怀有孕，生下了伏羲。伏羲

出生,大哭大叫,震得山摇地晃。一天,他到山下玩耍,碰见了一位女孩,历经多次波折,两人结为夫妇,就住在“仇池穴”(即麻崖石洞)里。这女孩,便是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名叫女媧。女媧是个聪明的女性,抟黄土造人;炼石补天,阻止水患;一日七十化变,创造万物;主职姻缘,教化人类,进而帮母亲建立了“华胥氏之国”。他们是当地最早的先民最早的神,或塑像或画像,建有许多庙祠。直至今今天,有的村子还尊奉为家神。当地家神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历史上的英雄神;一类是龙王神,也叫湫神;还有一类是喇嘛神。女性,一般称“娘娘神”或“夫人”等等。此类传说较多,内容也比较丰富,但女媧的主要功绩却大同小异。

(2)听老人们讲,仇池山上处处有洞,洞洞有景。惟独麻姑仙洞更是神奇,它是一处活洞,能上通天界、下通水府。传说很久以前,说不上是牛年马月,仇池一带闹恶怪,民众叫苦连天,几乎断了来往径行。更为严重的是,山上有处蟠桃园,那可是王母娘娘苦心经营下的,仙桃快要成熟了,若被恶怪食了毁了,那将会坏了蟠桃会大事。三仙女青娥闻讯,下凡来到了仇池,当路过竹垭坪上空时,忽然听见林中有人哭得悲痛欲绝,便按落云头,摇身变了位村姑,想一探个中原委。原来是位青年,因父母被恶怪吃了,才如此伤心。青娥历尽重重艰险,剪除了恶怪,保住了桃园,遂私下与青年结为夫妇。这事,同时也惊动了二郎神,同样也赶到了仇池,又除掉了其它一些祸害人间的妖魔鬼怪。转眼八月十五到了,青娥被天兵天将抓回天庭,将一个孩子留在洞口。后来,青年修道成仙,在麻崖洞中升了天。

(3)有这么一位媳妇,踏进婆家门整整三个年头了,还没回过一趟娘家。不是媳妇不想回,而是回不了:婆婆太恶,小姑子太刁,男人年幼主不了事。她一天到晚忙里忙外,总有干不完的活,可从没换得一家人的好脸势,吃口顺气饭。这一天,媳妇怯生生地来到婆婆跟前,没等话说完,婆婆便拒绝道:“不行!等把山里的麻子、菜子种上了再说!”种上了油菜,婆婆却又刁难道:“我让你种在南山,你却种在北山,去把籽种捡出来重种,不然,这辈

子休想回娘家!”媳妇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好天天跪在地里捡呀捡,边捡边流泪,居然感动了观音菩萨,派仙鹊、仙鸽来帮忙,终于改种到南山。事后,媳妇让小姑子向婆婆讨口话,小姑子回话说:“娘说来,等纺断铁锭,秋后庄稼收回来了再去。”于是,她就白天上地劳动,晚上熬夜纺线,常常独自落泪。观音菩萨暗中又来帮忙,派身边的善财童子作法,弄断了铁锭。婆婆改口道:“锭子断了还不行。你整天眼泪跟尿水子似的,等哭满了三缸眼泪,我便放你去。”媳妇一听,越想越伤心,一下子昏厥过去。等到醒转,三口缸里全装满了泪水。一件接一件的蹊跷事,狠心婆婆想不出更好的阻拦法子,终于发了话:“去吧,早上去,黑家回,不然打折你老爱往娘家跑的腿!”刚要出门,没料想小姑子却横在了面前,黑着脸说:“今天要转娘家,明天要转娘家,屋里的活谁干?等担断铁扁担后再去也不迟!”

婆婆狠心,小姑子刁蛮,丈夫年幼。这媳妇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活得没奔头,万般无奈之下,便以洗麻线为借口,离家出走,遂坠崖身亡。有的说,她在仇池山的山洞里修成了正果,后累累显灵,给人类赐福降祥,跟观音菩萨差不多。据说此媳妇为天仙女转生人间,名叫红玉,也有的说名叫青娥。至今,西和晚霞湖峡谷中遗有“麻线滩”。

(4)从前,麻崖古洞有一股旺盛的泉水,终年一直往外淌,山前形成一道瀑布奇观。有一年,一位村姑抱着一卷长达十余丈的麻布去泉里捶洗。洗着洗着,不小心脚下一打滑,掉下了山崖。幸好她情急中抓住了麻布的一头,被悬在了半山腰。村姑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吓得昏死了过去。等她醒来,却毫发未损的落在台地上。据说是哪位神仙暗中救了她。

(5)早年间,一个农妇从沟底上来,坐在石洞前要洗几件衣裳。刚洗了几下,突然洞里冲出来一只红筷子。她认为得了仙宝,便急忙卷起衣裳,兴冲冲地抱着回了家。等她打开衣服要取红筷子时,竟然是一条口吐信子的小红蛇,吓得当即不省人事。等家里人将她唤醒,方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再四下寻找红蛇时,早已不知去向。此事传开,人们

认为是污秽之气冲犯了神灵,才致使如此。此后,洞口、瀑布下面再没人敢洗衣服了。

传说、故事太多,不能一一全录。以上几则,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甘肃卷西和故事资料本》中多有记录,1984年10月内部印制,当时我任编辑。另外,有的传说在《武都备志》里也有记载。

## 2.可供观赏的“麻姐姐鸟”

过去,西汉水流域广泛种植糜谷、荏子、麻子等作物,到了成熟期,麻雀等各类小鸟成群结帮侵入田间啄食踢踏,尤其是啄食谷粒,动作灵巧娴熟,在谷穗间跳来窜去,十分贪婪。它们天天如此,犹如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一般,赶也赶不退。故此,当地一直有养鸟“看山”的习俗。

麻雀等小鸟的天敌是鸽子。春季是鸟类产卵孵化繁殖的季节,于是人们便到山林里掏鸟窝抓取鸫娃驯养,用以看护庄稼。民国时期,一只鸫娃可值2块银元;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只鸫娃价值达80元,一只青鸫价值达200余元,而且还供不应求。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言,普通工薪人员的月薪收入也只有50元上下,小麦市场价格也不过0.30元左右。从抓捕鸫娃到养成青鸫有一套完整的人工驯化过程,非常不容易。用鸽子守护庄稼,民间叫“看山”。谷物成熟之际,养鸫人将鸟拐插在山丘上,鸽子站于“鸫拐”,每间隔一段时辰便将鸽子放飞一次,以驱逐鸟群。大多数人家重视养鸫“看山”,鸽子格外珍贵。鸽子驱鸟,也食鸟,麻雀闻风丧胆,甚至被吓得羽毛落地。庄稼收获后,养鸫人再不留养青鸫,也不伤害,进行一段时期的野性驯化后,重又放归于自然,等来年再抓捕鸫娃喂养,周而复始。也有人将成年鸫笼养过冬的,但饲喂困难,成活率极低。

有一种春来秋去的候鸟叫“麻姐姐”,体型比麻雀略小,片羽成褐色,也啄害谷物,但老百姓一般不去伤害,通过捕捉,将其笼养。麻姐姐鸟被笼养换毛,颜色就会变黄,而且叫声也格外优美动听,观赏价值极高,进而民间形成了驯养此鸟进入市场的习俗。特别是永兴、长道一带,养鸟成风,至今不少家庭仍笼养麻姐姐鸟,驯养教练鸟叫,大多会说“二姐娃回走”,作精致鸟笼连同鸟一起出售。

他们多数人会上树放“高游”,地上放“地游”。所谓“高游”,也叫游子,民间又俗称“鸟媒”,就是将已经驯化过的麻姐姐鸟放飞树枝,以引诱其异性同类鸟前来相会,并趁其不备加以捕捉;所谓“地游”,仍是以麻姐姐鸟为“鸟媒”,将其放飞于地上啄食谷粒,以诱骗同类争食,以网捕捉。

鸽子不能喂食过饱,否则就会“起盘”,起不到应有的“看山”作用。起盘,就是从低空一圈一圈往高空盘绕,成扶摇直上之势,直至升入云霄看不见踪影。这样,很可能就会逃跑掉,懒得再回来。有趣的是,碰到此种情况,养鸫人便戏称说:“这是上天接鸟(方言读qiao巧)娘娘去了!”

除了养鸽子,当地人还有训鹰抓山鸡的习俗与此并存。

## 3.别具一格的“跳麻姐姐”游戏

小时候,我和其他男孩子玩过一种“跳麻姐姐”的游戏,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很有趣。当时,只是一时游乐而已,并未多想,也不可能去多想。近些年来,出于个人爱好,我在田野作民俗考察时发现,这一游戏流传面较广,也很有些年代了。追述如下:

挑选一生长茂盛的松树,摘取带束的松针,剪去小把和松针顶部,扣于桌面。游戏时,两人或三人各置一束于桌上,用手掌轻轻拍打桌面不同位置,让松针蹦蹦跳跳,遵循游戏者意向自由游走。谁弹跳的时间长,谁就获胜,反之,谁先倒了,谁就该认输。如此反复,游戏不止。这束松针,就叫“麻姐姐”,其游戏全过程,称作“跳麻姐姐”或“跳神”。

玩“跳麻姐姐”游戏,全凭技术。拍桌子的节奏,着力的大小,弹跳的高度,游走的方向,平衡的掌握,全在于一人掌控。稍不留神,有时还会掉下桌沿。为了击败对手,相互间还出奇招,在保持己方“麻姐姐”不翻倒不掉地的前提下,猛击桌子,让对方“麻姐姐”震翻或跳出桌面。

游戏一开始,伴随着击打的节奏,人人嘴里要唱《麻姐姐》歌谣。先是“麻姐姐的魂来了,麻姐姐的神来了;跳一跳,乐一乐,我俩把你请上桌……”,下面歌词和姑娘们乞巧活动中所唱大体相

同(此略),但不同的是只说白而不舞,后面也没有纳福求神的情节。另外,玩跳麻姐姐游戏没有严格的时日限定,什么时候都可以玩。

#### 四、麻姐姐原型在西汉水流域

如前所述,目的是为寻找麻姐姐原型作例证支撑,因这是一个严肃、复杂又属于拓荒性的论题,不但文献没有具体明确记载,而且当今学者也很少深入探究过。到目前为止,人们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乞巧文化的文章多,但对麻姐姐的原型是谁,为什么乞巧活动中要跳麻姐姐等等,质疑者见多,研究方面亦然还是一片空白。陇南籍学者赵逵夫先生曾认为牛郎织女传说及衍生的乞巧节起源于西汉水流域,巧娘娘的原型是秦人的祖先女修,其依据是《史记》中有“女修织”的记载。由此推论,乞巧活动中的麻姐姐与巧娘娘(织女)不会相距太远,也应该在西汉水流域才算合情合理。为此,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麻姐姐到底是历史上的何人,就连专家学者也无定论,只好暂且存疑。”“至少认为她和女修的关联不会太远。境内有人类繁衍生息以来,古代居民的衣着,除牲畜兽皮之外,以麻织品和丝织品产生较早,棉织品较晚。织女是丝绸发展时代的象征,巧娘娘是女性中的佼佼者,后世便加以神话而拜祭,日盛一日。与此同时,劳动人民在有限的皮毛、丝绸之外,亦多用麻织制品,自然就有他们心中创造公认的麻神,肯定史有其人,同样勤劳能干,善纺善织,才有资格以陪祭祀。”<sup>⑩</sup>从前面所录的大量资料显示,好些似乎都有麻姐姐的影子,甚至还跟“麻姑”“麻姐姐”同名,但我们不能只看其中的一点一滴就轻下定论。有比较才有鉴别,事实比雄辩更能说明问题。综合起来比较分析,我认为麻姐姐的原型就在西汉水流域,不是一位“小神”,而是一位人人皆知的有名有姓的“大神”——她就是人类原始母祖女娲。只有她,才完全具备相应的条件。

##### (一)女娲是人也是神。

首先,有仇池山“麻姑仙洞”为证。在没有确切文献史证的情况下,天仙女、村妇、村姑等一系列传闻,都可以作为论据的撑点。青娥下凡斩恶怪并与凡人婚配;二郎神在刘家河坝与塔子山斩妖除

害;巧媳妇忍受不了恶婆婆与小姑子的再三虐待而离家出走,得以在洞穴得道;村姑洗麻布有惊无险;村妇洗衣服遇红蛇示警等,似乎表象上有些离奇古怪,但内质上至少说明这里是一处圣洁的仙洞,其仙境不容纳污,神灵不可亵渎,因人类原始母祖在此居住过。尽管伏羲与女娲之间历来多说并存,是兄妹关系,是姐弟关系,是氏族部落与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还是你是你、我是我两者互不相干的关系,间或被男权社会贬为从属地位的女神、女奴等等,但当地老百姓惯性使然,尊伏羲为“人宗爷”,尊女娲为“母祖”,“敬神如神在”。其次,蛇蛙崇拜与生育崇拜。史书记载,龙是伏羲氏的图腾,蛙是女娲氏的图腾。传说伏羲女娲皆“人面蛇身”,龙形象与蛙形象的神人化,至今仇池山一带的人将蛇、蛙仍视为神明,从来不去伤害。蛙繁殖能力惊人,想到“蛙”就联想到了“女娲造人”。《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刷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凡有女娲庙的地方都盛行到女娲庙求子的习俗。虽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却浸透着一种原始生殖崇拜文化。原始时代,部落战争十分残酷、频繁,而且全靠人力对抗,死亡者众多。加上疫病多发,人口成活率低,婴儿叫声又和蛙叫相同。所以,人们期盼能像“蛙”一样产子繁育,使氏族人丁兴旺,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当地人不但将女娲视为祖神,还建有许多女娲庙,有的村子还一直奉为家神。这和乞巧活动中跳麻姐姐、生巧芽迎水照花瓣、穿针引线卜巧所隐透的生殖崇拜是一致的。第三,女娲高媒。女娲为创造神,她的创造既包括自然界的创造,也包括人类的创造,因而又是造人之神。女娲创造了山川湖海、飞禽走兽,改变了原本洪荒的世界。女娲造人中既造了女人,也造了男人,女娲想他们是人,总有一天会死的。死了怎么办?再造一批又太麻烦,于是她就去求上苍,安排男女结合,生儿育女繁衍下去,从而成为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婚姻之神。《风俗通》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祠。”罗泌认为:“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媒之神,因典祠焉。”这应该是人类进入婚姻制度之后所赋予女娲主媒造婚神

话的痕迹。西汉水流域养鸟看见习俗中“放高游”“放地游”透过图腾崇拜,也正好反映了这一现象的俗变。第四,“人日”的狂欢。《太平御览》记载:女媧在造人之前,于正月初一创造出鸡,初二创造出狗,初三创造出猪,初四创造出羊,初五创造出牛,初六创造出马,初七这一天,才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人。故此,人们称初七为“人日”。人多了起来,大伙儿蹦蹦跳跳,手舞足蹈,女媧不开心。七夕节双七重叠,人们怎不像“蛙”一样狂跳呢。第五,关于女媧,文献记载较多,限于篇幅,今援引几条。《淮南子·蓝冥篇》:“苍天补,四极正,溪水涸,冀州平,蛟虫死,颛民生。……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已从天地之固然。”《世纪·帝系篇》:“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即成,天下无不得理。”《淮南子·说林篇》:“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变造化。”《水经注》:“庖羲之后,有帝女媧焉,与神农为三皇矣。”《诗含神雾》:“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媧,刘季兴也。”《抱朴子·释滞》:“女媧地出。”《春秋繁露》:“雨不霁,祭女媧。”《路史》罗萍注引《尹子·盘古篇》:“共工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女媧补天,射十日”等等。可见,女媧是非凡的人物,也是一位上古了不起的女神。据传说,西和仇池山上的五彩石与礼县赤土山石林都是女媧炼石补天时所遗。就是这样一位女神,与生于仇池的伏羲在“麻崖仙洞”相处,人们怎能不尊为万能的麻神。尤其年轻的女性(包括姑娘),更是敬奉有加。

(二)麻姐姐的“麻”字,与其相关联者甚多。

一是姓氏说。见诸于文献记载的两位麻姑,其一是麻秋之女,她本姓“麻”,于是称“麻姑”;另一位手爪特长的麻姑虽然其情不详,但可推测为也是“麻”姓,或者是纺麻线的高手,或者脸上布满麻点。不过,“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后者绝不可能,况且又不同于凡人。二是地名说。仇池山下有野麻坡,西峪坪以北有麻池坝,北奔的香山余脉上有麻坡里、麻坡下、麻墁坎、麻线滩,徽县有麻沿河,许多村子有麻地、麻园子等等,皆因种麻而得其名。域内种植火麻很早,种植胡麻(亚麻)较迟,

麻绳、麻织品使用很普遍。一些人认为“麻姑”或“麻姐姐”肯定是办麻线、麻布的佼佼者,如武山的“麻线娘娘”塑像。像上面的两位“麻姑”皆与此无涉。三是色彩说。比如麻雀、麻鹞、麻长虫、麻姐姐鸟等。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前面所说的麻姐姐鸟,经反复考察得知,并非乞巧活动中的麻姐姐原型,因会叫“二姐姐回走”、身体呈麻颜色而得其名,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当然,倘若从秦人阳鸟崇拜与白马氏动物崇拜等方面去深究,还有继续商讨的价值。四是质地说。比如麻线、麻布、麻鞋、麻线绳等,是麻纤维制品。五是工具说。比如麻线车、麻布机等。

以上列举了麻字成头的一些实例,现在再说一说仇池“麻姑仙洞”。正如民谣所反映的,当地居民有种世代相传的古老记忆,这和方志记载近似一致。具体到麻姑仙洞,别称也有几种,如麻崖古洞、麻岩石洞、麻崖仙洞等。不论怎么说,总离不了一个“麻”字成头。因洞口崖面呈麻窝石质,山下不远处又有野麻坡。女媧是母系社会杰出的代表人物,后来此地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特别是白马氏族活动的年代最长,直到唐代才先后被藏化、汉化,同而不化的也有,那就是远遁于深山的仇池国时的遗民——至今生活在陇南文县一带的白马氏。女媧氏时代,正处于部落林立、族系纷繁的状态,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尚未充分发育,生产生活习惯性的以氏族部落为主,“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甚至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据张采《中国风俗史》言,黄帝至夏商时的婚姻“无同姓异姓之别。如颛顼女女修,为伯夷之曾祖母。尧二女嫁舜皆同姓连婚是也。”<sup>⑩</sup>可见夏商时,不论同姓异姓都可以婚配的,当时还没有同姓不婚的限制。可能是与当时人们承前人重图腾归属而不重血亲归属有关联。又据谷城在《中国政治史》中考证,最初(三代之前)姓是用以称呼女子的,氏是用以称呼男子的。在母系社会时代,两个不同姓的氏族间如发生婚姻关系,出嫁的不是女子,而是男子。女子不出嫁,故能维持着表示血统的姓不变。直到稍后母系社会逐渐丧失权威,图腾意义逐渐被人忘却之时,于是用于女子的姓逐渐被男子的氏所代替。“正是这

一转换过程,姓、氏的问题才显得有些混乱。”<sup>⑩</sup>大体上说,早期婚姻是群婚、氏族内婚和氏族外婚型的,其注重的是图腾关系、氏族关系,也就是生活资源关系、地域关系。可以看出,姓的作用在于‘别婚姻’‘别种族’。女媧是麻姑也好,是麻姐姐也罢,往事如云似水,但今天听起来仍显得是那么亲切。陇南是伏羲、女媧、黄帝等有重大影响的远古神话人物传说的流行区域,何况仇池山上又多有传说及遗迹为证,女媧怎能不受世人推崇敬拜呢?

### (三)图腾崇拜及其它。

如前所述,蛙是女媧氏的图腾,蛙生育能力极强,又是生育之神。何星亮先生认为:“媧即蛙当无疑义,而女与雌义同,所谓‘女媧’,其实就是‘雌蛙’。大概雌蛙原是某氏族部落的图腾,后来图腾演化为神,雌蛙也演变为女媧。”<sup>⑪</sup>人们期望女性大量生育,使氏族人丁兴旺,于是女媧庙遍及各地。另外,当地人一直将蛙视为神灵,据说是雷神之女。其实,女媧的父亲正好是雷神。“我不抓青蛙,不怕遭雷打”,不是很好的说明吗?由此可以推测,从“蛙”到“媧”再到“麻”,只是一音之转,将“蛙姑”“蛙姐姐”呼之为“麻姑”“麻姐姐”也是有可能的。也可以说,“麻姐姐”就是“蛙姐姐”或“媧姐姐”。再者,“吃穿”一直是人类求得生存的首先大事,人们在争山争地争食源的同时,解决“穿衣”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正如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甘肃秦文化研究会会长祝中熹先生所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许多意义重大的文化成就,据迄今所知的考古资料显示,都首先出现在汉渭文化圈。如最早的彩陶,黍、油菜、小麦、大麻等农作物最早的标本,最早的房屋建筑,同汉字起源关系密切的最早的陶器符号,最早的青铜制品,最早的陶瓦,最早的室内绘画作品,最早的权杖头……这些史前文化光彩夺目的亮点,在域内竞相闪现,骄傲地诉说着汉渭文化圈上古时代的辉煌。“从神话历史传闻方面说,其丰富程度足以与考古信息相呼应。被视为华夏始祖的伏羲、女媧,以及时处文明前夕、位居五帝之首的黄帝,有关他们的传说,恰恰就集中分布在汉渭文化圈内。”<sup>⑫</sup>汉渭文化圈是朱中熹先生综合研究了甘肃

东部上古历史后新近提出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具体指的是以陇山为依托,以天水市为中心,汉水和渭水上游支流邻侧密布的这一片区域。就西汉水流域而言,域内大麻作物种植最早,亚麻较迟,麻纺业一直很发达,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有麻织品见诸民间,也有以织麻布为业的“匠人”。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麻是当地民众“穿衣保暖”之源,民众自然创造有他们心目中的麻神。而这麻神,不是一般女性中的纺织能手,非“媧姐姐”莫属。年代久了,“媧姐姐”就成了呼之顺口又复合多义的“麻姐姐”。姑娘们乞巧所跳的麻姐姐,完全不是跳什么麻神。

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略的一点。我们在考察跳麻姐姐活动时发现,姑娘们的舞蹈动作自始至终都非常单一:两足弹跳双臂前后划动,节奏由缓变快,富有韵律,极像青蛙蹦蹦跫跫和在水中游泳之状。因桌前活动场地太窄太小,只能原地模拟舞蹈。可以看出,这是女媧氏族图腾舞的遗存。至于后面请神附体,求神问事之类,莫过于婚姻、家庭生育之类的终身大事,只是姑娘们不直接表露出来显得相对隐晦一些罢了。此外,壮族至今还有独具特色的青蛙节,每年正月前半月天天要祭祀青蛙,唱青蛙歌,跳青蛙舞。文县白马人神话中的白马皇帝阿尼嘎萨,刚出生时就是一只颇具神力的小青蛙,据说他的母亲茨嫫娜姆被山神赐孕,至今也崇拜蛙。西汉水流域也有同类型的一些传说、故事,如《蛙孩子》《青蛙娶亲》等等。蛙崇拜,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在文献和众多文物中随便都可以找到证据,再无需赘述。今天,我们从乞巧民俗的发源地看到这一活态现象,对跳麻姐姐之举也就见怪不怪了。巧娘娘赐“巧”,麻姐姐赐“福”,也是合乎情理的。

最后,再补述几句:一、综合分析,我以为仇池“麻姑仙洞”等一系列名称,很有可能是“蛙姑仙洞”之称的讹变,这只是推测,不成定论。二、女媧与伏羲虽有成婚的神话在流传,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位青春常驻的少女形象,而绝非是妇女形象。故此,姑娘们则称其为“麻姑”(媧姑、蛙姑)“麻姐姐”(媧姐姐、蛙姐姐)。

从以上种种考辨中可以得出结论，麻姐姐的原型应该是女娲。只有她，才配称人敬人爱的“蛙姐姐”“麻姐姐”。

### 五、秦、氏文化交融互渗的活态见证

近些年来，陇南相继成立了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和秦文化研究会，在域内白马氏民俗文化和嬴秦史、秦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队伍空前壮大，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包括文献、传闻、田野考古信息在内的大量新资料被发现和利用，以各种论著形式展示的一项又一项研究性成果琳琅满目<sup>⑨</sup>，并先后出版有《陇南白马氏民俗文化研究》丛书之《调查资料卷》《论文卷》《服饰卷》《歌曲卷》《舞蹈卷》《传说卷》《语言卷》及《首届中国白马民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和《嬴秦西陲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同时，市政协、市委宣传部还分别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陇南秦文化民俗资料》和《陇南民俗文化》四卷本。新近两年，相继成立的陇南民间文艺家协会、陇南文史研究中心、陇南民间文艺研究中心和陇南民俗文化研究会，积极开展工作，也出了不少成果。“学贵有疑”，研究无止境。随着各项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出现了好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单以民俗乞巧文化而言，以往曾经模糊过、误判过，或者异说纷呈的问题，如今已逐渐变得线条清晰，泾渭分明，学界主流意识已经趋同。

“民俗文化具有地域性和历史性，是不同地区的人民大众在其所处的特定人文环境中，经过世代相继陶冶和传承而发展起来的乡土风情；而其最初的胚胎，大都源自某些历史因子，包含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沉淀，是其成长的土壤。”<sup>⑩</sup>如巧娘娘的原型是女媧，麻姐姐的原型是女娲，牛郎织女传说及其延生的乞巧节都起源于西汉水流域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一个民族和地方民俗的尊重，就是对这个群体文化人格和精神品格的尊重。西汉水上游的乞巧风俗，源远流长。乞巧活动中为什么有跳麻姐姐的仪式呢？在甘肃秦文化研究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黄英先生作交流发言时指出：“这是西戎文化——确切

的说即氏羌文化，与秦文化的一种杂交混生现象。”<sup>⑪</sup>他认为麻姐姐当是古代氏族妇女中纺织麻布的能手，是被神话了的人物，即麻纺织业中的始祖神。其理由：一是陇右是大麻的原生地。考古发现最早的大麻籽，出土于新石器晚期马家窑文化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氏人有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如《华阳国志》载：“其人半秦，多勇憨……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三国志》裴注引《魏略》称：氏人“俗能织布，善种田。”《说文》曰：“緋，氏人殊缕布也”，即用不同颜色的麻缕相间织出的带花纹的麻布。武山县水帘洞有“麻线娘娘”的塑像。二是氏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唐代以后已融合于其他民族。他推测，“‘跳麻姐姐’原是氏族妇女独有的一项民俗仪式，由于‘其人半秦’，长期杂居，而与秦人的‘乞巧’祭祖风俗递加杂糅混合到了一起，因此形成了‘乞巧’与‘跳麻姐姐’完全不同的两种歌舞风貌，”三是“跳麻姐姐的歌词不涉及巧娘娘”。最后，他归结为“西汉水上游的乞巧风俗，既是秦文化的遗留，也夹杂着氏羌文化的成分。这是此地的乞巧民俗文化具有原初性和地域性的依据，也是秦文化与西戎（文化）杂交混生的一个活态的例证。”黄英先生单从种麻、纺织上侧重论证，仅存一说。但最终推出的结论，笔者还是认同的。

乞巧文化是多元混生的文化。刘兴华先生认为：“西周晚期，与秦人在西汉水上游地区（西和、礼县）进行斗争的，既不是羌族（寺洼文化寺洼山类型），也不是犬戎族（寺洼文化合水九站类型），而是当地的土著白马氏族（寺洼文化栏桥——碾子坡类型）”<sup>⑫</sup>。秦、氏之间或斗或合若从周厉王时算起，到秦武公建邦、冀县止，长达160余年。若算到秦孝公灭獯戎，则长达5个世纪。祝中熹先生认为：“战国后期嬴秦能长驱远征同列强逐鹿中原而毫无后顾之忧，就是以腹地安定、民族关系和谐为前提的。”<sup>⑬</sup>嬴秦农畜业结合的农耕经济动态，引导着白马氏开始过农耕定居生活，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矛盾的诱因。当然，既有先进文化的影响与感召，也不排除军事力量的征伐与胁迫，以及民族民俗间的尊重与相融互补。大秦王朝昙花一现，嬴秦

人渐行渐远,渐行渐少,留下的是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但秦人发祥地的氏族民众却一如既往仍生活在这里,此消彼长,反过来,又在威服影响着嬴秦遗民。此后,白马氏崛起,据《仇池国志》《西和县志》记载:“晋惠帝元康六年(296),飞龙养子杨茂搜为避齐万年之乱,自略阳率部落4000家还保仇池,并得上禄、阴平地,始建仇池国,自置洛谷城(汉武都郡治),史为前仇池。”<sup>⑨</sup>仇池政权盛衰,先后又在茄芦(今武都外纳)、武兴(今陕西略阳)、阴平(今文县)建立武都、武兴、阴平国。西魏废帝二年(553),叱罗协斩杨辟邪,武兴亡,仇池杨氏政权告终。自汉至南北朝,历时358年。杨难为在位时,“称大秦王,改元建义,置百官,行天子制。……面积约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西汉水流域是秦人、白马氏的活动区,自秦人之后,直至唐代,白马氏族又在此活动了近八百年。这还不包括后来白马氏融入其他民族的漫长岁月。

人是民俗的载体,离开人的传承,任何民俗将不复存在。流传到今天的乞巧风俗,应该说是多元的。我在《仇池风云》<sup>⑩</sup>里也写过乞巧活动,乞巧娱乐了白马氏人,白马氏人又丰富了乞巧内容。虽然是一部以仇池国史料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或多或少也再现了历史的真实。

万物生于土,在先民的心目中,最早的人类是由土地中而来,这从女娲造人等一系列神话传说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告别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男权社会以后,为争夺生活资源而形成的地缘体观念,人类对土神的祭祀越来越重视。“就殷商祀典来说,社母即简狄,社公应是契为司徒而民揖的‘契’;在周代则社母为姜嫄,社公就是后稷。”<sup>⑪</sup>基于同样的逻辑理由,秦族的社神可视为女修。简狄、姜嫄、女修应该是同一内涵与性质的人物。秦人祭祀先祖女修,其实也就是对社神的祭祀。同时,他们也绝对不会淡忘伏羲、华胥及华胥之女女娲。同样,长期生活在艰苦环境下的古老氏羌民族,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等诸多因素,原始拜物教和多神教的信仰非常浓厚,作为“低地之羌”的仇池白马氏人仍承继祖上“万物有灵”、视需要而臆造神灵的信仰传统,除天象崇拜外,山有山神、土有

土地、水有龙王、火有火神、牛有牛王、马有马王,还有始祖神、祖先神、五谷神、瘟神、坛神、山魃、毛鬼神、背篋神,应有尽有,不一而足。有神灵,就要祭祀,祭祀的方式方法莫过于与神同乐、人神共舞。时至今日,曾饱受民族挤压、战争与变故之苦的白马氏族后裔——文县白马人,虽然大多民间艺术、风俗习惯已濒临灭绝,但傩舞、傩祭仍保留着先民古老的祭祀风貌,演绎着他们的原始信仰,已成为近年来重点抢救保护和深入研究白马氏民俗文化的弥足珍贵的活态史料。其中,在池哥昼、麻昼、秋昼、阿里改昼、池母擗面、拐疙瘩、麻够池、甘昼、杀野猪及火圈舞中,有着独特的民族祭祀习俗和娱乐方式。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遗风遗俗相比较,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从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复杂,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孕育、成长,作为反映秦人、白马氏风俗相糅的乞巧仪式活动,自然带有神秘的“巫”性。它起源于民间,也兴盛于民间,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人们一直认为姑娘传统乞巧的内核是“心灵手巧”“茶饭针线”,但却忽略了终极诉求是封建家庭下的“巧媳妇”角色内涵。从跳麻姐姐活动可以看出,姑娘们的舞蹈动作,双脚弹跳、双臂前后划舞,节奏由缓变快,极像青蛙跳跃与游泳,不仅生动形象,逼真传神,而且还浪漫夸张,愉悦无比。蛙是女娲氏族的图腾,女娲是婚姻之神、生育之神,这在前文已有所陈述。姑娘借助于脚马法神向其虔诚问事,祈求赐以幸福美满的婚姻,她们的期冀是美好的,这和向巧娘娘祈巧并不矛盾。姑娘终究是要变成媳妇的,只有巧姑娘才有望成为巧媳妇,也只有巧姑娘才有望寻个好婆家和如意郎君,“母以子贵”,少受虐待。如此说来,“跳麻姐姐”仪项是“乞巧风俗”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密切的,不能分割看待。一些人觉着跳麻姐姐在整个乞巧活动中显得“突兀”,其主要原因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以“茶饭针线”为主的乞巧上,只注重了整个外在形式,而没有注意到深层潜在的内质联系。再说,如果对“麻姐姐”形象只停留在“纺麻织布的能手”的单纯认识上,似乎也有些太片面,因为在跳麻姐姐活动中也实在看不出有多少“乞巧”的成

分。神有大小之分,能力也各有不同,即使人们认为“神是万能的”,一位小小的“麻神”岂能满足得了姑娘们内心的所“乞”所“求”?何况目的又是那么明确。数千年来,跳麻姐姐活动一直在西汉水上游乞巧的始发地得以盛行,必然有前因后果的联系。正如王亚红女士所持观点,“巧姑娘、巧媳妇在针线茶饭、待人接物的某些方面和大传统所要求的‘贤妻良母’角色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表象看其是以狂欢形式在反叛封建礼教,但本质上却是大传统封建礼教道德规范的认可与顺应”<sup>⑤</sup>。

作为秦人、白马氏生息过的家园,大堡子山与周边的民风民俗显然存在有较大的差异,地域特色也很突出。综合各种资料分析,我以为乞巧风俗有可能起始于西汉水上游的永兴、长道和祁山一带,孕育期漫长,唐代仇池惊现“大人足”、武则天称帝后才有所规模发展,并向周边辐射,明清时代进入鼎盛期。白马氏“重淫祀”,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至今故地师公设“花坛”、师婆设“白坛”时全以五色小旗代替神祇,便是突出的例证。同时,过去当地人们多数“好巫信鬼”,村村几乎都有略似于师婆的女巫,十分活跃,她们皆以脚马自诩,不分三界什么样的大神、小神都去法,民间称此类人为“神婆”。她们以舞降神,是神的代言人,是沟通人、鬼、神的媒介。姑娘们跳麻姐姐活动,从招魂、请神上马(脚马)、祈神问事的整个程式来看,正是古老白马氏民族巫文化的活态遗存。

西汉水上游乞巧风俗是在特有的信仰习俗及生存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独特的祭祀仪式、祈求内容和娱乐方式。节日期间的许多传统舞蹈兼具祭祀性、仪式性、自娱性、民俗性等多重艺术特征,给人以神秘、神圣的联想。姑娘们照花瓣穿针引线“以察巧拙”,及跳麻姐姐以“祈神问事”等相关仪式,与其说是占卜问事,毋宁说更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游戏活动,从开始到结束就像是一个自己出谜面和自己解谜底的过程,整个活动一直充满了悬疑与惊喜。正如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所说的:“游戏一旦作为调剂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时,它就天生具有一种娱乐意义。”<sup>⑥</sup>就本质而言,乞巧

的民众化祭祀是贯穿着神圣主题的一种娱乐活动,信仰是仪式的神圣主题,歌舞是娱乐的方式,“一言以蔽之,它是一种‘神圣的娱乐’。”<sup>⑦</sup>也可以说,姑娘们在神圣名义下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就是娱乐。至于侧重于自娱自乐的男性儿童跳麻姐姐游戏,是伴随于姑娘们乞巧跳麻姐姐活动之下另一巫性活动形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 六、结论

历史上的西汉水上游秦人、白马氏人交错居住,战争与和平,亦敌亦友,此消彼长,民风民俗交融互渗、优胜劣汰,地域文化特色突出。秦人祭祖乞巧与白马氏民族文化递加杂糅,从而发展成为时日持久、程式完整、内容丰富的姑娘们规模化的乞巧节俗。笔者综合相关文献及地域资料考证,麻姐姐的原型应该是人类原始母祖女娲,跳麻姐姐活动所祈求的美满婚姻才是乞巧的终极目的。

### 注释:

①赵遼夫《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见《西北师大学报》2005(6)。

②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空间》见《仇池》。

③田佐《“乞巧”民俗为嬴秦民族生殖崇拜遗俗考》见《陇南文史》第七辑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④杨克栋《仇池乞巧风俗录》西和县文联印制2013年8月。

⑤②李凤鸣 韩宗坡 王亚红《西和乞巧民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179页、第334页。

⑥彭战获《晚霞湖畔乞巧歌》见《陇南春信》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⑦赵子贤《西和乞巧歌》香港星河出版社2010年版。

⑧于长敏《日本牛郎织女传说与中国原型的比较》,见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⑨彭战获《秦风遗俗乞巧节》见《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文流论文集》2012年9

月。

⑩转引自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90页

⑪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版。

⑫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⑬⑭祝中慧《嬴秦对汉渭文化圈的历史影响》见《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14年9月。

⑮邱政保《民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见《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总序，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⑯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嬴秦西垂文化研究》祝中慧序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⑰黄英《秦戎文化杂交混生的活态见证》见《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14年9月。

⑱刘兴华《关于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见《嬴秦西垂文化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18页。

⑲西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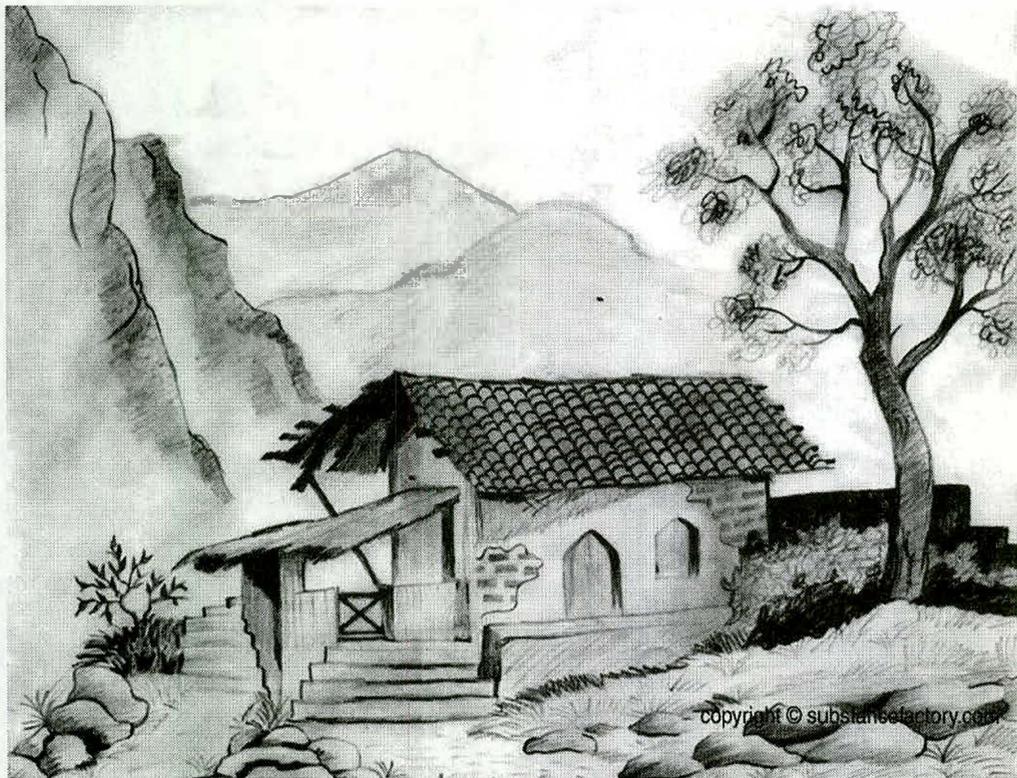
⑳彭战获《仇池风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5月版。

㉑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㉒钟敬文《民俗文化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㉓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西和县志办公室)



# 高台县乐善忠义班秦腔发源及其传承

王兴和

秦腔起源于西周时期陕西、甘肃一带,至今在我国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流行。历史文献中,“秦腔”一词最早在明万历(1573-1620)年间的《钵中莲》传奇抄本中出现,有一段唱词唱腔注明用“西秦腔二犯”一调。戏剧界公认:秦腔形成年代距今约400多年。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甘肃高台县宣化镇乐善堡“乐善忠义班”创建年代无考,明洪武十一年(1378)时已存在,有600年的历史,被当地人称作“天下第一”戏班。传说明朝开国大将冯胜西征时,在原有戏班基础上整建“乐善忠义班”。

山西省永济市《蒲州椰子志·综述》(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记载:明初开创河西,有大量内地移民流入,其中包括一些半农半艺的艺人,高台县宣化镇乐善堡(俗称大寨子)戏班,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该戏班创建年代无考,据当地艺人讲,乐善堡人系由山西迁移而来,来时就带有锣鼓、戏箱。元代戏剧被称为‘散乐’,杂剧演员称‘散乐人’,元杂剧的演出一般以名角的姓名作招牌,如‘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杂剧有‘××班’之称谓。”据此可知,明初“忠义班”所唱不是北曲杂剧,而是有别于杂剧的戏曲声腔。这些人既然迁移甘肃高台县宣化乐善堡时带有锣鼓、戏箱,说明移民前就有演剧活动。既有移民能将新的戏曲声腔带往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它在晋南本土当时广泛流行,就戏班存在而言,“忠义班”之前身也不应是孤例。“乐善忠义班”于洪武年建班演出,表明新出现的戏曲声腔可能已经发展

到了小戏的规模。《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班社与剧团》记载:“因好乐(唱戏)、好善(信佛)之民俗相沿未改,故堡名‘乐善’,戏班子亦名‘乐善’。乐善班亦农亦艺,以艺为主的江湖班子,故又称‘乐善忠义班。”从史书记载看,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班一是高台乐善忠义班。“乐善”名称最早见诸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由分巡西宁道按察司副使杨春茂编纂的《重刊甘镇志·堡寨·高台所》志记载:“高台所,领堡四十有四……乐善堡,城西二十八里”。乐善堡地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有两方面:首先,乐就是高兴、喜悦、快乐、喜欢、很愿意的意思,同时也指音乐。人们的美好愿望可以用地名表达;地名比戏班历史早。因此,地名与戏班演出风格及其所宣扬的“忠义班”演出名声远扬,人们才将“乐善”这一地名与“忠义”这一戏班名作了种种联想、解释,派生出了戏班。由于“好乐好善”才有了“乐善忠义班”。内部演员们都简单称:自己的戏班为“忠义班”。由于戏班所在地叫乐善堡,久而久之,“忠义班”才习惯性的称为“乐善忠义班”。其次,将戏班冠以“忠义”之名,主要是为了宣扬和秉承儒家文化中的忠义思想。

史料记载:清朝康熙年间仍然有购置戏箱和重建戏台。戏班自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殷启运任班主至今,继承关系明确,从未中断。“乐善忠义班”由20-30人组成,设班主1人,管班1人,演员10人左右,伴奏4-5人。1941年(民国30年),根据艺人团体“正乐育化会”号召,戏班名称改为以“社”字命名,将“忠义班”改名“华俗社”。1949年后,县内乡、镇有变动,原属宣化乡的乐善村被分为乐一村、乐二村、乐三村。戏班主体留在乐二村并沿袭至今。该堡关帝庙戏楼于清康熙四十七

年(1708)重建,道光二年(1822)再建。戏楼前竖一旗杆,顶端有方斗形灯匣。1953年破除迷信,工作组组织人打神拆庙,在旗杆顶发现忠义班帐簿一卷,上有“洪武十一年(1378)整建‘乐善忠义班’”字样,后账簿被工作组丢失。殷廷贵、刘兴和等为见证人。在原戏楼“续文匾”记载上,发现忠义班历次购置戏箱的记载,其中最早为康熙年间由殷启运任箱主时购置过戏箱。乐善堡现仍存有一个残缺斑驳的庄王爷和一个锈蚀的眉子碗,均为清代早期实物。这些都可以证明大寨忠义班活动的兴旺时期应在清康熙四十七年重建关帝庙戏楼之后。1949年后,乐善忠义班改称乐善剧团。1953年,县人民政府将“乐善忠义班”改名为“新民剧团”。1954年参加酒泉地区会演。1979年,根据戏班老艺人的要求,“新民剧团”更名为“乐二秦剧团”。原“乐善忠义班”骨干成员,自行组织商业性演出,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甘肃大辞典》(2000年3月甘肃文化出版社423页)一书中记载:“高台‘乐善忠义班’,秦腔班社。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发现‘洪武十一年(1378年)整建乐善忠义班’字样账簿一卷。另在乐善堡关帝庙戏楼发现该班历次购置戏

箱的记载,现存该班清代早期文物数件。说明忠义班明末清初就已存在。该班以唱秦腔为主,因亦农亦艺,好乐好施,故称‘乐善忠义班’”。演出剧目由师傅口传心授来完成。剧目内容形式介于“露头戏”和剧本戏之间。1959年参加全省戏剧汇报演出。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将传统戏打成“四旧”,禁止演出。部分衣装被烧,旧戏台被拆毁,剧团曾一度改演京剧。秦腔戏演出也限于《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1979年后,秦腔传统戏演出恢复。主要演出代表剧目有《正德戏凤》《红梅阁》《五典坡》《打金枝》《九龙岭》《顶灯》《十八扯》等。据现存剧本和老艺人回忆:在清朝后期,戏班演出剧目有近500本。民国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戏还能演300多部。代表剧有《回荆州》《八件衣》《出五关》等50多部。已知主要演员先后有许开元、许良志、刘士信、殷保廷、杨三保、许发昌、王来成、殷如珠、殷菊玉(板胡)、盛正魁、许林业、冯良基、许丰学、殷中仁等。“乐善忠义班”自成立以来,一直演唱秦腔。

(作者单位:高台县委党校)

## 简述政教合一的 卓尼土司制度及其演变

闹尔东主

卓尼土司制度是政教合一制政权。卓尼土司政教合一制是卓尼土司政权的核心部分,它在藏区诸多政教合一制中独具特色。因为卓尼政教合一制与西藏和拉卜楞寺的政教合一制又所不同,在西藏和拉卜楞是政权低于教权,而在卓尼则政权高于教权。历代土司的继承,遵循着世代延续下来的一种习惯法,即“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管理政务;弟任寺主,主持宗教;土司长子例袭土司,次子例袭僧纲。遇独子时,土司得兼僧

纲,政教合而为一”。在单传或其它原因,均由土司兼任僧纲,在卓尼大寺的僧纲谱系中,仅有六任是专职的,其余十四位由土司兼任。在卓尼政教合一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当土司早亡或继承上一时难以选定时,僧纲也破例承袭土司位。如第十五任土司杨宗业(丹增仁钦嘉)早亡后,已任卓尼大寺僧纲的杨宗基(钦甲久美多吉)承袭土司位并兼世袭僧纲。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即土司和僧纲的承袭者均年幼不能理政时,由祖母和母亲代理政

教事务。如第十四任土司杨声幼时,卓尼政教事务均由其祖母仁钦华宗代理。1937年8月第十九任土司杨积庆和长子杨琨被部属杀害后,年仅八岁的次子杨复兴继位,三子杨丹珠年仅三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杨积庆遗孀杨守贞,毅然代理卓尼政教事务。但当土司能亲政时,妇辈代理政务的局面就结束了。这充分反映了卓尼政教关系的特点和特殊性。卓尼政教合一制之所以延续几个世纪,还与中央王朝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外部因素分不开,如:明政府在卓尼大寺设立僧纲置;1713年,清康熙皇帝封卓尼大寺第二任僧纲兼法台阿旺赤勒加措为大国师,并赐卓尼大寺“禅定寺”扁额,正是由于中央王朝的大力支持,卓尼政教合一制度才得以长期发展而不衰。

卓尼土司的始祖约在唐末率其家族和十六部落,远离西藏,经过几个世纪的辗转迁徙,在元末明初由四川若尔盖进入甘南的迭部地区。1404年(明永乐二年)卓尼土司先祖些地征服了迭部达拉18族。1418年(永乐十六年),些地献地投明,入京朝贡,被授为洮州卫世袭指挥僉事兼武德将军,为第一任土司。1508年(明正德三年),第五任土司旺秀进京晋见皇帝时,赐其姓杨名洪,从此卓尼土司以杨为姓。此后通过武力扩张,辖区不断扩大。到清代,卓尼土司多次受封,势力极盛,成为甘青各土司中势力最强者。明、清王朝对甘青川藏区各部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藏族各部落长期相互对立,卓尼土司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卓尼土司最盛事辖区包括今甘肃卓尼、迭部全境和舟曲、临潭部分地区,面积达35000平方公里。辖领16掌朶,48旗,520族,15000余户,近10万人。

卓尼土司祖先些地以功授为洮州卫世袭指挥僉事兼武德将军,其统治区内最大的寺院卓尼寺主持为僧纲,僧纲如土司政权一样,一直掌握在杨氏家族手中,“兄为土司,弟为寺主”世代相传。清因明制,正式在洮岷河湟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除大力提倡和扶持格鲁派外,还在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分封了一大批地方喇嘛上层人物,使他们掌握当地一定的权利。卓尼

土司不仅身兼政教大权,而且是朝廷的命官和权利很大的地方统治者,同时又是朝廷的地方官员和该地的封建领主。卓尼土司既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直接受中央王朝调遣,同时又是该地区藏族的总代言人。因此得到辖区藏族的信任和拥护。土司与土民、土兵、旗长和总管之间,日益构成一种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司属民只知洪布(土司),而不论朝廷,朝廷也愿意并能接受这种统治制度。中央王朝的一切政令必须经土司衙门批准通过,才能最后执行实现。卓尼土司深得其属民的拥护信任,并延续五百余年之久。

卓尼土司不仅是当地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也是宗教的最高领袖,政治和宗教地位都直接由土司家族世袭继承。土司辖区最大的寺院是禅定寺,统领108个寺院,17个教区,包括今卓尼、迭部、临潭、舟曲等地。禅定寺的僧纲虽被封为“呼图克图”,但只能由卓尼土司家族世袭,而不是转世活佛。这种政权加神权的统治,形成了世代相传的权势,从而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对其辖区的统治。卓尼土司利用宗教巩固其政治地位,实行以教辅政,以政扶教,用宗教和文化纽带把辖区属民紧紧连在一起,这就加强了其属民的凝聚力及在政治和宗教上对土司的依附性。这就从社会生活、政治结构、文化风尚、道德伦理上形成了长期统一的思想基础,并成为其发展的精神支柱,这对维护其辖区内藏族的统一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权和教权集于一身的统治制度在西南和西北甘、青地区各族土司中是不多见的。

卓尼土司把其辖区划分成48旗,又按各旗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政策,并对藏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区别对待。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差别,土司统治区形成了农区、牧区、林区、半农半牧区等几种类型区,土司根据这几类情况实行超经济制度,即“兵马田制”(即上马为兵,下马为农)。兵马田是土司的武力基础和经济来源,土司把其辖区所有土地以旗或村为单位,分配给属民耕种,属民必须向土司交地租。杨土司对清朝时不愿服从统治的朱扎七旗实行总承制,相当于明卫所制下的总旗,总承制在组织和职权上均不同于其他各旗。杨土司

向朱扎七旗派一旗长，他不能直接办理七族内部事务，旗内一切事务和大总承协商解决处理。七旗百姓向大总承交纳特产，大总承再向土司交纳实物税。大总承由朱扎七旗民主选举产生，不能世袭，土司也不能直接任命。

杨土司不仅对其辖区各旗实行不同的政策，而且对藏汉族也区别对待。其辖区土地所有权属土司，属民只有永久的使用权，没有占有权。外地迁来的汉族，在土司辖区定居下来的称“孛房子”，他们对土司辖区的土地及森林没有使用权，更没有占有权，也不向土司衙门服兵役和差役，但当他们“吃了田地”，就要向土司提供杂事劳役及各种差役，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若藏民无子或缺嗣时，这些外来的“孛房子”，可以入赘招婿，在财产继承上儿子和女婿权利地位平等，不受任何世俗的歧视和偏见，使藏汉两族逐渐融合，并加深感情，这也充分反映了卓尼民族形成的复杂曲折过程。

卓尼历任土司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积极倡导全民信教，大力支持佛教兴隆昌盛，因而形成属民即教民、辖区即教区的格局。卓尼土司把宗教完全置于政权之下的同时，还不惜代价建立印经院，从精神上为自己树立统治权威，从而为政教合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文化条件。卓尼版《大藏经》的问世在全藏区颇负盛名，它既扩大了卓尼大寺在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影响，并使其政教合一制度更得民心。

在甘青地区的诸多土司中，卓尼土司势力最大，从形成到结束的500多年间，效忠中央王朝，成为中央王朝在甘南藏区的得力助手，颇受中央王朝的重视，以至于在历次改土归流中给予保留，直到1949年。卓尼土司的政教合一制度客观上在维护地方治安和发展民族经济以及弘扬藏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 土司衙门

卓尼虽自秦、汉时设临洮、洮阳诸县郡，且历代均设有地方政务机构，但因史料缺载，无从查考，政权机构只能从明代的千户所记述。

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授卓尼番族头人些地领世袭指挥僉事

兼武德将军衔，实授洮州卫卓尼土千户，于其地成立番族土千户所。这就是卓尼最初设立的地方政权机构——土司衙门。土司衙门的长官集政治、军事、民政各项权利于一身，实行世袭集权专制。从些地内附时起，到新中国成立止，统治卓尼长达530年，土司历20任。

土司衙门的内部机构设置不同于其它正规千户所。土司是最高统治者，其名义上虽隶属于陕西都司巩昌府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但实际上直接由朝廷驾驭，实行封土“自治”。土司下设头目2人，总管3人，分别掌握军政事务。大总管统管总务；二总管管理钱粮财务；三总管管理衙门内部杂务。头目统领传号4人，轮流在门卫处值班，为土司传达内外事务，处理属民中的一般纠纷案件。衙门内初设房科，由土司的秘书——红笔师爷联络管理，主要负责办理土司对外文书。房科内设9人，其中掌案1人，经书、笔帖式各2人，专管文稿起草，文书4人专管抄写。

土千户所的基层组织有旗（掌孛）、族两级，相当于今天的乡、村组织。旗长称长宪，各管本旗下征收钱粮、民案纠纷处理，遇到战争，领兵筹粮。族相当于今天的自然村，由小头人负责管理本族事务。

土司衙门内部的人选均从十二掌孛内产生，普通人员由大总管选拔，头目、传号、长宪均由土司悬牌任免。各旗长宪、总管由地方选举，经土司圈定后，发“嘎书”（藏汉两文委任状）委任。

十六掌孛是土司的嫡系部属，虽然也为村级组织，但不属任何旗下管理，直接隶属土司衙门，有城区内十二掌孛，郊区外四掌孛。每掌孛有小头人1人，由土司亲自指定。城区十二掌孛的头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权，遇事可集中后直接去衙门谒见土司，可直言陈谏，衙门内其它人员无权阻挡，当时称其为“参马都司”。

卓尼军民土千户所最盛时辖境面积达35000平方公里。辖领16掌孛，48旗，520族，15000余户，近10万人。

### 僧纲衙门

在明永乐年间头人些地受封土司的同时，其

弟傲地即为卓尼大寺寺主。自仁钦龙布授为世袭僧纲,统摄禅定寺教务后,以此成为惯例:土司长子袭任土司,次子承袭僧纲。如遇单传,则由土司兼任僧纲。

卓尼由于自明代以来就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僧纲并非纯管教务的寺院主持,而参与土司衙门的行政、军事管理,僧纲本身在其作为宗教中心的禅定大寺内另设衙门,即禅定寺内部机构“戴”、“拉”、“西”中称“戴”的组织。僧纲衙门的权限不仅在于管理寺院的一切教务,而且统辖管理 17 个教区内教民、僧侣的所有事务,通过对其属寺、教民的严格控制,协助土司稳固政权,推行政教合一制度。

僧纲衙门的辖区主要可分为 17 个教区(藏语称为“奥岗”),包括尼、什二部、麻昂、吉隆、朱仓、居果、遥萨、唐乃合、卡瓦、隆西、果玉、赛仓、完格、申藏、玛隆、昂茂、华吾、赛吾等 17 个奥岗。每个奥岗内又有属其统辖的子寺和教民(藏语称为“扎吉”或“拉代”),这些教民除承担本地寺院派送僧侣学徒以外,还无偿担负寺院的所有农牧业劳动,耕种寺院香火田地者,要给寺院纳粮交款,遇有战争,还要出兵。

僧纲衙门内的主要办事机构称尚署楼,由 17 位办事员组成,直接对僧纲负责。这 17 位办事员是由 17 个教区——奥岗各推 1 名代表产生。这个机构同时执行僧纲和法台的有关人事任免及其它事务决定,一套人马,服务于两个组织。将政务和教务连接在一起,其性质既有房科秘书的具体办公性质,又有联席会议性质。每位代表平时还兼任禅定大寺各学院的总务财会职务。他们既是僧纲衙门内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的具体办事员,又是各奥岗在统治中心的长驻派员。

僧纲衙门之所以作为具有政权性质的机构,是它不仅统治教区内的各寺院、僧侣和教民的一切事务;而且对土司辖地的属民有间接地统辖作用,它一方面用宗教神权来束缚属民的意志,协助土司衙门顺利推行其政教合一制度。所以,土司和僧纲两个体系,是卓尼政教合一集权的并存实体。从第一任土司之弟被委任为禅定大寺寺主之始,

土司衙门就与僧纲衙门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之间相互依赖,形成机体上高度的统一。在禅定寺僧纲衙门谱系中,历任僧纲均由杨氏家族充任,且大多由土司本人兼任,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卓尼土司政教合一制度下的政体结构表现出强大的粘结性和政权、神权、族权之间微妙结合的奥秘,而僧纲衙门则在其中起着纽带作用。

#### 洮岷路保安司令部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实行“民主共和”。各地产生于封建王朝时代的土司世袭制与共和制之间发生矛盾,限制着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同年 9 月,甘肃省议会以“土司制度和千户制度非民国所宜,必须予以废止”的决议,仿照云南、四川省提案,提出“改土归流”。但由于封建土司制在藏区沿袭已久,尤其是卓尼土司,自明代以来,忠实于历代封建统治阶段,封建意识在土司及其属民中根深蒂固,且卓尼地处偏隅,其“改土归流”提案,未能在卓尼付诸实施。

次年 11 月,为逐步实现“改土归流”计划,甘肃省议会决定停止各地现存土司的岁俸,并取消政府给各土司头人的支银决定,停发了卓尼等处现存土司头人的岁俸,但卓尼的土司制度仍在延续。

1928 年,国民党甘肃省督办刘郁芬以“临岷屏蔽于西南”为由,委任卓尼土司杨积庆为洮岷游击司令,司令部仍设于原土司衙门内,军事上隶属西北边防督办,行政上隶属甘肃省第一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

1932 年,甘肃宣慰使孙蔚如委任卓尼土司杨积庆为洮岷路保安司令,自此由保安司令部替代了土司衙门,统领卓尼地区的一切政治、军事、宗教大权,仍集政权、神权、族权于一身。内部机构除仍保留原土司衙门的机构外,又增设了八大处。其基层仍设“旗”,旗长仍称“长宪”。这实际上以纯军事组织的名称给土司加上了一个现代头衔,属民改称土司为“司令”。

司令部内部设:红笔师爷 1~2 人,专为司令拟办对外文稿。

大头目1人,秉承司令旨意,协助司令处理军政事务。

总管3人,分别管理署内总务、钱粮、庶务。

传号4人,负责传达及兼理普通民诉纠纷。

房科8~9人,相当于行政办公室,处理日常政务及内外文件起草、抄发、档案保管等。有掌案1人、经书、笔帖式各1人。

长宪(即旗长)48人,管理各旗下的征缴事项和执行司令部各项政务,是基层各旗最高行政官员。

仓官5~6人,分城区、迭部、黑番三处管理粮仓,负责验收田粮收缴和拨支事宜。

监所30人,分男女班房,狱卒分一、二、三班,一班属警卫班。

八大处是司令杨积庆仿照当时普通陆军军级编制而设的,亦非纯军事机构,除有时参战外,大部分时间协助司令执行其政务。军需处担负各旗下催粮赋任务,军法处兼理一些民间民刑案件,兰办处(即驻兰州办事处)为司令联系政治、经济往来及信息传递等。

洮岷路保安司令仅任两届,即卓尼十九任土司杨积庆与二十任杨复兴。统治时期从1928年到1949年,共21年时间。

### 设治局

1937年“博峪事变”爆发,甘肃省借查处事变之机,决定在卓尼成立设治局。同年10月,卓尼设治局在岷县专员胡守谦和保安四团团团长吉猛的亲自主持下正式成立,初由临潭县县长薛达兼任设治局长。设治局的内部机构有2室3科:

2室:合作指导室、警佐室。

3科: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

各科室有科长或主任1人,科员1~2人,办事员1~2人,雇员1~2人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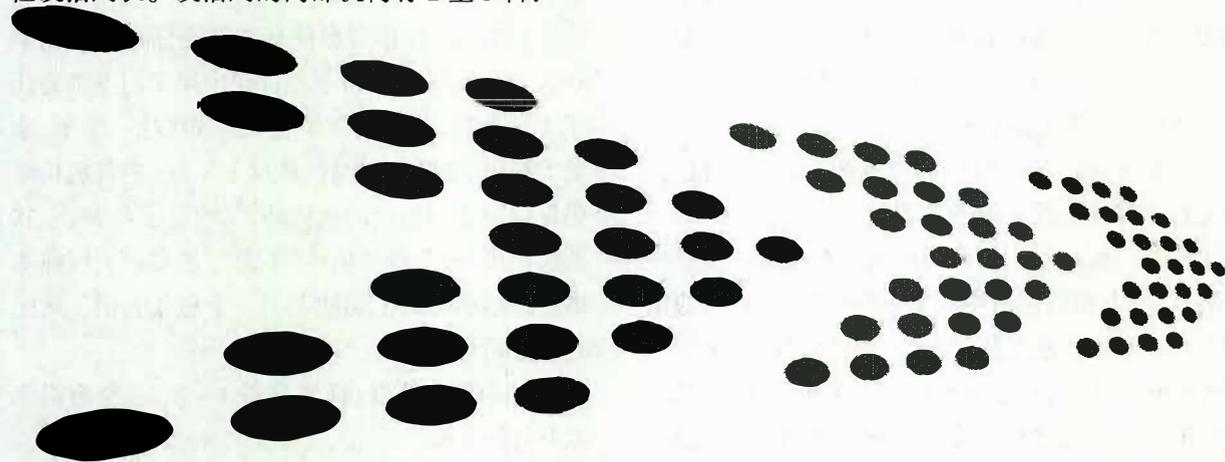
1944年北山事件中,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接受整编,撤销了原设的八大处,改设秘书、副官、军需3个室,1个警卫班,降低了机构级别。设治局的力量得到加强,实力和影响扩大。至此,编查户口、组建乡镇保甲工作才得以全面展开。

1944年作为第一步,开始先在洮河沿岸编查保甲,编查了柳林镇及洮南、洮北、北山、录竹、贡巴5乡1镇。废除了旧的旗、族组织和长宪(旗长)、总管、头目,任命了乡、镇长。

第二步在上、下迭部、插岗3乡进行编查保甲,因地处边远,情况与洮河沿岸迥异,遭到插岗、博峪、阳山、阴山黑番四旗群众的抵抗,直至民国1945年12月才将插岗、铁坝2乡编查完成。1947年才将上、下迭部完成。

卓尼设治局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在卓尼成立了其分支机构卓尼区党部和三青团分队部。并成立了司法处、卫生院、银行办事处、商会等机构,由设治局通过保安司令部负责办理交通、教育、医药、卫生、商业、合营养马等事业。至此,卓尼政教合一的制度逐步解体,在设治局、司令部并驾齐驱的双重领导下进入“改土归流”的初级阶段,1949年9月卓尼和平解放。

(作者系卓尼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 风雨沧桑说小屯

牛学伟

小屯是张掖市临泽西北部一个偏僻的村落。在洪荒时代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湖泊，芦苇摇曳，鸥鸟啾呀，水天一色，后来地壳沉积，水位下降，这里才演变成一个泉水四溢，杂草丛生，沟岔纵横的一块草地。其中九眼泉，五眼泉和涌泉是上游三处主要水源，小屯就处在三支泉水交汇的地方，所以亦称西沟岔。明代曾建堡，系军民屯田垦荒之地，又称广屯堡。

早在遥远的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乌孙、月氏和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放牧的地方，汉族人口极少。及至三国、魏晋小屯都是大片牧地，后来漠北和北方胡人将俘获或掳掠的本地土著俘虏安置在这里为他们种植粮食，因此这里已经有了零星的耕地。

公元764年，小屯被吐蕃占领，公元872年，回鹘据甘州，小屯又成为回鹘的草场。公元1028年，西夏李元昊攻克甘州，小屯一带成为西夏与北宋王朝拉锯僵持的战场。公元1226年5月，成吉思汗攻破甘州，次年西夏投降，小屯又成为蒙古族的牧地。由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不重视农业，加之战乱频繁，临泽一带饥荒严重，灾民逃散，十室九空。后来元世祖将附近逃散的灾民抓获后50户组成一个社，推选老农为社长，发展农业，同时还组织军屯，允许军士携妻到驻地一起屯田，当地农业有了初步发展。

公元1372年元朝结束了在甘州146年的统治。明朝收复河西以后，甘州又成为大明王朝在西北的战场。回、蒙、藏各部族都不甘心他们的败亡，一直对甘州虎视眈眈，故地小屯泉水横溢，民房倒塌，土地荒芜，饿殍遍野，一幅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据《甘镇志·岁计志》统计，当时临泽（甘

州前卫）仅有2648户，4776人。小屯一带人口不足百人。

从万历年起，明朝实行移民屯边政策，大批中原一带居民开始拖儿带女进入河西。这里的张、李、刘、牛、王、何姓先民都是明朝移民河西的。为了稳固地方，明朝统治者除了修筑长城外，还在各地大修堡寨。沙河堡，威狄堡，古寨堡，兰家堡，广屯堡，四回堡，柳树堡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广屯堡就是小屯堡的前身，系历代军屯之地，因屯垦历史较长，旧有屯堡，昔称“旧屯堡”，又因屯垦面积大，俗称“广屯堡”。清朝初年，灾荒不断，战乱频频，大片农田荒芜，直到康熙二十五年，随着时局稳定，人口增加，戍边守军减少，大部分军屯移交民屯，清中期，广屯堡又累遭回匪劫掠烧杀，堡子残破，日益衰微，又称“小屯堡”，设置广（小）屯塘，部分屯垦兼养军马，类似广屯堡南的马营坡。

关于回匪在临泽劫杀的记载，笔者查到三处：清同治元年（关于1862年）陕回白彦虎从梨园入境，南岸居民藏匿山洞，回部以辣椒等烩烟熏杀，邢姓诸多农户无一人幸存。清同治五年冬月，陕回西窜至新华，武举亢英年率众护寨，寨破，亢英年被残害肢解，抛入东寨子井内，从此东寨子沦为废墟。同期，宋家大寨子亦遭回匪杀戮，五六百人罹难。另据清末四回堡《牛氏家谱》记载，同治十年（公元1872年）十月初七日，回匪兵燹堡寨，牛秉旺，牛秉先等十余人罹难，堡寨颓废残破，人情日益冷落，从此，四回堡牛姓一部分逃往广屯堡和白寨子。

清末民初，地方以渠系管理，实行保甲制度。曹庄系“曹家庄”简称，旧时称沿沟，1958年改称

曹庄,亦属广屯堡。民国30年,小屯、曹庄均隶属于鸭暖乡第八保,白寨属于鸭暖乡第七保,古寨属于鸭暖乡第九保。1958年2月,小屯、曹庄、白寨,古寨、张庄均隶属沙河公社小屯大队。1962年小屯公社成立,曹庄、白寨、张庄、曹庄始从小屯大队析出。1983年4月,改生产大队为村民委员会,原小屯村划分为小屯、四回堡两个村,1984年又合为小屯村。2005年撤乡并镇以后,小屯村又隶属于鸭暖乡。

说到小屯,不能不提到四回堡。四回堡是小屯东北部的一个堡垒,因当地有一座羊神庙,四周以牛姓人居多,当地也有人称“牛家庙湾”。

据《临泽文史》(5)记载,清际,四个宁夏回民来此经商,日渐丰裕,在此地筑堡,始称“回回堡”,后改为“四回堡”。但另据有人介绍,“四回堡”这个名字早在明朝末期就存在了,那是称“四会堡”,后来讹传为“四回堡”了。明王朝实行移民政策后,临泽各地人群杂居,姓氏繁多,堡垒林立,信仰杂乱,道教,佛教以及各种巫术盛行,在现在的四回堡一带就有大乘会(也叫清茶会),三阳会(又叫玉华会),聚贤宫,皇极会等四个教会在堡子集结活动,所以当时应该称“四会堡”。笔者认为,清末,回汉矛盾十分突出,从目前一些家史资料看,当时本地乡民对回民十分藐视,常称其回匪或回贼,甚至在书写上也常常在回字前添一个卷毛旁,以示其为异类,因此四个回民来此置家兴业,并日渐丰裕,似乎不可。所以“四会堡”的说法也有道理。

但无论如何,四回堡始终是小屯的一部分。1962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小屯堡一直是小屯公社所在地。1976年小屯公社搬迁以后,小屯堡又成为小屯小学和小屯村委会的驻地,每天从这里传出琅琅书声和村民爽朗的笑声,传递出岁月的沧桑和盛世繁荣的景象。

有感于斯,邑人蒋万臻曾有诗《咏故里广屯堡》歌吟小屯:筹边之策重屯田,充军积谷固边疆;明代建堡称广屯,街衢二驿通四塘。地涌珠玉分三支,清流潺潺润旷土;碱滩沙漠秧竞绿,草丰林茂民盈富。

(作者单位:临泽县县志办)

## 武威会馆考述

宋立彬

**概要:**武威是古丝绸之路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内地通往西部边疆的重要商业枢纽,地理位置优越。武威西通新疆,南邻青海,北接内蒙,是西北民族贸易之重镇,所以历代都吸引了许多外地商人,特别是清代兴起的山西、陕西商人,他们致富安家,世代经商,称为世家。后在武威分别修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今虽遗迹不复存在,但并不掩盖他们为武威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武威;商业会所;山西会馆;陕西会馆

武威市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的东端,居丝绸之路之要道,自汉代起设郡置县,是集军事、经济、文化、商贸为一体的历史重镇,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商务团体,它兴起于明初(永乐年间),兴盛于清代,衰落于近代,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又揉杂着浓郁的传统,曾对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编著的《中国会馆志》<sup>①</sup>一书,从会馆的历史、缘起、类型、会馆与移民、科举等11个角度研究了会馆文化,是近期会馆研究的集大成者,还有王日根教授的《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sup>②</sup>《明清时期会馆与社会整合》<sup>③</sup>等文。在西北地区会馆研究方面有西北大学宋伦的《明清时期山陕会馆

研究》<sup>④</sup>《论明清时期工商会馆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以山陕会馆为例》<sup>⑤</sup>及西北师范大学张少婷《清代山西会馆慈善事业研究》<sup>⑥</sup>等。以上文论对会馆研究有很大贡献，但对地方会馆的细节少有论及，如《中国会馆志》书后所附的《各省现存会馆一览表》中，就没有关于武威会馆的记载。本人通过对武威会馆发展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实地考察研究，了解了一些会馆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所曾起过的作用，下面作一简略考述。

### 武威历代商业场所概况

商业会所在武威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据张澍《凉州府志备考》记载：“今武威最早为匈奴所筑的盖臧城，后人音讹为姑臧城。”<sup>⑦</sup>当时的姑臧城除了军事要塞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存储匈奴的军需物品，所有一定会有相当规模商业活动，当时的姑臧城也就成为了最早的商业会所。西汉武帝在武威设郡置县后，武威便成为内地与西域各国商品交流的重要商埠之一，中原的丝织品经武威运往西域，西域及中亚各国的物产也经武威大量传入中原。东汉末年“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sup>⑧</sup>当时武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货物丰积，市场兴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休，而河西较为安定，加上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先后建都于武威，武威便成了整个西北的政治军事重镇和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北魏诗人温子升就曾用“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的诗句，极言当年武威的繁华景象<sup>⑨</sup>。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1907年曾在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中获得8件粟特文书，从其中的粟特文2号信札来看，在西晋时，姑臧驻有粟特国大型商团，武威是他们在华经商的重要基地。《魏书·粟特传》载：“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可见“粟特不仅在武威有商团，而且还组织起了强大的武装来捍卫其利益<sup>⑩</sup>。”

隋唐时期，凉州为西域贸易门户，又是各国商

人和僧侣汇集经商与传教之地，是长安以西的大都会。玄奘西行取经，亲眼目睹了凉州的盛况后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西域及中亚商人前来凉州贸易或经凉州而入长安者较前更多，不少商人定居凉州，著名的昭武九姓商人即其中的一部分。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写道：“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sup>⑪</sup>描写了武威胡汉杂处、歌舞喧哗之景观。特别是“花门楼前见秋草”一句，回鹘称酒楼为花门，这首诗的花门楼就是胡人开办的酒楼，也是当时胡人聚集的商业会所。

宋、元、明时期，北方战争频繁，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丝绸之路贸易衰落。元朝时随着航海事业的兴起，对外贸易的路线已转移到了东南沿海，武威商业活动也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明嘉庆三年（1524），嘉峪关关闭，丝绸之路停止运行，武威的商业活动也日益萧条，商业均在区域间进行。嘉靖三十九年（1560），武威高沟寨、铎尖墩等地设立了茶马集市，用内地的砖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商业往来<sup>⑫</sup>，这为以后会馆的建立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

### 武威山西、陕西会馆的建立和发展

清王朝建立初，采取了发展经济的措施，各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也日益频繁。康熙三十七年（1698），开放嘉峪关，恢复中外贸易，武威商业又重新繁荣兴起，成为西北民族贸易之重镇。此外，清政府特许哈密回商免税到凉州贩卖商品，内地输入商品由省城转运，分销“武威者十之一二，发运新疆者十之八九”。<sup>⑬</sup>大量的外地商人来武威经商，并形成了“山西帮”、“陕西帮”、“直鲁豫帮”和“本地帮”，其中以“山西帮”和“陕西帮”力量最为雄厚，他们分别在老武威城东南隅（现武威城区文昌路会馆巷中）建立了山西会馆和陕西会馆。此外，在今武威市古浪县的土门镇和大靖镇，也分别

建有山陕会馆。<sup>④</sup>

武威的山西、陕西会馆始建于何时迄今无据可考,但比照相邻的兰州、张掖两地则可大致做出推断。张掖山西会馆是清雍正二年(1724)所建,而兰州永登县红城镇的山西会馆始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7)。武威的山、陕西会馆始建于何时虽不可考,但通过现存于武威古钟楼的陕西会馆创修碑上最早记载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故武威的山西、陕西会馆应建于清雍正、乾隆年间(1723—1736)。

两馆总面积约22亩,南边是陕西会馆,北边为山西会馆,之间仅一墙之隔。两馆均背西面东坐落,地形西高东低。会馆将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融为一体,形成起伏开阔、层次分明的院落群体,沿一条轴线依次排列,即山门、戏台(上、下两层)、牌坊、正殿和后楼。整个建筑气势恢宏,造型独特,木刻、石雕、彩绘、泥塑等遍布全馆,楹联、匾额随处可见。

山西会馆分为南、北两个院落。北院主要由照壁、山门、戏楼、左右厢房、关圣殿和春秋阁构成。建筑群的基本格局,是由东向西纵深延续,地势由低到高渐次延伸。关圣殿是山西会馆面积最大、形体最高、建筑最雄伟、規制最讲究的主题建筑和中心殿堂,也是客商信徒们用以祭祀和举行重大仪式活动的场所,显得神圣而庄严。关羽作为比肩“文圣”孔子的“武圣”,在民间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他作为现今山西运城籍的身份,自然更被当时的晋籍商人所推崇。他所代表的忠、义、诚、信形象又与晋商所追求的经商理念与做人原则相契合,更为客商信徒所崇拜和敬仰。南院东侧矗立着一座与北京天坛回音阁相似的圆形建筑,在武威古建筑中显得别具一格。

陕西会馆由照壁、山门、乐楼、牌坊、天棚、正殿和春秋阁组成,曾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五十七年(1792)、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行过多次修建。重建的资金来源则多为陕西各县各商号以及少部分甘肃本地商人的捐款。比如在乾隆三十

八年(1773)创建陕西会馆有同州府朝邑县,西安府三原县、咸宁县、蒲城县、富平县等地的捐银。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石碑中除过乾隆三十八年(1773)捐银修建会馆的县外,还增加了渭南、宁州、临潼等地的捐银,这说明有更多的陕西商人参与进来。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石碑上还有不少甘肃的捐银,比如镇番(今民勤)、皋兰以及武威本地的商号,此外还有武威石匠、皋兰银器铺等从事手工业的人参与捐银,可看出在这八年中当地商业的逐渐发展状况。此外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石碑中记载有各商号的捐银。比如朝邑县的大顺张号、元盛现号、顺兴王号、新兴杨号、信义王号、永顺李号、德顺张号等,以及大荔县的宏盛王号、三合薛号、公信里号等商号。在此石碑上,捐银的都为商号,这说明在这十一年期间,参与会馆事务的行业增多,陕西商人与当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最后在捐银的数额上,大多都在一两至三两不等。正是这一笔笔小额的捐银日益积累才修成这规模宏大的会馆,就像碑文中说的“君子曰美哉始基之矣,爰勒负王民以垂不朽”。

会馆成立后担当起了“联络乡谊,感怀乡情,会聚商议,祭祀神灵,聚众演戏,帮助同乡”的责任,除每年过财神会时循例隆重汇演五至七天外,以其他原因许愿演会戏的也不少<sup>⑤</sup>,如某家商号生意兴旺要酬谢神灵演几天会戏。还有某商号发生了火灾,以为是神灵的惩罚,为保佑赦罪,也要唱几天会戏。每唱会戏时,城乡群众云集,场面十分热闹。

在会馆的各商号经营中,最注重的是接待顾客的态度和方式。一般商号都在柜台前设有条椅、烟茶招待客人。客人进店后首先让座、倒茶,然后礼貌地征询顾客想买点什么货物,并对商品详加介绍。对生人大都现钱现货,货款两清,对熟人顾客则灵活掌握,有现钱交现钱,无现钱的可记账年底结算。顾客出门时则有接待人员送出门口<sup>⑥</sup>。而在商业利润的分配上,一般采取“钱”多分、“人”少分的原则。即东家多分、掌柜少分<sup>⑦</sup>。这些经营方式

对本地商贸界的经营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山西、陕西会馆遗址时至今日已荡然无存,现在只有在凉州区古钟楼下保存的1980年迁移过来的陕西会馆的春秋阁和东西两廊,以及很少有人问津的7块记载会馆重修事项的石碑<sup>⑧</sup>。除此之外,会馆的遗物还有武威文昌宫(现武威市博物馆)门口的两个石狮子及馆内保存的当时陕西会馆用于礼仪的缀檐、幔帐等精美丝绸制品,记载着会馆在武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那段风雨春秋。

### 武威会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武威会馆自清朝建立以来,在数百年间一度成为当地车马盈门、商贾云集、名流荟萃、高朋满座的场所,“出入皆贤士,往来俱俊杰”,对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据《林则徐全集·日记》记载,1842年秋,林则徐因禁烟被贬从西安赴新疆途经武威时,与武威地方名流酬唱应和,为陕西会馆书写了“浩气凌霄”一块赞匾<sup>⑨</sup>,笔力遒劲,正气浩然,爱国之情溢于笔端,令当地仕民肃然起敬,倍受鼓舞。还有曾任两江总督的牛鉴题写的“日在天上”山门匾以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的“陕西会馆”门匾,都是会馆倍加珍视和引以为荣的名匾,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成为武威历史文化方面的一件憾事。

会馆的建立和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商业帮会和会馆的带动下,各地商人纷纷到武威经商,有的就地安家置产,世代经营商业,成为当地的商业世家。这些商号拥有一定数额的资本,具有一定的字号名称,有固定的经营地址。据《凉州区商务志》记载,清末民初时,武威城内共有大型商号268家,从业人员1800多人,资金300多万元<sup>⑩</sup>,较出名的有山西商号“同吉庆”等,此外还有小商小贩近1500户,繁荣和发展了本地的商贸经济,演绎出许多商贸佳话。如当时武威著名的商号“万寿堂”,创始人是明朝万历年间来武行医的安徽人王日新,该堂配置而成的“王蛤

蟆膏药”誉满全国。王蛤蟆膏药能治几十种病,按照药铺医生的指示,贴到患者足、膝、腰脊等部位,即有药到病除的疗效,被誉为“万应膏药”。慕名前来的购药者络绎不绝,就连第十世达赖喇嘛也躬身求医,并赐“医林硕望”的匾额<sup>⑪</sup>。1956年,王氏家族当家婆韵善年和王氏弟兄,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将“万寿堂”核算折价980.47万元,与武威药材公司合营。同年,王家第十七代传人王金泉、王生泉将祖传300多年的秘方在甘肃省中医药工作会议上献出,惊动陇原。后经本地医药界对配方进行改革,更名为“风湿关节膏”,由武威制药厂批量生产,被列入《甘肃药典》名方<sup>⑫</sup>。后该厂又在两种膏药基础上,研制成“凉州祖师麻膏药”,获甘肃省优质产品称号,受到各方好评。

在教育方面,清朝时就有面向山西、陕西后裔的私塾。进入民国后,在1943年和1946年,山西、陕西旅凉同乡会分别创办了“晋华”、“秦光”小学<sup>⑬</sup>。新中国成立后,武威当地政府在1951年将同乡会会馆财产收为国有<sup>⑭</sup>,政府接管两校,分别更名为会馆巷一、二小学。至1963年,政府将两校合二为一,统称为“武威县会馆巷小学”,并列为县重点小学<sup>⑮</sup>。2001年撤市建区后,学校遂更名为今天的“凉州区会馆巷小学”,直至今日,会馆巷小学也是武威市质量最好的小学之一。此外,河南同乡会还在当时河南会馆所在地建立了崇华小学,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武威第九中学<sup>⑯</sup>,它们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培养出了大量人才。

转眼今日,会馆已不复存在,但会馆遗风不曾消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武威招商引资的不断扩大深入,许多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武威建厂经商,并相继建立起了浙江、江苏、福建、河南等新的商会,对推动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2014年,武威在全省设立了首家保税物流中心,并开通了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天马号”,为武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上搭起了商贸经济通往世界新的欧亚“大陆桥”,这也许是对传承会馆遗风、实现未来梦想的最好诠释吧。



# 明清民国时期定西的工业和商业

张慧

定西人民素来人情朴直、崇尚“民务耕牧，耕读传家”的传统，商品经济观念淡薄。在很长一个时期，受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当地人们小农意识的制约，生产生活主要依赖农业，商品经济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地方工业始终局限在家庭作坊小手工业的圈子内，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因此带来的生计艰难可想而知。

自元代以后，仅出现砖瓦制作、木器、铁器、酿造、油料加工等个体作坊的手工业，设备简单，工艺落后。民国时期，工业经济有较大发展，在县城和较大集镇陆续出现了首饰制作、修理等较先进的小手工业者，以及从事缝纫、毛织、木料、石材、铁器、皮料加工的各种工匠，产品有木器、铁器、面酱、食醋、糕点、皮褥、毛线、毛衣裤等。解放前夕，定西县有酒坊6家，年产6.5万斤，榨油作坊10数家，年产清油45万斤。县城主要手工业商号有“荣盛祥”酿酒坊，“公盛福”“正兴西”“复盛和”糕点坊，“裕元亨”副食店，“通盛染”染坊，“王兴炉”“乾盛炉”“福顺炉”“忠盛炉”“王炉院”“俊兴炉”“福兴炉”“万兴炉”“永兴炉”“孔炉院”铁匠铺，侯尚智、郭福、曲凤翔、曲守仁、曲武华等所开木匠铺，曹寿山、段克敬、马俊山、周定国等所开缝纫铺，侯舜臣所开装裱铺，从业100多人。清朝末年，出现了私制鸦片烟膏的家庭小工场，乌黑色的烟土倒入铜锅中，然后用火慢慢地熬炼，熬成制金黄色的鸦片烟膏。

明代中叶，定西城逐渐繁华鼎盛，随着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远在内地的定西，商业逐渐兴起，出现了“商贾云集，比屋鳞次，烟户极繁”的局面，因此定西城又有“小扬州”之称。

清光绪年间，县城有本地人经营的当商1家；大布商4家，经营土布，业主均为山、陕人；各类商户50余家，客商与当地商户各半。一切日用杂货，无不仰给于外地。出境产品以粮食、烟叶为主，少量销往兰州、榆中等地。

民国时期，定西县城商业经济发展迅速。输出产品以粮食、羊毛为大宗，多向兰州、榆中等地输

出。商品依靠牲畜驮运、人背肩挑。西兰公路通车后，逐渐为胶轮大车、汽车代替。商品主要来自外地，布匹多由陕西、湖北购进，山货、木料主要由临潭、岷州运入，生铁、茶叶、花生主要来自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甘肃陇南，棉花、食盐多由北路运来。设在县城的较大商号、店铺有近百家，仅东城门外永定桥至许公街（今汽车站）一带、东关至西关一带，较大商号就有50多家，业主以陕西、山西、河南、通渭、天水等外地人为主，本地业主不足三分之一。“厚致福”（原名“自立公”）布店、“天成福”布店、“兴信通”布店，“万盛堂”药店等号店较为有名。西兰公路通车后，商旅往来增多，饮食业起色较大。30年代，县城旧十字出现了第一家带字号的“芳春园”饭庄。40年代，有“安乐园”“兴隆居”“德民饭店”“西北饭庄”“陇海饭庄”“新庆食堂”“国禄饭庄”“义庭面馆”“德盛饭馆”“俊盛园”“自然饭馆”“国福饭庄”等12家饭馆和1家山西刀削面馆、1家回民羊肉馆。旅店业有安、宁、乔、马4家规模较大旅店、脚骡店、骆驼场、车马店。另外，“复兴昌”“荣泰昌”“永庆福”“荣顺昌”“泰和堂”（以上为药店）“自立合”“亨泰号”“大成公”（以上为布店）“禄成永”“魁盛祥”“义和海”“协义恒”“吉泰祥”“舜恒麟”“忠盛成”“新顺和”“玉生祥”“玉润生”“祥盛裕”“德生成”“茂发源”“长盛裕”（以上为布店）“通兴斗行”“两义斗行”（以上为粮行）“春和隆”“长裕和”“明盛和”（以上为脚骡店）“美生照相社”等，这些杂货、运输、粮行、典当、染坊、酒坊、酱菜坊、药店、旅店，是当时定西古城号店中较有名气者。再者就是散落旧城各处混街的小本经营小商小贩了。

与正当商户的清淡萧条不同，一直到解放前，从县城到集镇，到处可见鸦片烟馆。由于吸食鸦片者日增，鸦片烟膏需求数量巨大，投机商人便从云南等地购入“烟土”或鸦片成品，拿回本地熬炼鸦片烟膏，出售给鸦片烟馆，盈利不菲。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8月古城解放。

（作者单位：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董振堂三出三进高台城

银开源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究竟是怎么牺牲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来自林炳才的回忆录《高台雄风》，说是董振堂军长站在东城门楼上指挥红五军将士弥补被敌突破的缺口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倒了城墙外脚下牺牲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一月二十日战斗进行到最后，董振堂军长被敌人包围，他跳出弹坑，单腿跪地，双枪并举，轮番向敌人射击，直到打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他冷静地扫了一眼扑上来的敌人，然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抠响了扳机。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是亲历战斗的经历者，一个是搜集整理的当地史料，我不敢怀疑任何一个，但是我还知道一种说法，那就是父亲讲给我的一段故事——《董振堂三出三进高台城》。父亲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37年1月1日早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率领下，一枪未发民团就缴械投降了，守城的国民党一个团的部队早跑到酒泉去了。进城后军部设在了城北面的天主教堂里。为了准备敌人的反扑，当天下午负责宣传的就开始在大街小巷书写抗日标语，征集军粮的开始下乡走村入户征购军粮，征兵的开始征兵。我家当时比较富裕，爷爷在粮食局工作，家中还种有五十亩田地，所以当红军到我家征粮时，爷爷就主动献出了十斗麦子，五十斤牛油，并且打了收条。一个姓叶的连长看到我父亲这一辈兄弟姐妹五六个，就动员我父亲参加红军，爷爷就答应了。穿的衣服是自己的，当时只给了一捧烟叶，一顶带红布五星的灰帽子，父亲就跟着进城了。新兵连被派到北城门驻守，父亲胆小，晚上站岗有老兵陪着，白天跟着学习打枪。十二日马步芳的部队开始包围高台城，把主攻的方向放在了东西两个方向。驻守西门的是投诚过来的民团，由于时间紧还没有被改造教育好，战斗进行到十五日时，他们看到形势有变，一下子反水了，于是西城

门失守，敌我开始了巷战、拉锯战，经过反复争夺还是没有把西城门夺回来。紧接着东城门失守，南城门失守，使攻城夺池战变成了巷战，到十九日晚上，除一部分人突围外，剩下的人大都被逼到了天主教堂附近，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在北城墙根挖了一个洞，突出重围，来到黑河边，董振堂军长一清点，发现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重要成员不在，立马带着特务连又返回了城里，边战边找，由于天主教堂已经被敌人占领，行子里到处都是敌人，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杨克明政委，只收罗了十几个散兵，他们第二次打出了高台城，把伤员安顿好后，董振堂军长不甘心，又带着特务连返回了城里，这一次他们被马家军死死咬住了，一直打到只剩下董振堂军长一个人了。董振堂军长打出高台城，已是无路可退了，马家军把整个北河滩都包围了。马家军一边缩小包围圈一边叫嚷着“抓活的，阿格（哪个）抓住了阿格（哪个）有重赏！”董振堂军长腿部已经受伤了，他就单腿跪地，双枪并举，轮番向敌人射击，直到打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他冷静地扫了一眼扑上来的敌人，然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抠响了扳机。马家军为了争夺董振堂军长的尸体，就开始了互相残杀，据说死了四五十人，后来被一个马连长抢到了，这时已经是二十日的凌晨了。

父亲在战斗中被冲散以后，一直装死到二十日中午马家军从北河滩撤去，才跑到北山里，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董振堂三进三出高台城》这个故事是父亲八零年给我讲的，我一直想把它写出来，但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再加上父亲的去世，我一直没有敢动笔，直到今天——在红西路军烈士纪念馆修葺完工征集史料的今天，我才把它写出来，权算作我对西路军烈士的一点儿缅怀吧，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作者单位：高台县南华学区）

# 《韩正卿日记》介绍

张志纯

韩正卿，甘肃宕昌人。1933年出生，1949年9月参加革命。

终生写日记，雷打不辍。“文革”来临，怕“引火烧身”，把1965年前的大部分珍记焚毁。

1965年5月从省委组织部下放武都县东江公社以后的日记延续不断，直至今日他81岁高龄，仍在每天记。

2008年，他接受子孙亲友提议，把日记印成书，作为家史资料传下去。

我有幸被纳入“整理编校”行列，从2008年底到2014年初，历时5年半，出版4部。这是他从1965年29岁到1997年61岁的32年间，连续在全省最贫困的4个地方各工作8年的真实记录。

第一部：《韩正卿日记·东江卷》（1965年5月1日至1972年3月17日），精装8册，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220万字。

第二部：《韩正卿日记·民乐卷》（1972年8月9日至1980年9月13日），精装8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309.6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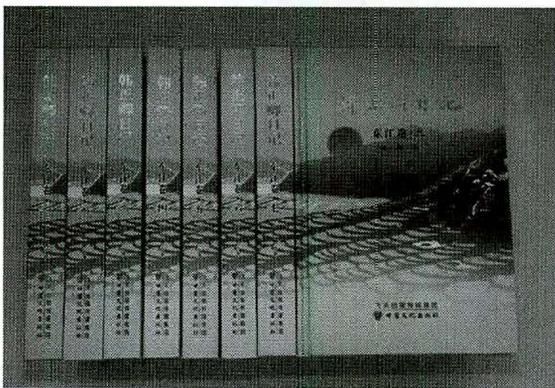
第三部：《韩正卿日记·定西卷》（1980年9月13日至1989年3月31日），精装8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355万字。

第四部：《韩正卿日记·引大卷》（1989年4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精装8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380万字。

4部总计32册，1264.6万字。1998年至2015年及其以后的日记，正在整理，俟期印刷。

韩君日记，“真”字贯穿始终，真时、真地、真人、真事。翔实无误地记录了他担任八年东江公社党委书记、八年民乐县委书记、八年定西地委书记（含副），八年引大人秦工程指挥的领导活动。32年间，他如何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带领干部群众大干、苦干、快干，如何改变面貌脱

贫致富，在这千百万字的日记中写得清清楚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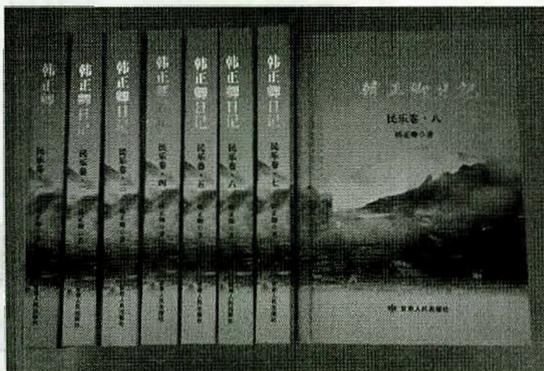


东江——前临白龙江，后靠雷疙瘩山，中部是干石坝滩。土地挂在山坡上，耕作条件极差。全公社6000多亩地，4000多口人，人均1亩4分。原先亩产只有百十来斤。由于长期生产搞不上去，是全武都“吃粮靠国家供应，花钱靠政府救济”的后进公社。

从1965年3月开始，公社党委面对穷困面貌，制定征山战水治土规划，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奔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路，靠全民的双手建造自己的新生活。号召全公社学习大寨人改天换地的精神，“大寨人能办到的，东江人也能办到”。经过30多次大小会议讨论，制定出征山治水的蓝图。于是瞅准“要增产，修梯田；要想富，修渠道”的主攻方向，带领干部群众大干，在斜坡上修造梯田2000多亩，人均有了半亩水浇田；劈开3个山头，跨越5条深沟，征服7里长的悬崖陡壁，穿过10里山渠，移动几十万方土、石，修起了盘山渠，把瓦渣沟的泉水引到雷疙瘩山上；在梯田最高处用卵石衬砌修起容量6000立方的蓄水池；为了保证上山水源，还在瓦渣沟建起一座容量50万立方的水库；组织浩荡大军，在白龙江河滩上摆开“与河争地”的战场，筑起2000多米长、2米多高的拦水大堤；在江滩上炸掉沙石坝，垫上厚肥土，平整出

1200多亩的“人造平原”。每年可收两季作物：一季水稻，一季油菜。有了地和水，又在“广种多收”上做文章。根据东江水土气候条件，大力提倡种植林果药材，在一片不宜种田的泥石流堆积滩上开垦出100亩桔园，带领技术人员到四川购来桔苗，栽下致富之根。基本条件的改变，为长远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到1972年有良田5468亩，总产381万斤，比1970年的260余万斤，增加120多万斤。原来只有18亩水地，后来是2500多亩，原来亩产180斤，后来亩产1300多斤；3022亩山地的亩产也达到七八百斤；桔园面积发展到309亩，1995年桔子产量达61万斤；种植花椒541亩，100多万株；种植蔬菜120多亩，年产菜200多万斤。人均收入显著提高，生活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今天的幸福生活，群众没有忘记当年日夜带领他们奋战在河谷山头上的带头人：“没有韩书记的正确领导和拼命实干，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先锋之歌锁不住，嘹亮之声传四方”，韩正卿在东江公社的辉煌业绩轰动省内外，新闻单位蜂拥而至，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战天斗地绘新图》；兰州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红日照东江》，在全国各地放映。



民乐——地广人稀，干旱缺水，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困难，是全省18个贫困县之一。1992年秋正卿一上任，在抓全面工作的前提下，首先搞调查研究，深入全县11个公社，115个大队和数百个生产队，从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中了解县情；涉足县境祁连山北麓的10多个山沟和各河流水岔，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认定制约民乐发展的四个问题：一是没有水库，洪涝季节的水白流掉，干旱时候无水浇；二是渠道破烂，渗漏严重；三是土

地七沟八洼，地力不强；四是缺树少林，生态失调。他针对过去“一个将军一道令，一届班子一个样”，没有统一的长远规划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组织350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队，他亲任队长，利用一年半时间，对全县进行了“五好”（渠、路、林、田、居民点）规划，形成“两图一书一盘”（平面规划图，立体鸟瞰图、施工说明书和形象沙盘），为民乐农村的综合建设制定了远景规划。在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会上他慷慨陈辞：“民乐是个好地方，但是是个穷地方。穷则思变，我们要组织全体干部群众按《规划》彻底改变民乐落后面貌。”于是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连续奋战八年，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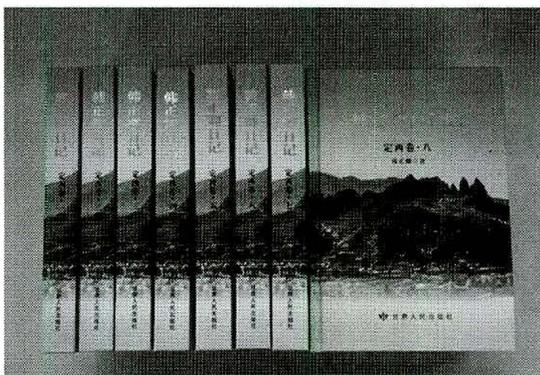
水利建设上，他提出兴建“十库、百塘、千里渠、一万个涝池”。从1972年至1980年，他统帅全县人民相继建成双树寺、瓦房城两座中型水库，总库容4690多万立方；翟寨子水库开始施工；海潮坝水库开始设计；建成河牛口、柳家坝、沙嘴口等6座小型水库，总库容6000多立方；建成东湖、山角湖、泉滩沟、石家沟、板凳沟等6座塘坝，蓄水20.8万立方；建成渠道816条，总长2500多公里；建成县城、卧马山、卜里沟、砂嘴口、西何庄、水磨等6处从水库、塘坝供水管道，城乡居民首次吃上自来水；还改建了一批人、畜饮水涝池。水利设施的改善，有效增加灌溉面积，全县水浇地由50年代的13万多亩，增加到65万多亩。

农田建设上，县上成立农田基建指挥部，先是以公社为单位，组织大会战，分片治理；接着组建以民兵为主体的农田基本建设常年专业队，由140多名县、社、队干部带领4000多人，集中农用机械，苦战三年，平整条田19万多亩。在完成25公里长的益民渠两岸整地任务后，又把会战大军开进千年古荒——北部滩。在此经过一番苦战后，在民乐版图上新添了一块3万多亩的良田；动员沿山高寒社队的5万群众迁徙北部滩安家落户，新组建了北部滩人民公社。治水改土带来了粮食大增产，过去民乐粮食总产一直在一亿斤左右徘徊，80年代达到4亿2千多万斤！干群说，这都是韩书记带领我们修水库、建渠道、平条田的结果。

林业建设上,韩书记同样下了很大工夫。民乐60年代前,林木寥寥无几,大地秃秃无绿。他任职的八年,也是植树的八年。每年春季动员全民栽树。实施远景规划时,坚持把渠、路修到哪里,树栽到哪里。原来全县实际只有一个民国时建成的140多亩的“洪水苗圃”,远不适应大规模植树的需要。1973年春,全县掀起植树造林高潮,县内树苗不足,从张掖、临泽购苗100多万株。是年,他决定在北滩等地建起4300多亩的县办苗圃,同时要求各公社建起社办苗圃,1976年全县育苗5400多亩。1980年出圃265万多株。全县普遍造林18000多亩;防风固沙林43000多亩;护渠、护路林200多公里。1978年,民乐被国家列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区,第一期造林2.7万亩。为了全面发展经济林、提高农民收入,他带上精心扶持培育成功的优质苹果梨样品走社串队,向基层干部和群众宣传,号召广泛栽植;同时到省上有关部门出示样品,争取资金,扩大县园艺场苹果梨建设基地。到1980年,全县苹果梨已发展到30万亩,仅此收入就达8000多万元。

交通道路上,正卿进入民乐,他首先目睹和接触到的是县乡公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乡村道路坑坑洼洼、田间地头无路。在长远规划时,把“好道路”列为主攻目标之一。经过八年努力,重新改建县城至扁都口、县城至北部滩、县城至南古、县城至民联四通八达的主干公路120公里;县境至西宁国道路基由6米拓宽为8.5米,全部铺垫砾石,铺筑沥青路面49公里;改建11个公社通往115个大队的社队简易公路115条260多公里;修成田间道路1000多条3500多公里。洪水大河自古以来无桥,每年都有人、畜被大水冲走。1975至1976年,正卿亲自指挥,改线新建了第一座大桥,结束了民乐最大河流无桥史。

定西——定西是清朝封疆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向朝廷奏折中谓之“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现代周恩来总理知情后寒心落泪、国务院扶贫“三西”之一的穷困地区。为之正卿在全省最穷的公社——东江,苦战八年;在全省最贫的县——民乐,奋战八年;在全省最苦的地区——定西,以同



样的精神,更大的魄力,大干了八年。

大作远景规划——1980年正卿任职定西后,正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制定“七五”规划的宏伟纲领。他根据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定西后作出的“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方略,针对定西特点,组织充分论证,提出“三年停止破坏,两年巩固提高,五年改变面貌”的十年计划和“十个三”的宏伟规划,即在30年内办好30件大事:1.“三学兴办”:正规学校、职业学校、党校与干校;2.“三料当先”:燃料、饲料、肥料;3.“三户齐抓”:专业户、重点户、贫困户;4.“三渠畅通”:人才渠道、信息渠道、流通渠道;5.“三工齐上”:国营工业、集体工业、个体工业;6.“三林共造”:用材林、薪炭林、经济林;7.“三水同抓”: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8.“三路兴建”:公路、农电线路、广播线路;9.“三田不放”:梯田、沟坝地、水地;10.“三风大正”:党风、学风、社会风气。

大战电灌工程——1980年8月,正卿上任定西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他背负省上的厚望,决心在这里继续抓水抓土。1981年,服从地委决定,担任靖远县兴堡子川电灌工程指挥部指挥。他吃住工地,精心指挥,与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群众共同奋战三年,建成八级提水总扬程439.75米,隧洞13座,渡槽7座,总干渠建筑物128座。1984年总干渠调试上水,1985、1987年,北、东干渠先后通水,使靖远县9个乡的15万亩荒旱地变成水浇田。

大搞生态治理——正卿上任后,跑遍全区七个县,首先发现群众因缺柴烧,植被破坏严重。他亲自和工匠研制节柴炉灶,发动全区45岁以下的

万名干部,带头每人携带一把泥瓦刀,深入40多万农户协助改建省柴灶,每年节约燃料一亿多斤。采取多种有效办法,基本遏止上山进滩乱砍滥伐植被的现象。1983年他担任定西地委书记后,跑遍全区170个乡镇,提出治理生态:变“荒坡、荒沟、荒滩”为“有草、有树、有田”。成立三个指挥部:南部针叶林基地建设指挥部、北部薪炭林基地建设指挥部、园林基地建设指挥部,“三林”遍布定西。沿公路山梁建成八条林带。七县都有大片果园。建起定西葛家岔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基地,经过几年的改造绿化,蜚声国内外,成为全国“改变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大修水平梯田——定西是全国著名的山连山,沟连沟的黄土高坡。为改变“光山秃坡”的面貌,动员全区群众修造梯田,变“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为“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每年以15万到20万亩的数度增加,总量百万多亩!有人粗略统计,定西治山造田所移动的土方,不亚于万里长城的土量。世界银行代表参观定西水土治理后发出赞叹:“不逊于世界八大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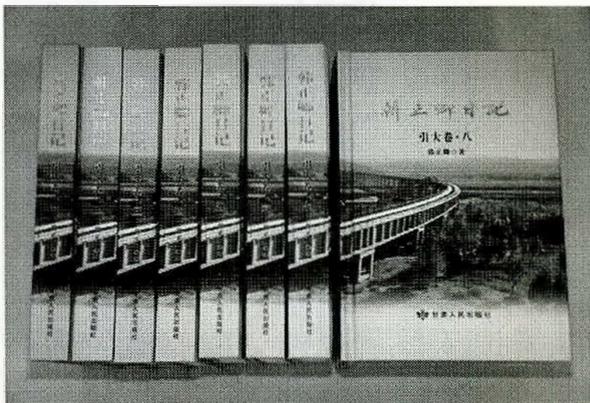
大建公路交通——“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正卿的信条。他到定西首先发现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道路不通,交通堵塞。于是,把精力和心血也同时投入修路架桥上。他提出“三路同修”(县乡公路、农村电路、广播线路)的口号,经过1984年到1987年的艰苦努力,修通定西县岷口至会宁县郭城、临洮县峡口普宁寺至榆中县银川乡、陇西县文峰镇至漳县、定西县红土窑至通渭县马营四条县乡主干道。全区7县有163个乡镇通上汽车,县乡公路96条,计1897公里。定西地区交通处处长王绍周说,此期是全区公路建设最快,发展最多的时期。

大抓工业企业——正卿的另一信念是“要真富,办工业”,他针对定西的贫困,根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狠抓了地方工业和民营企业。他到定西后,上跑外奔,取得省上领导的支持,争取上级列项,先后引资创办了闻名全国的定西无纺织飞天地毯厂,引资与集资扩建了陇西铝厂,筹建了临洮三甲水电站、陇西酒精厂、塑料包装制品厂、通渭

味精厂、靖远陶瓷厂、内官化纤编制厂等一批中、小型国营、集体和民营工业企业,大踏步地发展了地方经济。

大力发展养殖业——正卿把农民发家致富的得便渠道投向广大农村的广大农民。他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凡是接触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时候,都要大讲特讲养牛、养羊、养猪、养鸡、养兔等畜禽的好处。号召小养与大养相结合,分散养与规模养相结合。每家每户必须养猪养鸡,只少一二口猪、十几只鸡,也可以饲养其它;有条件、有能力的创办专业户。到1984年全区大牲畜发展到48.6万头(匹),1985年达到51万多头(匹),农户仅商品猪就向国家交售18.2万多口,市场出售猪肉190多万公斤。

正卿在定西率领全区干部和群众的奋斗结果是:1983年到1993年,工农业总产值由4.59亿元增加到20.2亿元;粮食总产量由52万吨增加到74万吨;农民人均收入由157元增加到497元;财政收入由3181万元增加到11151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由3180万元增加到11430万元。县乡公路全程达到3000多公里;通电村庄由757个增加到1552个。



引大——是从青海省境内的大通河流至甘肃天祝县天堂寺处修渠引水,流入兰州北部永登县境的秦王川。川域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有千年古荒可耕地上百万亩。

引大入秦水利工程被甘肃历政所瞩目。清朝光绪三十四年,陕甘总督升允筹划过此事,民国时蒋经国也有此意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一惠民工

程逐步有了希望。1956年至1966年,省水电勘测设计院对工程进行过三次勘测。1976年,省委书记宋平领衔作出决定兴建,此后坎经“两上两下”,花费4000多万元。1987年,省委、省政府筹集10亿元人民币,从世界银行贷款一亿多美元,决定第三次上马。其间虽有国际招标日本、意大利公司参与建设,但到1989年,全长85公里总干渠的75公里隧洞,只掘进13公里,每年平均1公里。照此进度,全线贯通尚需62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如此浩大、如此艰巨、如此复杂、如此科学的工程,没有一位“身经百战,足智多谋”“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指挥家,是“多快好省”不了这个工程的。省上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地遴选,1989年3月,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召见韩正卿说:“拨拉来,拨拉去,还是你到引大入秦当指挥”。

在他上任“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时,还担任二职:一是“甘肃省两西建设指挥部指挥”,二是“甘肃省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三付重担一身挑,在前是省委常委、在后是省政协副主席。

“引大”这块骨头比前三块更大更硬更难啃。他面临的任务是,总干渠从大通河流经天祝县境的天堂寺引水,穿越崇山峻岭,涉渡87公里,其中大型隧洞38座75公里。总干渠到香炉山分为东一、东二干渠,全长207公里。支渠45条,全长675公里。斗渠全长800公里;支干渠隧洞71座,长110公里。峡谷中间架渡槽29座,倒虹吸3座。支渠以上各种建筑物4500多座。

面对举世瞩目的非凡工程,是省委、省政府交给他指挥一支中外结合的“作战部队”:国内是中国华水公司,铁道部建设总公司所属第一、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工程局,隧道工程局、桥梁工程局,国家水利部四局、五局,甘肃省水电工程局、省水利厅地质建设公司、武威地区水电工程局、平凉地区水电工程局、静宁县水利工程公司;国外是日本株式会社熊谷组、意大利CMC公司、澳大利亚雪山工程有限公司、美国休斯顿公司,总体为五国十七方,八千余民工。

正卿接受任务后向省委、省政府领导立下军令状:“骑虎不下,背水一战;完不成任务,解甲归田。”“宁愿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就是地狱也要下。”面对世界一流的工程,要打造国内上乘的品牌,经得起百年以上检验,总指挥手下必须有两支过硬过强的队伍,才能使“五国十七方八千人”按高科技运作,按高规程达标。他就职后,通过内访外询,遴选聘请了全省水利战线上技术高超、成就斐然的雒鸣嶽、陈可言、王钟浩、郑载福、刘荣、王国栋、戴一诚、李攻受、马秉礼、贾玮、谭绍林、王福滋、王世选十三位精英;报请选调了能行政、善管理的“八大县太爷”景维新、金涛、王国平、常泽国、魏至仁、张鹤、王继高、张永生。正因正卿偕同指挥部姜作孝、华镇、严世俊、王增强、张豫生、顾其浩、金涛等一班强将,广纳人才之道,推行千军万马之路,才使这一按原进度需几十年的工程,仅在短短的五年多就以成功告竣。

伟大的工程来自于艰苦奋斗。正卿背负省委、省府的重托上岗后,拔山越谷,钻洞过槽,利用三个多月时间,跑遍数百平方公里的引大工地,将全系统工程的问题、困难和设想、措施报告省上。1989年7月26日至28日,省上四大领导班子在永登召开引大工程专题会议,重新建立了引大工程的机构、人员、资金、物资新机制。从此,引大工程发生了起死回生的历史性转折。总指挥介入工程的最大棘手问题是与“洋人”的交道,原招标承建总干渠控制工程15.7公里的盘道岭隧洞是日本熊谷组,工程实施中遇到复杂多变的地质层面,进展缓慢,费用加大,日方欲撕毁合同,逃避赔款。世界银行引大项目官员也打算上报撤销世行贷款项目。面对如此困境,被民众誉为“刀山敢上,火海敢下”的韩正卿不是畏难,而是迎战,他召开指挥部会议,以身许国,坚决执行省上专题会议决议,坚持五国十七方联合作战,各负其责,遵守合同,绝不违约。尔后率团飞往日本,与熊谷组谈判,从国际法高度,理直气壮地提出“合同不变,承包总价不变,施工期限不变,汇率不变”,要求务心按期保质凿通隧洞。不久又飞赴美国世界银行说明情况,要求按约向引大贷款。经过内外会谈、现场督

促和鼓励,施工进度大大加快。奋战五年后的1994年,盘道岭隧洞凿通。日本引大作业所所长前田恭利说:“有韩指挥这样的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水利工程的生命在于质量。正卿几乎在凡涉及工程建设的领导指导性文件、规程法则性材料、大小会上的讲话和检查督导的活动中都要提及和强调工程质量。“质量是工程的生命,工程的生命在于质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精心施工,不能马虎”“水利工程没有质量等于零”“国家的投入,人民的血汗,体现在高质量、高标准的工程上”“工程出问题就是对国家的犯法,对人民的犯罪”,这是他时时处处的口头禅。他到职后的第一要务是全面审核工程方案,实地查看施工实况,把合理建议提交指挥部智囊团论证后,将原设计总干渠33座隧洞口连接是换基础渠,为确保质量改为井柱渡槽连接。原设计总干渠渠道1—6号隧洞不衬砌,改为全段衬砌。原设计先明峡、水磨沟和东干渠庄浪河全为混凝土预应力虹吸管,改为虹吸钢管和渡槽。此举不仅工期提前,质量提高,还节省资金3600万元。质量监督的组织保证是,正卿点将几位“六亲不认,铁面无私”的“钢人”组成工程质监小组,专司质量监督检查。通过他带头进洞检查,发现铁二十、十五局承包的二工区工程进度与质量都存在问题,他提议把指挥部搬到现场,亲自督战。这里施工的“铁军”是“引滦入津”工程有名的“老虎团”。为了解决进度与质量问题,并以此引起全系统的警觉,召开了一次二工区所在地的“天王沟”现场会。参加者有各工区工段长、质量监理员和各承包商,把“老虎团”的孔庆云政委也从北京请来。面对存在问题,他严肃指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些隐患若遗留下去,我们就是罪魁祸首,千古罪人。”孔政委表示“砸锅卖铁搞引大,搞好引大置新锅,扛着红旗出引大。返工重来,攻坚质量。”会后,韩指挥住在工地与工程技术和施工人员苦战20多天,7个隧洞全线贯通,隆重举行庆典大会,指挥部赠联:“铁马雄风踏破千山万水为民造福,英雄儿女巧夺神工鬼斧功在千秋。”

1994年9月26日背水激战5年多的引大工程总干渠正式通水,圆了百年陇原人的盼水梦。每

年可引水4亿多立方,灌溉农田86万亩,每年生产粮食1.44亿公斤,实现农林总产值3.84亿元。可安置移民8万人,能使30多万人受益。可使秦王川灌区和景泰、西岔电灌工程连片,建立稳产高产基地;可改变兰州地区的小气候和生态环境;可以兰州机场为轴心,建立一座五彩斑斓的兰州新城。

这一工程在五集电视连续剧《引大人秦工程——活路》中有一段字幕,客观而形象地道出了工程的宏伟气势:“引大人秦工程,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是一项在国内首次全工程采用国际招标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水利工程,总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是国内主要依靠地方投资建设的最大水利项目。”

引大工程是国家的重点项目之一,开辟了中国水利建设的奇迹。几代领导人都很关心,进入90年代以来,宋平、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乔石、田纪云、杨汝岱、姜春云、邹家华、李瑞环、宋健、丁关根、陈俊生、钱正英等都前来视察过引大,给予很高评价。宋平题辞:“千秋伟业,造福万代。”温家宝说:“引大人秦是一个宏伟工程,是中国水利历史上的奇迹。这项工程的建成,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果,是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这项工程的总指挥韩正卿在引大艰辛工作了八年,他的业绩有口皆碑。原国家林业部常务副部长刘广运在题辞簿上写到:“引大真伟大,艰苦甲天下。韩公一声吼,百里洞穿流。”正卿说:“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国策。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没有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决策,没有人民群众背水一战的决心,就没有引大工程的胜利。”某记者采访韩正卿时说:“有人说你本事大,几年干了几十年的活。”韩说:“哪里的话,不是谁的本事大,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威力大,是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决心大,是千千万万引大人团结起来力量大,鄙人啥也没个啥。”

(作者系张掖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 再述汉晋金城故址

薛方昱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和实际调查,认为梁泉即今阿干河,其源出地的白石山,不在狄道县东,而在今兰州东南 80 华里的榆中县银山乡驻地南山;阿干河谷为古代重要通道;汉晋金城故址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桦林坪北端,东距兰州旧城 1.5 公里,而不在今之西固。

**关键词:**金城、梁泉、白石山、沃干、阿干。

今天的兰州市区,汉代叫金城。金城故址究竟在何处?历来为学术界、方志界所关注,论者不乏其人。概括起来,古今多数人认为,在今兰州城西 40 华里的西固<sup>①</sup>;另有人主张在今兰州市城关<sup>②</sup>;还有人认为在今兰州市七里河区的桦林坪北端<sup>③</sup>。上述各家之说,虽言之有故,但直接证据仍嫌不足,故至今莫衷一是,确为兰州历史地理学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笔者从 1982 年以来,坚持不懈地跟踪调研,今又写成《再述汉晋金城故址》一文,可以说 30 多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篇综述。

## 一、从源出白石山的梁泉看金城故址

目前学术界、方志界对汉晋金城故址的看法虽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梁泉的方位,是决定金城故址的关键。故主张金城在西固者,认为梁泉是今之金沟<sup>④</sup>、寺儿沟<sup>⑤</sup>、七里河<sup>⑥</sup>。主城关者,认为梁泉是今之五泉<sup>⑦</sup>。主桦林坪北端者认为是今之阿干河<sup>⑧</sup>。那么梁泉究竟是今天的哪一条河(沟)呢?这要从梁泉的源出地入手。

梁泉的源出地,古代文献记载有二:

一是金城县南山,见《水经注·河水》:

河水又东径石城南,谓之石城津。阚骃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东南径金城县故城北。应劭曰:初筑成得金,故曰金城也。《汉书集注》薛瓌云:金者,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鯨作城。《风俗通》曰:城,盛也,从土成声。《管子》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阨。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有梁泉注之,出县之南山。按者旧言:梁暉,字始娥,汉

大将军梁冀后,冀诛,入羌。后其祖父为羌所推,为渠帅而居此城。土荒民乱,暉将移居枹罕,出顿此山,为群羌围迫,无水,暉以所执榆鞭竖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

又东过榆中县北。

按:上述梁泉源“出县之南山”是指金城县地南山,非县城南山。

二是源出白石山,见《太平寰宇记》兰州条下:

白石山,有梁泉。昔梁暉者,后周之将,为郡羌围迫,无水,暉以所执榆鞭竖地,而飞泉湧出,士兵为此而济。今号梁泉,其上榆木成林。

梁泉,因梁暉而得名,其源出地的金城县南山和白石山,从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来看,实为一山,即金城县南山,具体地说就是白石山。那么白石山在今何处呢?古代文献记载也有二:

一是在狄道(今临洮)县东,见《汉书·地理志》陇西郡:

狄道,白石山在东。

又见《水经注·河水》洮水:

洮水又北径狄道故城西,阚骃曰:今日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濫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径陇坻,其山岸崩落者,声闻数百里。故扬雄称响若坻颓是也。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东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径武街城南,又西北径狄道故城东。

为了核实这条史料,笔者于 2005 年曾亲自到原狄道今临洮县东的东峪沟(即古濫水)作了实际调查,看到的都是黄土山地,就是找不见白石山。询问当地群众,回答也说没有。阅新编《临洮县志·自然地理志》:“东峪沟流域为黄土浅山”,<sup>⑨</sup>无石质山地。更无白石山的记述,说明在今临洮县东确实不存在白石山。如果白石山在今临洮县东,源出白石山的梁泉应西北流入洮河,而不可能北流入黄河。从而说明《汉书·地理志》关于“白石山在东”的

方位记载是不够准确的。在古代没有经纬线,方位记述往往不准,我们是理解的。至于《水经注·河水》记述的“滥水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就属无根之谈了。

二是白石山在兰州东南 80 华里。见《大明一统志》临洮府下记:

白石山,在兰州东南八十里。昔周将梁暉至此为羌所围,迫于无水,暉以青羊祷于山神,飞泉涌出,士兵取给,今呼为梁泉,北流注于河……梁泉,在白石山,即梁暉祷于山神所出之泉。

又见《读史方輿纪要》兰州下记:

白石山,州东南八十里《汉志注》:狄道有白石山,即此山也。宇文周将梁暉引军至此,为羌所围。山无水,暉祷于山,飞泉涌出,士兵取给,因呼为梁泉,其水北流……注于河。

根据上述文献指引的方向、里程,笔者沿阿干河谷东南行到榆中县银山乡做了实际调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目睹银山乡政府驻地孙家湾对面南山大面积白石外露,长约 2 公里,宽约 200 余米。当地人都说这是石英岩矿,新编《榆中县志》矿产资源一节中说:“银山石英岩矿……属沉积变质型石英岩矿,矿产成分二氧化硅含量 94%。”<sup>⑩</sup>这个白石山恰在兰州东南八十华里处,与上述文献记载的方位、里程完全一致。今阿干河上游银山乡一段叫柴沟,有三源,两源出马脚山,一源出白石山。

既然白石山在兰州东南榆中县银山乡,源出白石山的梁泉水只能是阿干河确定无疑了。这和《十三州志》中“出县之南山,北流注于河”的记述十分吻合。从而说明汉代金城故址,在阿干河汇入黄河以西近处的南岸。我希望对兰州史地有兴趣的先生到银山乡一游,因为眼见为实,客观存在的实物胜于雄辩。

这里还需要交待的一点是,从《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唐《通典》的记载来看,两汉至隋唐,白石山所在的今银山乡,地属狄道县辖域。宋代改属兰州,相沿至今,见《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等。

## 二、从阿干河谷通道看汉晋金城故址

沃干和阿干,是同音异字。阿,古音读窩,与沃同音。故沃干阪、沃干岭就是阿干岭,即今阿干镇

南的阿干山,又称关山岭。沃干阪及阿干河谷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兰州通向陇西郡治狄道(今临洮)、枪罕(今临夏州)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丝绸之路南线必经之地,其据有四:

### 1. 有文献记载。

《三国志·魏书·陈泰传》中记载,蜀将姜维攻狄道(今临洮),魏“凉州军从金城南至沃干阪”去解围,说明由凉州(今武威)经金城,沿阿干河谷南行,越沃干阪至狄道是一条重要通道。

《晋书·张轨传》中记述前凉张骏遣其将辛岩、韩璞等“进度沃干岭”,与前秦刘曜争夺秦州诸郡,曜遣其将高胤来拒,屯于狄道,双方相持七十余日,后因韩璞军粮竭,高胤率骑三千,“袭岩于沃干岭”……璞军溃败,死者两万余人。

上述两次战争的战场——沃干阪、沃干岭,就是今阿干镇南的阿干山,又称关山岭,清人张国常说在兰州城南五十华里<sup>⑪</sup>,非今西固的南山。

另外,宋代由宦官李宪率军伐西夏,出狄道(今临洮),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宪率领,路经今临洮县东北,越马脚山东南麓,经西市新城、女庶谷(今桑园峡)从东南进击兰州,另一路由苗綬率领北上,沿阿干河谷,途经天都山(今兰州城南 30 华里的岷口子)<sup>⑫</sup>,两军合围,收复兰州。

### 2. 有古道遗址。

据新编《七里河区志》古道一节中记:

南路:从兰州出发,经二十里铺、岷口子、阿干镇、西沟、和尚铺……可达狄道,南下四川,东下陕西,可行轿子车、大车、骡邦,亦为邮驿,民国二十四年(1935)修成甘川公路兰州至会川段,此路废弃。1988 年和尚铺以南关山岭尚保留长约 1000 米,宽约 3—4 米的凿岩为蹬的古道遗址<sup>⑬</sup>。

笔者认为这条资料很重要,并到阿干镇南的关山岭一带作了实际查看,证实《七里河区志》的记述完全正确。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西汉至明代关山岭一段古道的具体走向是,从阿干镇西沟、坪岭村(和尚铺)、关山岭(沃干阪),又西偏南经黑沟村、摩云关、关沟门、中铺,南至临洮。清代狄道人张庭选出资改道从关山岭直捷南下,经马泉沟村、拉驴沟、关沟门,与汉明古道相接,不再经摩云关,路近 10 余华里。关于该段古道遗迹,《兰州晚报》记者彭维国先生有一篇实地采访的报

到,标题是《阿干镇发现一处古道遗址》<sup>⑨</sup>,记述详实,图文并茂,写的很好,我就不赘述了。

另一路从阿干镇沿阿干河继续东南行,越白石山,经临洮县的上梁、辛店,南下至临洮,西行至临夏。该道正是梁暉所走之道,原为驼道,今有公路可通。

### 3.有汉代墓葬,汉简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何双全先生在《兰州汉墓与兰州史志考辨》一文中说:兰州“早在宋代就已发现了汉墓,并出土了汉代木简文书”并以《邵氏闻见后录》卷27为据,言崇宁初,兰州南的“天都山出土汉章和年号木简<sup>⑩</sup>。”天都山,在兰州南30华里,南距阿干很近。这条史料很重要,说明早在汉代,这里就有守护交通、关口的驻军。否则,何有大型汉墓的出土。

### 4.有古代堡、县、舖的建置。

今阿干一带,山大沟深,地势狭窄,无农垦之利,宋代在此置堡、金代在此置县<sup>⑪</sup>,元初仍置县,明、清设镇置关<sup>⑫</sup>,还设舖如和尚舖、二十里舖何也?就因为它地处交通要冲,具有军事价值而已。两汉魏晋时,虽无文献记载,但从前述发生在这里的战争和出土的大型汉墓来看,这里疑有军事要塞或关隘、驿站之设置。

综上所述,梁泉即今阿干河,而阿干河谷为古代交通要道。三国后曾发生多次战争的沃干阪、沃干岭即今阿干山,在兰州城南50华里处,说明汉晋金城故址在阿干山以北,阿干河北流入黄河以西附近之处。这和桦林北端的方位不谋而合。

## 三、从汉城遗迹汉墓看金城故址

金城是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大行李息“将城河上”所建的军事要塞,后随移民的到来,于西汉昭帝始元元年,才改塞为县。关于西汉金城的故址,古今学者多数人认为在今兰州市西固区驻地的西固。笔者也原以为西固平原及阶地较大,具有发展农业和建城立邑的条件。为了求得真凭实据,从1982年开始,历时十年,先后数次对西固平原南部及阶台地的柳沟大坪、小坪,进行了实际调查,并走访了当地建筑、房管部门,除发现少量零星的汉墓外,未发现汉城遗迹,最后以失望告终。于是回头对七里河区的阿干河以西、土门墩以东、西津路以南二阶地及大坪、彭家坪、龚家

湾、晏家坪等三阶地作了调查,令人欣慰的是终于在桦林坪的北端找到了汉城遗迹的蛛丝马迹,今述如下:

1.桦林坪北端有“高城深堑”的遗迹,地下有废城遗存。

只要我们细心地观察,就会发现桦林坪北端东西两侧的陡崖与桦林坪南端(第二马路以南)及邻近的四墩坪自然形陡坡迥然不同,明显的看出桦林坪北端的東西两侧,有人工削山的痕迹。在桦林坪北端地下有废城遗址遗物,笔者访问了从五十年代初以来就居住在桦林坪的长者,他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口碑资料:1954年修建邮电家属宿舍,用推土机平地基时,曾于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古代人们营居的遗物层,厚约0.5米,内中有砖、瓦、石块、炉灶、朽木柱、炭灰、人畜骨头、盆罐碎片等物。在今邮电巷家属宿舍的西侧,即今桦林路地下挖出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城基夯土层。1970年在桦林坪一马路西、桦林路东侧修建居民楼挖地基时,同样出土了一层废城遗物。这些遗物,笔者仅能看到的棱纹瓦罐、绳纹砖、瓦等系汉代之物,有些为魏晋之物。而在桦林坪第二马路之南,除出土几处汉墓外,没有出土任何废城遗物。从上述遗物出土的地点来看,城址在桦林坪第一马路以北之地,面积在六十亩左右,另从文献记载和实际来看,城有南北二门,而无东西之门。

2.在桦林坪南部及东西3公里范围内的阶地,曾发现量大密集的汉墓群。

依据省博物馆和文物考古队蒲朝绂先生的《古代兰州》<sup>⑬</sup>和何双全先生《兰州汉墓与兰州史地考辨》提供的资料,1956年桦林坪南部沈家坡下在修建兰阿铁路,下挖地基时,发现汉墓11座,在兰二坪(原为乱古堆坪)从1954年开始,先后发现汉墓31处。该坪东距桦林坪北端2.5公里。在城关区西南龙尾山下的西北民族大学和甘报社所在的阶地上,先后发现汉墓8处,该地西距桦林坪北端约3公里。在兰州市西面的西固及东面的东岗,虽有汉墓出土,但比较零星。无论是数量,还是墓葬的等级规格远远低于上述之地。对此,蒲、何二人论述详备,笔者不再重述。

3.桦林坪北端地形险要,符合汉代建城置塞的要求。

汉代西北边陲城邑,大都先是军塞,以后随着移民的到来,才改塞为县,但仍具有军塞的性质,为了避免洪水威胁和便于军事防守,城址大都选择在有险可据,高而近水的交通要道之处。

《汉书·晁错传》:

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

《后汉书·西羌传》:

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

此外《水经注·河水》在记述金城一名的来由时,除了记述应邵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也……。薛瓌云:金者,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还记述《管子》曰: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闾。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

“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这才是金城一名的来由,也完全符合桦林坪北端“高城深堑”的实际状况。

今兰州河谷盆地,有东西两大平原。两头大,中间小,如同葫芦。桦林坪北部处在两大平原之间的窄狭要害之处,扼控河谷通道和金城津黄河渡口,实为兰州的咽喉,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今为三阶台地,坪面东边比阿干谷的孙家台高约三十米。坪面由南向北延伸,如同半岛,北临黄河,东依阿干河,西临下西园,三面悬崖,唯有南面与沈家坡上的第四台阶地,即今烈士陵园相连,地形十分险要,故李息选择这一自然形成的险要地形,削山为塞,既节省了时间,又解决了当时人力不足的问题,何乐而不为之。

今天看来,这些河谷阶地由于较高、用水困难,筑城营居的条件远不如河川平原,但在两千年前,这些河谷阶地是人类聚落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优良场所,兰州市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及汉城,汉代聚落遗址,汉墓大都在今三阶台地上,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还应看到,古代黄河水量大、水位高,今天人口居住稠密的兰州市区,那时还是黄河叉道分布的河心滩,有些地方还是黄河河道,尚不适宜筑城营居,故将城址选择在像桦林坪北部这样高而近水的地方,是由当时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详见拙作《兰州河谷平原河道变迁与生态》。<sup>⑩</sup>

#### 四、结论

1.梁泉源出的金城县南山,就是白石山。白石山不在狄道(今临洮)县东,而在兰州东南80华里的今榆中县银山乡驻地南山上。

2.梁泉是宋代以来的阿干河,又俗称水磨沟、雷坛河。

3.阿干河谷及阿干山为汉代至民国时,兰州通向陇西郡治狄道的必经要道,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4.西汉至魏晋时的金城故址在今兰州七里河区华林坪北端,地处黄河与阿干河交汇之处,东距兰州城1.5公里。区划志》。

注:

①见《大清一统志》、《兰州府志》、《重修皋兰县志》、张维《兰州古今注》,新编《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刘满《汉金城县治所地理位置考辨》见《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1年。

③拙作《两汉魏时期的金城故址》载《兰州学刊》1993年2期。

④邓明《汉金城县址考》载《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西固区志办《对汉金城县址的一些看法》载《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⑥魏晋贤《对兰州市建置沿革谈一些看法》载《兰州历史地理研究》1999年。

⑦见注2。

⑧见注3。

⑨新编《临洮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内部发行)。

⑩新编《榆中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⑪见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

⑫另一天都山在今靖远县东南的屈吴山南麓。

⑬新编《七里河区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⑭见《兰州晚报》2014年10月27日。

⑮见《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⑯见《金史·地理志》。

⑰见《明史·地理志》。

⑱见《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⑲见《甘肃史志》2013年3期。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编审)

# 论地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

——以兰州市军事地名为例

张庆祎

地名不仅是标示地点的语言符号,更是一个地区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沉淀,是世代居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根据历史沿革、环境特征以及传说轶事对该地区的定义诠释。故而地名作为文化的镜像和载体,所承载的文化底蕴相较其现实的标示作用,时常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然而,或许是因为常被人们挂于嘴边,耳熟能详,反而往往被人所忽视。殊不知,每天途经一条小巷,看到的一幢建筑,听到的一句俚语,或许就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抑有进者,这些地名还是历史进步的见证、社会现象的缩影、居民日常的生活状态的表征。探究这些地名背后的历史渊源,透析彼时的时代特征,或许将成为研究地区历史一个可资尝试的路径。

“地名的命名总是有一定的依据,或反映自然特征,或反映社会历史背景,这种命名从历史的发展看,经历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所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过程。”<sup>①</sup>本文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兰州市区内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名从军事边防角度进行考据辨析,以图用此种方式对古城兰州的社会历史进行探究。

## 沿革概述

夏商周时期,兰州地区为羌戎之地,先民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辅之以农业生产。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今兰州市城关区东置榆中县,仍属陇西郡,确立了秦朝在兰州地区的统治,此是为兰州最早的建置。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增设金城郡,郡治允吾县<sup>②</sup>,属凉州刺史部所辖。汉书记载“金城郡,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sup>③</sup>《水经注》载“允吾县,金城郡治也。”<sup>④</sup>金城县为金城郡下辖十三县之一,其县治金城在今兰州市中心西偏北约2205公里处。<sup>⑤</sup>

三国(魏)承西汉旧制。西晋时,废允吾县,迁金城郡郡治于榆中。及至西晋末年,天下大乱,进入十六国

时期,今兰州地区先后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各割据政权的辖属地。其间领县变更频繁,莫相统一。前凉张骏于建元二年(344),分凉州地置河州。北魏年间,金城郡属河州,郡治子城,即汉时金城故地。<sup>⑥</sup>后世西魏、北周,未有变化。

隋开皇元年立为兰州,置总管府,取皋兰山以为名,府治子城(位于今兰州市城关区)，“兰州”之名,即于此始。后唐代隋,改郡为州,仍沿兰州名。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兰州被吐蕃所占据。吐蕃在河陇地区仍旧沿袭唐制,在兰州设大都督。后至北宋初年,吐蕃势力衰微,兰州又先后被回鹘、党项、羌族所有,最后归于西夏。

北宋神宗元丰四年,宋熙河路经制使李宪收复兰州。为了防御西夏的入侵,于黄河北岸筑金城关。后来金攻灭北宋,占据兰州之地,并于金熙宗皇统二年置熙秦总管府,后改临洮府,兰州属之。

元朝统一后,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度,兰州初属陕西行省巩昌总帅府辖。后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设置甘肃路总管府,至元十八年,以甘州、肃州两地得名,建成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兰州归于甘肃行省。“兰州,八十五县入本州。”<sup>⑦</sup>

明朝建立后,沿袭元朝行省制度,明太祖洪武二年陕甘合并,设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因连年战乱,兰州人口锐减,洪武二年降兰州为兰县,归陕西布政使司临洮府辖。惠帝建文元年,肃王朱楨由甘州(今张掖)移其藩属驻兰县,大兴土木,兴建肃王府(即现甘肃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及兰州内外城郭,奠定了兰州城的规模。宪宗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从兰县复升为兰州。

清朝建立以后,承袭行省制度,兰州归属仍如前明故制。顺治五年(1648年),甘肃巡抚自宁夏迁至兰州。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清廷遂设立甘肃行省。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廷将陕甘总督自西安移驻

兰州原明肃王府,裁撤甘肃巡抚,由总督兼管巡抚事,兰州遂成为总督、布政使、府、县驻地,形成西北重镇及大西北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心。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改前清旧制省、府、州、厅为省、道、县。民国二年(1913年),将兰州、巩昌两府合并设立兰山道,下辖15县,道尹驻皋兰县。其后因时局动荡,各方势力轮番执政,屡有更易。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将皋兰县城区和部分郊区划出,正式成立了兰州市,任命蔡孟坚为首任市长。

民国四十八年(1949年)8月26日,兰州城解放。至此,兰州市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兰州市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为甘肃省省会,兰州军区驻地。<sup>⑧</sup>

综上所述,兰州地区历史地名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反应了自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确立在兰州地区的统治至今2200多年以来古城兰州的发展简史。兰州城市发展若是一条长河,现今的兰州即是这条河的下游。通过向上游追溯每一个历史时期兰州的名称有助于全面了解兰州地区的历史面貌,获得整体全面的认识。透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的辨析,可以得出兰州城地位的演变轨迹,基本呈边境哨站——县级治所——郡级治所——府级治所——省级治所这一上升趋势。而其职能也经历了从单一的军事哨所向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变。由此为切入点,对古代民族间的和战、割据势力间的博弈以及王朝的统治政策进行研究,或许是一条可资尝试之径。

自秦时始,兰州地区即是与匈奴作战的战场。史记中有“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sup>⑨</sup>的记载。汉朝更是将兰州作为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和补给中专站,以至打败匈奴,设立了河西四郡。直至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兰州成为中国版图的内陆地区。

今天,兰州市位于东经103°36′之至104°34′,北纬35°34′至37°07′,北与白银市毗邻,西靠青海省,西南接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南和东部同定西地区相联。<sup>⑩</sup>兰州地处黄河上游,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

市区南北群山环抱,东西黄河穿流而过,平均海拔1500米,具有盆地城市的特征。虽然现今人们都将兰州划分在祖国的西北,然而这种划分方法亦是有待商榷。因为在比例尺为1:2600000的地图上,以兰州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为90mm的圆,就可以一秒了然的发现,从兰州到中国最北端的漠河、最东端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相交处、最南端的南沙群岛立地暗沙<sup>⑪</sup>、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乌孜别里山口,其直线距离相差不大,大致都在2300公里左右,恰好处于祖国的地理中心。我国著名新闻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先生曾说过:“如果拿中国全国来说,兰州是中国的中心。”<sup>⑫</sup>兰州城市规划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家城市规划设计大师任振英也说:“从地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兰州实为祖国的‘心脏’。”<sup>⑬</sup>他们的话的确很有道理。

两山夹一河是兰州最基本的地理特征,故而兰州市区的主要地貌为河谷川盆地。市区内有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形成的多个峡谷和盆地,其中以兰州盆地面积最大,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最宽处约5公里,最窄处只有1公里,大有山逼河来,河劈山去之势。兰州地处黄土高原西端,是与游牧民族驰骋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汇之处。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上被历代统治者看做中原政权开拓经营西北的军事重镇,使得古城兰州成为了战事多发之地,尤其是民族之间的战争更是成为了历史的主旋律。展开兰州的地图,不难发现大量这样的地名:土门墩、拱星墩、费家营、夏官营、盐场堡、刘家堡、安宁堡、满城、西古城、将军山、营盘岭……这些富有军事色彩的地名,便是兰州历史上战事频发的真实记录,下文仅举最有代表性的例证进行说明。

## 古城烽烟

### (一)金城雄关

兰州又称金城,以金城关而得名。这个称谓本身就诠释了古时兰州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张澍《金城关》诗云:

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鸾撞影出冈峦。

轮蹄不断氛烟靖,风雨常愆草木寒。

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日日漱云湾。<sup>⑭</sup>

《读史方輿纪要》则曰:“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

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居噤喉之地，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哉？”<sup>②</sup>说明了金城自汉朝以来，就是边境军事重镇，进可经略河西，退可拱卫陇右。而自汉至唐，长安多为都城，《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二千里，阊阖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sup>③</sup>陇右泛指陇山以西之地，大约现今甘肃东南部和青海东北部，自古就是农业发达的产粮区。建立都城，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实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以长安为都城的朝代，陇右产粮区的稳定对于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金城介于戎夏之间，为陇右之屏障，更是直接关乎王朝的兴衰。北宋穆衍有言：“兰（笔者注：即兰州）弃则熙（笔者注：即熙和路）危，熙弃则关中震。唐自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sup>④</sup>此言确实一针见血。

至于金城关建于何时，根据《重修皋兰县志》所述：“金城关在县西北河外二里汉置隋有关唐因之宋绍圣四年重筑。”<sup>⑤</sup>北魏地理学家阚骜的《十三州记》也有“金城郡有金城关，是也。”的记载。由此基本可以证明，金城关至少在汉代即已存在。“应劭曰：‘初筑成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称金，取其坚固也。’师古曰：‘瓚说是也。’”<sup>⑥</sup>可见，取其坚固之意称为金城，自唐初的颜师古起，基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初筑成得金之说则缺乏史料证明，至于另有以郡在京师之西，五行西方属金而曰金城更是缺乏事实根据，况且并无在京师东、南、北的郡县以木城、火城、水城命名。金城郡是于汉昭帝始元六年设置，经过武帝朝对匈奴的作战，昭帝朝匈奴势力相较秦及汉初时已经衰微，不可能再深入今兰州地区，故若设置金城郡后再修建金城关就显得多余。据此，很有可能先有金城关，经过数十年的移民屯驻，人口增多，再设立郡县以便管理。总之，古城兰州自建城之初，命名金城，便伴随着铁马金戈，以边防哨站的职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 （二）西固往事

现今位于兰州市西的西固区，一度为汉金城郡郡治允吾故址。彭泽《西古城记》有云：“兰州治西五十里许有古城，郡志以为汉故允吾，周环三里有奇，废为古迹久矣。”<sup>⑦</sup>可见，西古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西古城在县西南四十里，明弘治

十二年重修，国朝（笔者注：清朝）同治二年堡民廖登选等再筑。”<sup>⑧</sup>同治五年回乱，临近各村居民入城中避难得以保全，称赞此城固若磐石，遂改名西固城。通过对史料的探究并且联系时代背景可知古城之兴废与时局有莫大之联系。

明朝建立之初，元顺帝北遁，仍意图反攻中原，兰州即是与蒙古作战的前哨。当时，元末名将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曾与明朝在兰州地区长时间对抗。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四月）都督副使顾时等兵克兰州，以指挥韩温守之。”<sup>⑨</sup>“（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元将王保保侦知大将军南还，以兵袭兰州，奄至城下。”<sup>⑩</sup>“（洪武三年三月）戊午，大将军徐达师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车道岷。既而达进兵沈儿峪，遣左副将军邓愈直抵保堡，立栅以逼之。”<sup>⑪</sup>王保保在兰州建筑堡垒，称之为“王保保城”，其位置“在兰州市城关区黄河中山铁桥东北，朝阳山东侧台地上。踞山临河，东西为沟壑，地势险要，为兰州通往宁夏、内蒙等地之要隘。”<sup>⑫</sup>高一涵有“凄凉末世一奇男，隔代犹传保堡营”的诗句便是咏此人此城。最终，王保保与明军“战于沈儿峪，大败，尽亡其众，独与妻子数人北走，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sup>⑬</sup>而王保保城，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六百多年的风沙侵蚀和人为破坏，使其湮灭在历史中，至今唯在故址处立一石碑以记之。抚碑远眺，市区景色尽收眼底，面对奔腾东去的黄河，不禁感叹，民族分裂、内战频繁的局面，正如同这河水一般，“东流到海不复回”了。

及至永乐皇帝即位，更是五次御驾亲征，连克蒙古瓦剌、鞑靼、兀良哈诸部。明史成祖纪曰：“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及至季年，恩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sup>⑭</sup>永宣盛世下的明朝，国力强盛，在永乐皇帝的连续打击下，蒙古诸部直到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以前都无法再对明朝边境构成威胁。然而经土木堡一役，英宗北狩，瓦剌部首领也先兵临北京城。虽然在于谦、石亨等人的指挥下，明朝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攻守之势业已扭转，从此明朝在对蒙古作战上，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终明一代，未有改变。

也先死后，瓦剌部势微，而鞑靼部则快速崛起。“鞑靼之来也，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

来去无常,为患不久。”弘治皇帝在位的一十八年间,鞑靼部在首领小王子的率领下,有记录的人侵有十四次之多,于是在明史中留下了诸如“其年(弘治八年,笔者注),三人辽东,多杀掠。明年,宣、大、延绥诸境俱被残。”、“敌拥众人大同、宁夏境……”、“十三年冬,小王子复居河套。”、“小王子以十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残酷。”等记载。

而位于今天兰州西固区的西古城,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修筑起来。

### (三)安宁乐土

位于兰州市西,黄河以北的安宁区,以安宁堡而得名。

安宁堡,建于明弘治年间。据明嘉靖年间所立的《大明安宁堡神庙记碑》碑载:“弘治乙丑,石淙杨公(笔者注:即大学士杨一清,时任三边总制)总制军务,……以兰为西北要冲,去郡逾河西三十里,置安宁堡,城高二丈,池深一丈二尺,周围六百四十步,东南有门。设官□□□员名,兰州卫马步官军八百五十员名,郡牧所旗军百五十二名,以备店子沟、黑石沟、青道沟、红道沟、沙井沟、□□□、庙儿沟、庄浪河口、大通河口遏虏,不使为居人行旅之害。至是始,遂播获往来。”安宁堡为杨一清所督建,其目的在于防御蒙古,是为兰州城西部前哨,从规模上看,能驻扎上千兵士,属于比较大的堡垒。

当时,鞑靼对兰州的侵扰,非常频繁,形势十分严峻。杨一清上陈《为存留守城官军以防虏患事》有言道:“……且本州内有宗室(笔者注:即明代就藩于兰州的肃王),外多商贩,人烟辏集,畜产蕃盛,比之他处不同。相离虏人蹂躏之地,止隔黄河一水。去年虏骑在于盐场堡、大岔沟等处抢掠,直薄东金城关,离州城不数百步。”由此可知,兰州虽为边城,但自建文元年肃王迁移其藩属驻兰以后,发展较快。至明中期,已经成为人口稠密、商旅云集之地。但是,蒙古鞑靼部的侵扰,就如同悬在古城兰州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兰州的安宁。当时兰州城的规模远不如现今这般,明朝与蒙古基本以黄河为分界线,是故黄河一线不仅是兰州的北端,更可谓是明朝的边防线。杨一清任三边总制期间,对兰州沿河的北部边防,做了整体性的规划。以金城关为中心,向东至盐场堡(在今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

徐家山下,堡北十里石门沟产盐,故名,堡今已不存)、定火城(一名铁古城。在今兰州市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筑于明初,后因平定蒙古火落赤部,遂更名定火城,城今已不存,为村民耕地)。其言曰:“看得河北盐场堡离河桥(笔者注:指明代镇远浮桥)五里,定火城去河七十馀里,俱系贼人出没紧关去处。若得官军在彼按伏,以逸待劳,庶可遏其深入”。向西则经安宁堡,延伸至沙井堡。

沙井堡,建于何时无考。明万历时编纂的《庄浪汇纪》载:“明洪武间设驿站,”即列有沙井堡,故而又称沙井驿。“堡城周围共长二百八十八丈,高连女墙三丈五尺,底阔三丈,收顶一丈。东西城楼两座,腰楼两座,东、西、南城门五合,角楼四座,敌台两座,吊桥二座,城壕一道,栏马墙一道……设有公署:□□察院一处,递运所衙一处,防守公署一处,驿丞公署一处……置防守官一员,驿丞一员,驿吏一名,□□所吏一名……有户48户,口660名。”此堡为明代兵部所需驿站驻地,是从兰州出发西去的第一站,为河西五郡之咽喉,负责办理邮递传达官府军政文书和接待来往官员,因此人口较多,堡城也比较繁华。直至20世纪60年代,沙井驿砖瓦厂设于堡内,原有衙署及庙宇逐渐被全部拆除。如今,此地仅有一段土墙,或曰为当年沙井堡墙遗址。

总之,兰州城北岸防御体系,即以沙井堡、安宁堡、金城关、盐场堡、定火城等要塞为支点连线而构成,拱卫北疆,保一方之安宁。

### 研究启示

除上文所述之外,有明一代,在兰州地区为防御蒙古建立或重修的城堡还有近二十座,如:

南大通堡,明筑,以防御蒙古部族侵扰。清光绪初年左宗棠赴河西经此,改名大通。1950年改名为大同,设乡,现为乡政府驻地。

什川堡,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什川堡。堡位于上峡至河口、东山至泥湾的什字路上,故称什川字堡,简称什川堡。在今皋兰县什川乡。

上述这些城堡营垒的建造,反映了明朝自中后期以来边患的严峻和国力的孱弱。自秦时起,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纵贯整个古代史。秦始皇即“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马……”，应当明确的是，秦时修筑长城的初衷是主动进攻。美国汉学家狄宇宙认为“华夏诸侯国是怀着军事进攻和领土扩张的意图修筑长城的”<sup>⑧</sup>。譬如河套地区，匈奴人自周以前便居住于斯，秦先击退匈奴，再建筑长城移民屯驻并设立云中、九原两郡，和明朝中后期在本已建制的地区，因蒙古侵扰而修筑堡垒进行的被动防御，实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包括汉武帝、明成祖，都是奉行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对游牧民族发动主动的进攻，这样也使得战火远离本土，生产不被破坏。至于国力的消耗，国内矛盾的激化，实为事物两面性的表现，当超过人民能够承受的底线，就由保境安民变成了穷兵黩武，对政权稳定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主动进攻，唯雄才大略之英主方可也。否则，极有可能造成丧师辱国的下场，明英宗北狩即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对抗游牧民族采取修筑堡垒凭城固守的策略实为最切实可行之方案。上文提到的那些军事要塞，亦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可见，从地名入手，探究其形成原因及时代背景，实为研究城市历史一条可资尝试之径。在兰州市内及周边地区，以军事据点为名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兰州市榆中县的夏官营镇，即是传说西夏国主李元昊曾于此驻军与北宋对峙；华林山南的满城，即是源于清乾隆年间苏四十三之乱后，清廷为了拱卫兰州城而修筑，“因驻扎过庄浪满营，故曰满城”<sup>⑨</sup>；而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的箭道巷，则因明清两代官兵在此比武射箭而得名……

本文所举的例子，在古城兰州的历史地名中，如沧海一粟，更有大量的地名有待人探究考证。除去上述的军事因素，还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等多角度进行研究。由于地名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命名原因及历史含义，是故地名可以称得上研究地方历史的钥匙。因此，我们对地名的认识应该超越其本身的标示作用，从而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价值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地名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若从更广泛的层次来说，地名还具有不可忽视的自然科学价值。以兰州为例，遍布全市的各种“滩”和“坪”实际上就是对两山夹一河这一特殊地形的佐证，是为研究历史上人类活动及环境变迁的重要证据。因此，无论社会科学工作者或者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当

注意对地名研究。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华学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

①蓝维：《公民教育：理论、历史与实践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

②允吾，音“沿牙”，治所即今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马场垣乡下川口村，一说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后世屡有废置，本文亦不深考。

③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0页。

④酈道元：《水经注·河水》。

⑤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内所示，由比例尺算得，下同。

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6—57页。

⑦宋濂等：《元史·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31页。

⑧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建置区划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志第一卷·建置区划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⑨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⑩兰州市计划委员会：《兰州市国土资源》，1988年。

⑪对立地暗沙的所有权问题，中国政府表示对此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是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政府在国务院(82)国函字280号文《国务院关于南海诸岛地名命名、更名方案的复函》中指出“……上报方案中的八仙暗沙、立地暗沙、管事滩三个地名暂不公布，也不公开引用和对外提供。……。”

⑫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⑬任振英：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建立现代化城市规划学科[J]，兰州科技杂志，1980，(3)。

⑭张澍：《养素堂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71页。

⑯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038页。

（转75页）

# 《庆阳市志(1986—2010)》 基本内容的归属范畴及层次辨析

张芹鹤

2008年4月,《庆阳市志》修编委员会与全市80多个部门、单位签订分志编修工作责任书;2009年4月,市志修编委员会办公室,借用编辑3名,组建《庆阳市志》编辑部;2010年底,完成《庆阳市志(1986—2007)》全部志书的资料长编并初稿编写修改验收工作;2011年4月,接受市政府决定,市志下限延至2010年,重新启动承编部门、单位补充编纂;2013年12月,市志编辑部完成全部市志初稿,并通过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有关领导、市志修编委员会全体成员、周边市州史志办办主任、市志主要承编单位、审核单位负责人、七县区政府(区)县长、志办主任、市内修志专家学者约60人参加的全市初审;2014年10月,市志编辑部完成全志初审修改意见,并通过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2014年11月,《庆阳市志(1986—2010)》,由中华书局出版。

也就是说,《庆阳市志》,逾时6年,中间穿插过一次下限延伸,两次人员调整。幸赖全市市县两级政府大力支持,全市100多个参编单位通力合作,全市数百名兼职和专职工作人员,夜以继日,不厌其烦,采集资料,编写资料,报送资料,为全志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掩卷而思,《庆阳市志》资料全面、厚重、翔实、珍贵,是一大特色;聚焦发展,探索规律,客观记述,又是一大亮点;改革开放,百业兴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在全志中得到记述;西部名城,陇上煤都,资源大市,革命老区,旅游胜地,在志稿中得到彰显。全志编纂过程,说到底就是对于志书所涉及的全部资料加工和处理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实则是在实施一项艰难、庞杂、复杂、艰辛的历史文化工程。说是工程,就得

总揽全局,就得高屋建瓴,就得设计划,扣进度,讲质量,精益求精!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志书是一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通达未来的,由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编修的地情性资料书,其综合性、典型性、权威性,乃至科学性,当是其它任何本地地情书籍莫可匹敌,因此,编纂初始,我们就做到了高度重视,严谨对待。

一、从篇目设计入手,拟定出《庆阳市志》编纂第一阶段(初稿)目标任务分解表,下发各编辑工作人员,推动工作,基本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2009年4月,组织市志办、编辑部8名人员,采用分工承包,上门辅导、培训,直接帮助、反复督查等办法,帮助各部门设计篇目,搜集资料,编纂资料。其前,两名《庆阳地区志》副主编,根据前志拟定的篇目,指导各部门资料采集,志书编纂,遇到了问题。因为机构增减,行业变更,职能拓展等,原定篇目,在与时俱进上做得不够。我们及时研究,我提出采用“微调”的办法,转化路径,从资料到篇目,在占有,处理,加工资料的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篇目,使篇目更具时代特点,并恰到好处地装进改革开放社会背景下的新的志书内容。至于,一开始,我们未选择大编体、中编体,而直入小编体,一是前志作为庆阳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其探索,开拓的意义和功用远远没有完结,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义不容辞;二是采用小编体,就是讲究实对实,而避免空见空。为什么如此说,我也一直很纠结,打个比方,资料就是各种物品,篇目就是装物品的仓库,大编体,中编体就是仓库大了,县市级志书采用小编体,利于各种资料科学定位,码齐排放。这是我从县志、市志编纂实

践中得出的结论。在指导实践中,我曾批评那些动不动就抬出大编体、中编体的模式,而内容实则干瘪的部门志为“虚设层次,重屋架构,至为繁冗,涉嫌重复与交叉,会导致内容混乱”。一句话,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其次,各章之间依照逻辑关系拼块并前后排列。分类和排列得当,也很重要。参考其他志书,结合本地情况,考源流,分主次,评估升格与降等,再三推论,然后确定为自然地理、建置、资源环境、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后经多次审定推究,志书出版时正文为政区建置、自然地理、自然资源与生物、环境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土保持、农业机械、地方工业、电力、石油化工、煤炭、商务、供销、旅游业、财政、税务、金融业、计划项目管理、国土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监督、统计管理、粮食管理、物价管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与社会团体、军事、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扶贫开发、教育、科学技术、气象工作、文化、文学艺术、文物、新闻报刊、广播电影电视、档案、志鉴谱牒、卫生医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育、人民生活、人物计 64 章。其章名称,拼块,排序,仍有诸多不甚严密之处,但经过了初审,终审,领导与专家共同议定,非人微言轻者所可造次。再者,节目安排,有降节为目的,有升节为节的,有前后调配的,有补填的,有删减的,均有缘由。编辑 3 人,一周一会,反反复复,个人改稿和集体改稿相结合,涉及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问题,采用集体会议讨论确定或暂时搁置等办法处理。新章节目,多由我研究拟定,指导编写,最后加工成章,如石油化工、志鉴谱牒、人民生活等。各章涉及的第一节,多为机构。行业工作,多是在机构所属人员,依照上级政策法规,组织实施,兑现完成的。机构置于全章之首,较为合理。然而,机构变更,包括设置、合并、裁减,25 年间,略显复杂,再加上涉及市县,甚至乡镇,不同的管理级别,跨越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下,一个章,

如畜牧、水务,单机构拥有的文字量约 3000 字。作为市志,颇费考量。参阅前志,应全尽细。我学习研究,最终采用“卡两头,留主干,述变化”的方法予以解决。既体现了市志记述的范围层次的完整性,又留予给县区志恰当的记述内容与空间。“卡两头”,就是记清记全 1986 年、2010 年,此行业机构的全称,内设、下辖机构名称并人员;“留主干”,就是每个行业或部门,都有一个主要管理机构,主记,记清记全,至于升格的,析出的,非主要管理机构,不必细记;“述变化”,机构变更,随着地改市,市变区,乡变镇等,均有变化,必记一笔。同时,对市级机构,县级机构按块处理,提纲挈领,简洁醒目,要言不烦,节省了记述资源。我自认为属成功的范例。

二、资料是全志构成的最基本元素,对于资料到资料长编,再到初稿的形成,我们所做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正果。和以往编纂志书不同,《庆阳市志》编辑部,始终坚持精干有为的工作机制,以三两个编辑为核心,避免人浮于事,提高工作效率。大量的资料,来自于参编单位的提供。为了提高所送资料的可用率,激发采编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及时赠送由庆阳市志修编委员会办公室编发的《实用修志手册》,建立联系电话,确定工作关系,搭建交流平台,以不定期《史志通讯》形式互通信息,交流经验,推动工作。起步阶段,全市就形成了:一是领导普遍重视。各部门基本建立健全了工作机构,落实了人员、场地、设施、经费等,使资料采集、整理工作全面展开。二是任务分工明确。按照《庆阳市志》篇目大纲要求,各部门根据行业业务变化、参考变更标准,调整提纲,分解任务。为如期纂好部门志,做好了保证。三是资料采集全面、广泛,达到了应搜尽搜。断限以内,立足全市,涉及本行业的所有以至相关的资料,都克服困难,采集入志。四是修志精英大荟萃,表现为人才济济,体现为老中青结合。一些部门的行家内手,业务骨干,出面担当。前志编修的一些老同志再度出山,使行业专业志编修与市志部门志供稿,相与进行。五是在盛世修志,众手成志的大背景下,地方大专院校一些专家学者的参与,为市志编

修增添了文化品味。六是部门主修,市场运作,整合全市有限的修志资源,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具备此种修志条件,我认为,从一开始,我们工作的起点就高。各部门相继送达的数万,十多万,甚至30多万资料,对我们的“删繁就简”能力,“标新立异”水平,提出了严正拷量。我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真正是夜以继日,食不甘味,在资料堆里打滚,在效率和质量的天平上滑行。我们像双面判官,既要评判资料,又要评判自己。采用掐头去尾法,先是掐去前头,即是去掉是是非非的序,概述(多属专业志),以至超过了上限的资料;去尾,掐去行业志后面的人物部分,送给专人编纂,同时掐去逾越了下限的资料。其次,是消肿去臃法,即穿靴带帽的,铺垫过度的,前后重复的,说明的,评议的,总结的节、段、句,一应删去。一切计划、规划、设想中的事、事件、数字,也减少记述。因为志书所记,是发生了、发生过的事。其他旁逸斜出,枝枝蔓蔓的句子,尽可能地删去。同时,扣住记述性质的内容,采用记述的语体。对于保留的资料,要科学分类,确定其归属;对于记述的重点,要使其尽可能的突出,对于表现特色的资料,独有的,稀缺的资料,全部保留,方是本志与他志区别的光华部分。我们还采用合并同类项法,特别是一些多年性质上相近、相类的事物、数据,可以合并记述。如若干年合作医疗款的报销金额,若干年福利彩票的销售金额等等,没有政策、措施、设施上的变化,可笼而统之,若干年合并着记述。总之,对于资料的取舍增补,反复修改,往往一章一节,少则五六次,多则十来次,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多重反复。我在《从资料长编到初稿的多重反复》一文中有所论述,见《甘肃史志》2012年第二期。通过资料长编,我们深入到各个部门工作的内部,对部门工作的性质、内容、规模、质量、效果等等,有了更其全面和深刻的认识。经过修改,改成了初稿。基本框架和内容业已定型。也就是说我们的编目大纲,经过多次调整修改,十分清楚;记述重点,经过多次反复钻研辨析,依类归体。当然,一些涉及主次、详略,甚至政治观点的问题,只

有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在新的修志理论指导下,去鉴别,去认识,去记述。例如,《水土保持志》中,记述世行贷款二期项目工程的后面,记到用该款项给四个村,800多名妇女两年做了免费体检。这一笔尽管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但记入志书,必有负面影响。另外,旧事物的消退,新事物的壮大,其间的发展、逆转、甚至是倒退,是客观事物自身规律的必然反映,不是因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各个历史时期的提法不同,实质上是一回事。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部门一统到底,其资料容易找到;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其资料有很大的隐蔽性,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也有更多的不客观成分。这是这一历史阶段志书编纂中的一个难点,但要克服困难,多些手段和方法,争取找到第一手资料。例如,国有企业改革、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重点,尽管有大量职工下岗,是社会的阵痛,但更是社会进步。认识上必须旗帜鲜明。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我始终把握着眼于社会的进步,着眼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着眼于管理制度的创新等。也就是编纂志书,能够始终体现出时代的发展方向和积极意义以及宪法至上的精神。

三、人物记述仍是市志记述中的厚重部分,但在坚持标准中,做了实事求是的甄别和分类,通过3000多名庆阳优秀儿女在各行各业贡献业绩,展示了他们在国家、社会层面上的发展领域和历史高度。2008年4月,庆阳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通知各县区单位,为全市人物志编纂提供资料;2011年3月,《庆阳市志》修编委员会办公室在庆阳电视台、《陇东报》发布启事,要求各界人士提供相关人物资料。提出凡在限内,已故及在世的庆阳籍和在庆阳工作过的客籍人士,符合下列条件的,均在征集之列。1、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2、副地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副高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获有关部门授予称号或予以认定的发明创造者、优秀企业家、优秀科技人才、文艺界知名人士、书画家、民间艺人、能工巧匠等……期间,年

届70岁的老前辈付宏民(《庆阳地区志》副主编、《庆阳市志》顾问),不顾年老多病,多次深入县区,走访知情人,完成了大量传略人物资料采集。其固执和不妥协的品性,用发信、打电话、上门索要等方式,弥补了许多亡故人物、在本籍已没了亲己的人物的资料。截至201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克服偏见(有些部门只提供本籍人士,而排挤外籍人士入志;有些单位只提供自己了解到的人物,即使本籍人物,在外卓有建树的,也不挖掘提供。如《文学艺术》承编单位,只提供庆阳市文联所属9个协会之内所属人物,至于庆阳籍在外,在国家级层面上的文学艺术人物,因为联系有难度,就不再提供)。以各县、各部门上报资料为基础,如西峰上报资料92461字,第一次改为28000多字;庆城上报63000字,第一次改为17000字;环县上报76000字,第一次改为32000字;华池上报30000多字,第一次改为10000多字;合水上报47000多字,第一次改为21000多字;正宁上报54000多字,第一次改为24000多字;宁县上报78000多字,第一次改为32000多字;镇原上报97766字,第一次改为30000多字。还有各部门所报人物,知情人送报资料越10多万字,最终经过修改、删减、提炼,形成了《庆阳市志》人物志的主体。即《庆阳市志》第六十四章,分传略、简介、名录人物三节,计22万余字,占全志文字稿180万字1/9强。其中传略人物,领导干部135人,闻人学者82人,英模知名人士57人;简介人物,领导干部400人,闻人学者335人,英模知名人士26人,企业精英38人;名录人物,烈士69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各行各业先进人物1018人。可以负责地说,《庆阳市志》,所记人物,均侧重实职、业绩、级别,扣硬指标。这些人物,经历了世纪风云,社会沧桑,以自己的奋斗业绩,成了志书中的精华部分,闪烁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不朽光彩,是昭示后贤,激励世人的碑石教材。编纂过程中,我们首先精减记述文字,对于人物通讯式的用事例、故事表现人物的内容段落、甚至评价性、说明性、抒情性句子尽可删去,力求去伪存真,去芜存实。一些涉及性别、民族、学历、政治身份的,剔除雷同,保留特别。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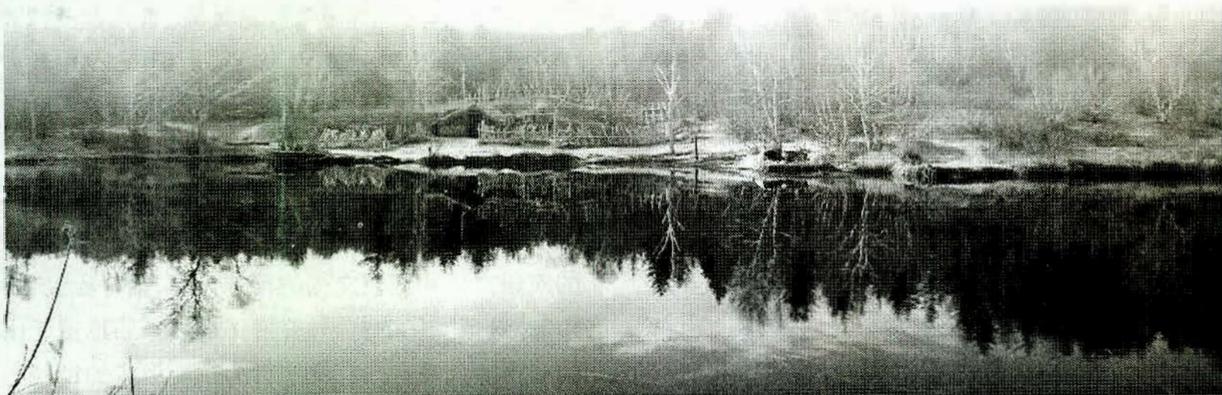
学习经历、虚职、兼职,本部门、行业的奖励,省一级的人大、政协、党代会代表资格,非特殊,也删去。评审稿发放后,《庆阳市志》中的上志人物,经过反复研究,标准较之先前拟定的标准做了上调,传略人物稍宽,简介人物从严。最后一阶段,征询《庆阳市志》顾问同志意见,反复酝酿,将前面列为不够标准的部分老教师、老文艺工作者、老科技工作者、老医生、社会知名人士,个别特殊事迹烈士,还是录入了人物传略。就是说,传略人物节内闻人学者与知名人士,条件相对宽泛,着重体现收录人物的特殊性和在当地社会活动中的贡献或者对后人的教育意义等。因为按正高职称、正教授、主任医师等条件要求,畅金山、杨景修、王梦扬、邓博五、刘宪廷、吴鹏程、孙嘉鼎、张秀珍等77人都不符合硬件要求。至于简介人物,除了英模与知名人士、企业精英,均侧重业绩贡献、社会影响外,其他人物就扣硬件,讲标准,绝不宽延。名录人物,可能出乎了许多人们的意料,原来我们设定的副高职称人物、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要入名录的人物,一并删去不录。必录的获省委省政府、中央部委、国务院部局及有关单位表彰奖励人物,也做了大量甄别、分类、整合。有些奖,有“贪天工为己有”之嫌,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婚育新风进万家”“农业建设扶贫开发暨帮县扶贫工作”先进个人;有轮流坐庄,平分秋色的奖项,如连续几年,某部门领导替换,都会自然而然地获某方面奖项;还有某类奖,如“2005年全国宫内节育器避孕效果调查先进个人”等,无疑奖项随意,含金量大减。我们一应整合,以极简名录收录,实为明智之举,也属功德之举。为市志的人物收录立了样板,做到了宁缺勿滥,达到了提魂聚气之效果。古人曾云:“大浪淘沙,方显出英雄本色”。若《庆阳市志》中的人物,可与英雄比肩,当会体现出这本志书的不同凡响的况味。

四、附录所撮要的地域文化的丰富和自信,所展示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非凡意义,所探求的农耕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内蕴,恰好给《庆阳市志》这个文化博览园,开辟了最后一厢珍贵无比的橱窗。人类自知自觉的行为,所形成的种种印

迹,所生产的有形的无形的物品,都包含着诸多神秘神奇的创造和创新因素,都会成为人类赖以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庆阳市志》附录,在篇目设计方面,分为文献、史论、碑记、辑录、书目、编志始末6类。最后成志,分为重大事略、文存、考证、序言碑记、其他、地名对照表。编纂之初,同样立足全市,广览博采,庆阳市政协文史委,编制提纲,组织培训,聘请特邀撰稿人员,完善采稿用稿机制,坚持“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和“三性”(统战性、资料性、可读性)原则,收集抢救、挖掘整理并编发《庆阳文史资料选编》157期,结集出版《庆阳文史资料选辑》4辑,其中《胡耀邦视察庆阳地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视察扬黄工程》《一个时代的结束——庆阳市告别窑洞小学记实》《一个外国人眼中20世纪初的庆阳(上、下)》等,以及市政协组织编纂出版的《庆阳历史文化揽胜》《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庆阳先周历史与农耕文化论丛》等,对《庆阳市志》的附录编纂提供了主体资料。以此为基础,由我指导相关人员,对1986—2012年《陇东报》中的文史研究文章、重大事件通讯报道、重要会议有关决议、特定时期领导讲话、年度国民经济统计公报、以至典型的具有地域人文气息的文艺作品,进行复印、扫描、整理,历时一年,复印汇编1200多页,备存待用;再则,对《庆阳开发与建设》中的可用资料一并复印、扫描、整理。当然,地改市文件,庆阳招商引资政策,一开始,都众口一词,纳入视野。至于部门上报的特殊资料,一些学者文人送达的个人研究,一些领导推荐的思想文化成果,我们都做了备存,以待采用。有关老区工作会议资

料,有市政府报送的,有市委报送的,还有主要衔接联系部门报送的,记在哪里,比较妥当,此事关乎全局,我集中整理,突出重点后,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由省委、省政府牵头负责召开的老区会议,对庆阳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放在政府一章、或市委一章都不相宜,只有列入附录,才算妥当。有关温家宝总理对于庆阳老区的几笔批文,散见于多处,我先以《落实温家宝总理批示,夯实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整理,最后,也由主编审定编入附录。总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采撷,筛选,穷尽了诸多领域。时限内庆阳全境文化巨匠、思想大家、文艺精英的最新、最高成果,在我们苦心孤诣的研究后,由集体决议,承奉给大家。后面,几经审议,留在志书里,当是最为公允,最为公平的文化裁决。单是最后的庆阳全市地名对照表,以其精细、实用、权威,为这部志书的恢弘交响,砸下了重重的一锤。我们双手展示的也许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我们拉起的将是一种贯通过去,通达未来的历史进取。“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积淀,有着丰硕的文化成果积淀,有我们自己不绝如缕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民族振兴和文化发展的基石与起点,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历史财富与资本”(《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2011.10.16《光明日报》)果能如此,《庆阳市志》当不辱使命,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

(作者系《庆阳市志》副主编、正宁县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 战争与水

车安宁

水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水也被卷入人类战争,成为被战争双方精心利用的工具,甚至成为特殊武器而使用。

我国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就有多处讲到水,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意思是:用兵应当不拘一格,不能固守教条,要像水一样随时流动变化。这是借用水的特性说明用兵的灵活变化之道;再如:“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意思是:用兵之道如流水一样。水流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它的薄弱之点。还有诸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等,不仅借喻水讲到了用兵理论,还讲到了涉及水的行军作战和攻敌之法。

此后,中国宋代兵书《百战奇略》里也有《水战》篇,所述内容非水上作战,而是专讲陆上作战如何利用水流辅助军队进攻取胜。该书还附有许多实战案例,历来为兵家所推崇,曾广为刊行和流传。

后来,西方著名军事学家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在其《战争论》中,也曾提到了大雾和大雨对战争胜负的影响。

纵观人类战争史,水作为一种可以借用的自然力量,既可以阻隔敌兵,也可以移祸于敌方,或直接作为一种武器向敌方进攻。我国古代兵书称之为“水攻”或“以水代兵”。这种战法早就被运用于各种规模的战役和战斗中。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以水代兵”的战例屡见不鲜,五花八门,各具特色。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早期传说,大约距今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中原发生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等,其中都涉及到用水火相攻的方式。传说黄帝手下有位大将名叫应龙,他能张开巨口喷水,江河般的涛涛水流自上而下喷射出来,会把敌人冲得溃不成军。

还有相传在冀州有一位怪人叫康回,熟水知性,与人打仗总用水攻,许多百姓也深受其害。伏羲氏的妹妹女娲与康回争斗,她教百姓将芦苇灰与草灰混合在一起,遇到有水的地方就填,最后使水倒灌回去,致使康回大败。

再有早期神话传说中的共工与颛顼,因为二人的治水理念和做法不同,而发生了帝王权利的争夺之战,后共工因失利而怒撞不周山,致使洪水大作等等。

如果说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口传故事有些离奇,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经明确地记载了当时有水上活动,至周朝已有水战的记录。正史书籍中更有大量的实战案例记载,可以供我们推敲。如《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还。”这里的“舟师”即是驾船的军队。还有《史记》中载,汉初,刘邦手下大将韩信击败楚将龙且的潍水之战,就是体现“以水佐攻”原则的成功战例。后来我国古代军事家如王贲、曹操等,都有运用水攻克敌制胜的战绩。

国外最早的实战案例当推古代伊拉克。史料记载,公元前689年,亚述国王森纳纳里伯为进攻巴比伦人,在幼发拉底河上建造了一座水坝,形成庞大的水库,然后决坝冲城,致使巴比伦人遭灭顶之灾。

几乎在同一时间,即公元前685年,楚国侵犯宋国、郑国,“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齐桓公出兵干涉,要求楚国拆除水坝。而在公元前657年著名的“阳谷之会”中,明确规定各国在打仗时“无障谷”,就是不许在他国的水流上游建设水坝试图用水攻淹没他国。及后来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盟”中,也在盟约中写入“毋雍泉”,明确规定不允许在河上建水坝进行水攻。这说明当时春秋各诸侯国已经意识到水攻的危险性。

但是,到了公元前455年的战国时期,又发生了史称“三家分晋”的晋阳之战。这次战役,规模虽不算很大,但交战的双方都使用了水攻战法,曾先后掘开晋水的河堤大坝,相互以水淹攻击对方。

在我国家喻户晓的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周瑜在诸葛亮的策划下,借东风火烧曹军战船;关羽乘襄江水涨,放水淹七军,生擒敌将等,都是小说中被演绎得有声有色的战争场面,其中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水势,或制造水灾作为军事手段与敌作战。其实,在中外战争史上,这种大小案例举不胜举,在分散于各地的地方史料中都有记载,只不过小说中将其更加戏剧化、典型化了。

当然,用水攻作为战术,其设计和使用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技术含量,既要考虑战场的地势地形、通道、水势的走向、水量大小、气候等,也要掂量敌我力量的对比,用水的时机等因素。从古至今,也不乏在实战中教条照搬兵法,运用水战失败的案例。

发生于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是东晋时期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此役中,前秦军队兵多将广,占有绝对优势,但指挥者苻坚恪守“兵半渡可击之”的教条,结果大败于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灭亡。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典型的城池就是采用城墙外设护城河,以水加强防守的形式。这也是我国古代称城为“城池”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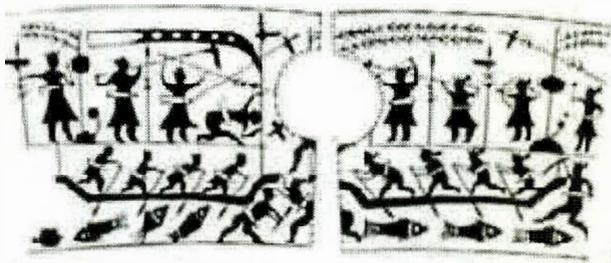
说到战争与水的关系,我们也不得不提到人类利用海洋而进行的水战。这方面记载最早的是

公元前241年,拥有200艘战船的罗马舰队在卢塔蒂乌斯·卡图卢斯指挥下驶近西西里岛海岸,从海上封锁了德雷帕努姆和利利贝奥要塞。迦太基派出舰队,载着粮食前来援救要塞守军。双方舰队发生交战,迦太基人被击败,罗马人击沉迦太基战船50艘,缴获战船70艘。

而中国的记载比这更早,《左传》中说,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吴将“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这说明至少在春秋末期,中国人已经能够建造海上的战船,并利用海洋进行军事行动。

这一时期的舟师已有相当规模。史书记载吴越之战时,越舟师出海北上攻齐有戈船300艘,当时比较大的战船为“大翼”,长12丈(约合24米),宽1丈6尺(约合3.2米),可容战士20余人,桨手50人。

河南省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驾船作战的情景。从图中可以看出,战船是桨船,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战士,下层为桨手(见下图)。



后来,从两汉到明末清初,中国的水军及战船建造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西汉汉武帝时曾发动了近4万人的水军开入广州湾,战船千余艘;东汉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双方使用的船舶也数以千计,当时孙权已经能够发动3万人的海军远征海南岛;隋朝杨素造“五牙”大舰,起楼5层,高100余尺(约合29.5米),能容水兵800人;唐朝发明了车船(轮桨船);宋朝时作战车船长20-30丈(约合60-90米),有23-24个车轮桨;明初起,中国战船上已配备了火炮,至郑和下西洋时,船队已经很

大,很先进了。

只是从清末的1800年后,中国水师落后了。欧洲的海洋文明发端也比较早,加之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的崛起,二者结合,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海军,横行世界。而甲午海战的失利,也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现代军事学不仅研究军事气象问题,也研究以水作为军事手段以期达到阻遏敌方,消耗敌方,战胜敌人的目的。其研究内容不仅有雨、雪、霜、雾等对一般战斗及导弹发射的影响,还包括河流、水坝、海浪、潮汐、海洋潜流等对各类战舰、潜艇的影响,以及军队战时的野战安全供水等等,同时也研究新的“水攻”武器。

据认为,美国运用气象武器的历史比较悠久,早在冷战时期,就曾经利用在古巴周边国家进行人工降雨造成了古巴的连续干旱;也曾在越战时期,利用人工降雨来造成大面积泥泞,以封锁交通。

近现代与水相关的重大战例还有: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决战前夜,忽降大雨,田野、道路泥泞一片,兵马难行。法国援军无法及时赶到,致使拿破仑军队大败;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进攻,不惜牺牲千万百姓,炸开黄河花园口河堤以阻止日军进攻;中国抗战中期,日军10多万人从缅甸进攻云南,被怒江天险阻于滇西一隅,日军官兵患瘴气疫病,使半数军人不战而亡;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专门发明了一种能在夜间轰炸水库的特重型炸弹,用于轰炸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水库;1941年的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从莫斯科水库里排放了大量的水,使德军坦克无法通过,延缓了德军的进攻;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出动多批次上百架的轰炸机,疯狂轰炸朝鲜北部的多座水库,引起洪水泛滥,中朝军队也曾放开水库闸门,以水流阻挡美军的进攻,等等。

前苏联甚至还拍了一部涉及“水攻”的电影《匪巢探密》,描写卫国战争期间,苏军侦察员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得到了德军阴谋在苏军装甲部队经过森林低地时炸毁河堤的作战计划。“注意,请注意!所有听到我广播的苏联电台请注意,19日,非常准确的19日,苏联军队不要进入格鲁赫森林地区,德军将用水淹没整个森林!蓄水位置是……”这是美貌勇敢的苏军女指挥官莫洛兹大尉不惜暴露和牺牲自己,利用敌人的电台向苏方发出的明语报告!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实际上,人类在战争中对于水的利用还远不止用水“冲击”敌人。1939年发生于中蒙边界的日苏之间的诺门坎战役,日军眼见取胜无望,便卑鄙地向河水中投放致命细菌,企图使苏军感染恶性传染病,结果由于使用不当,而使自己士兵感染,死伤数千。后来,在二次大战的欧洲战场上,交战双方的军队分别在后撤时,填井挖沟,污染水源,以给对方军队造成吃水困难,于是,盟军便催生了给水部队和新型的野战给水设备。

以上史实说明,战争与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利用水,人类不仅可以发明“水攻”战术,也同时利用水作为防御手段。最后,利用海洋之水,人类把战争引向更为广阔的海面,并将这种海战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上的中途岛之战和大西洋中的潜水艇之战等,其规模和惨烈程度,都不亚于陆地上的战争。

可以说,离开了水,人类不可以生存;离开了水,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今更有人预言,未来,人类会为了争夺水资源而开展战争!这到底是人类的悲哀,还是水的悲哀?我们无法回答。

(本文选自即将出版的《人类与水》,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 鉴真成功东渡地寻踪

俞慧军

樱花烂漫的时节，我站在古黄泗浦鉴真大师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的启航地。春风中，漫步在以鉴真第六次东渡启航地而命名的“东渡苑”鹅卵石铺陈的林荫道上，寻觅魂系扶桑的千年思绪：丛丛绿树、簇簇鲜花相拥的廊道上、溪水边、草丛中，处处覆盖着中日友人千年寻踪的足迹。眼前这一株株、一片片樱花树，连结着鉴真大师东渡皈依弘法的济世情缘。“春辉满天樱，融雪温馨照世界，杖莫如信也。”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时曾表示：“信义就是我施政的根本。”2007年4月12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日本访问期间也以汉俳形式表达了感想：“和风化细雨，樱花吐艳迎朋友，冬去春来早。”正所谓，汉俳巧联句，文短情长心愿同，友好永接力。



鉴真大和尚标准画像

走进东渡苑鉴真纪念馆，眼前跳跃出一个个鲜活的中日友好使者的身影和一片片华灿的思想。中日两国的正式交往，是在公元1世纪中叶。当时，九州北部的倭奴国王派使节来到东汉的首府洛阳，受到朝廷的友好接待，光武帝刘秀赠日本国王一颗汉倭奴国王的金

印。这颗金印1784年被日本福冈县志和岛一个农民在田野里挖出。真是无独有偶，1986年，鉴真出生地扬州郊区的农民也在田间捡到一颗金印，与日本的那颗金印一模一样，这是中日友好史的一个宝贵印证。三国时期，中国两次派使臣前往日本。到了南北朝，日本先后10余次派使臣到中国，吸取中国先进的文化，中国迁往日本的人数多至数千。到了隋、唐两代，日本不断派遣使节、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日本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热切要求与唐代中国建立亲善关系。而鉴真生活的时代，中国正进入鼎盛时期，日本也进入历史上有名的奈良时代，其间中日文化形成交流的高潮。鉴真是唐代大德高僧，在大明寺传戒授律期间，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等邀请，发愿东渡。历时10年，6次东渡，5次失败。公元753年（唐天宝12年）的一个冬日，鉴真乘坐遣唐使船，在古黄泗浦（今张家港市塘桥镇境内一个长江入海口）第6次赴日本，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于是年12月26日到达日本大宰府。鉴真大师在66岁的花甲之年终圆东渡扶桑的夙愿。

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花香，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东渡苑这片姹紫嫣红的福地，思想之鸟的翼翅飞过千年屏障，穿越历史风雨，翱翔于东渡扶桑这一首首蕴藏着一个个壮怀激烈、名垂千古的传奇史诗中。我踟躕于东渡苑每一处景点，东渡苑一草一木都驿动着鉴真大师的风骨与神韵。鉴真纪念馆占地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70平方米。细步走近形仪端庄、神态安详的鉴真大师坐像前，我虔诚地与拜谒的人们一起向这位世人敬仰的大师塑像顶礼膜拜，耳畔仿佛传来鉴真在失去

心爱的同伴荣誉、祥彦后义无反顾东渡扶桑的宏音：“东渡未成，心愿未了，岂能享福求安！”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鉴真纪念馆，蓦然回首，我发现绿树掩映之中的鉴真纪念馆在明媚的春光里愈加英姿勃发，熠熠生辉。倘若鉴真大师在天之灵有知，也会为第6次东渡成功的福地栽一株樱花树抑或一棵翠柏。而春意阑珊之中的片片绿叶，层层绿阴，仿佛正是人类追求的自由与和平的永恒春光。漫步东渡桥，桥东西两侧均竖有一碑亭，苍松翠柏，郁郁苍苍。桥东堍南侧一碑亭，正面刻有唐代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吕在黄泗浦起航时创作的一首诗：“万里长空色绀青，举头壹望起乡情。遥怀今夕春日野，叁笠山巅皓月升。”桥北面诗碑的正面刻有郭沫若先生为鉴真圆寂1200周年纪念题诗：“鉴真盲目航东渡，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走过东渡桥，正前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和草地相连的是蔚蓝的江湾，江水中是一艘仿古的鉴真东渡航船，而江湾的对面是花团锦簇的绿树、花草、竹林、农舍。

从东渡桥往西拾级而下，便是经幢亭，是鉴真第六次东渡启航处，幢柱刻有“古黄泗浦”四字。而经幢亭南侧的500多株樱花树，正蓓蕾初放，点点

绯红，若云若火，如霞似血，这使我联想起此刻的日本东京，正值樱花烂漫的时节，翠玉似的樱叶，红玛瑙似的樱花，美丽的岛国，正传扬着中日友好千年的佳话。我对樱花的原始印象，便是学生时代听老师朗读鲁迅的《藤野先生》：“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年岁渐长，方知日本是樱花之国，每年春天，东京云霞处处，游人如织；在日本街头，《樱花》的古谣随风飘荡：“樱花啊，樱花，花朵烂漫似云霞，花香四溢满天涯……”樱花树，成为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象征。而鉴真大师百折不挠、弘法济民的思想之魂、精神之魂恰如樱花一样盛开在日本的奈良、上野、东京……在世世代代的日本国民中万古流芳。而今，在鉴真大师第6次东渡成功的启航地张家港，正精彩诠释着东渡精神的时代篇章：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乐施好善的慈爱精神。这也许正是鉴真东渡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这也许正是发掘东渡文化的思想之源，这也许正是东渡魂魂牵梦萦的文化归依！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

（接65页）

①⑦脱脱、阿鲁图：《宋史·卷三百三十二列传第九十一滕元发李师中陆诜赵鼎孙路游师雄穆衍》，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①⑧王希隆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四·重修皋兰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①⑨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⑩【乾隆】《皋兰县志》，卷十八《碑记》，

②⑪王希隆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四·重修皋兰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②⑫《太祖实录》卷41。

②⑬《太祖实录》卷47。

②⑭《太祖实录》卷50。

②⑮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辞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页。

②⑯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12页。

②⑰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页。

②⑱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8472页。

②⑲《大明安宁堡神庙记》，碑文

③⑩《杨一清集》卷五《巡抚类》，北京：中华书局

③⑪《杨一清集》卷五《巡抚类》，北京：中华书局

③⑫《庄浪汇纪》，手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③⑬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72页。

③⑭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辞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 古寺古台忆古人

程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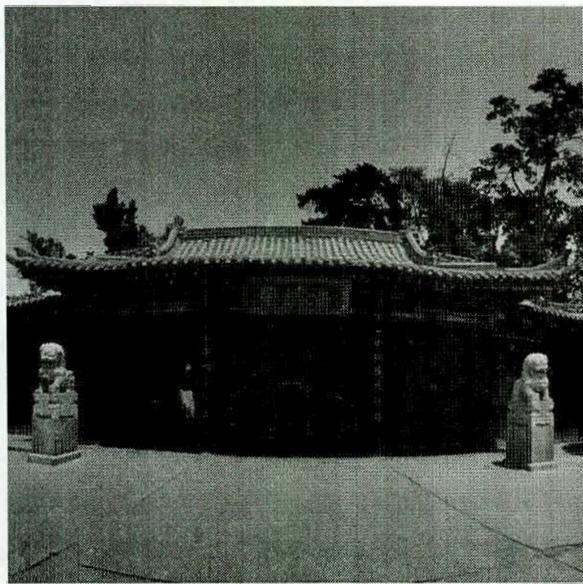
凉州城北有海藏寺，褐瓦丹垣，殿宇森然，是河西大地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有“梵宫之冠”之称。据传，寺庙曾是宋元之际的藏传佛教大德高僧萨迦·班智达为蒙古成吉思汗之孙“凉州王”阔端治病的地方。“班智达”藏语意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后世将萨迦·班智达尊称为萨班。此处有一眼水井，相传为萨班开掘，井底之水和西藏布达拉宫的龙王潭相通，喝了井中之水可免灾消难，后世称为“药泉井”。“凉州王”阔端顽疾痊愈之后，极为高兴，颁令在萨班为自己治病的地方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寺庙建成，萨班以《大藏经·龙树菩萨传》中关于“佛教大乘经典藏在大海内龙宫之中”的记载而取名为“海藏寺”。名僧创寺，药井愈病，海藏寺声名鹊起，信众云集，佛事隆盛。特别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凉州就有“逛海藏，消百

病”之俗，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相传萨班开掘的“药泉井”至今犹在，位于寺庙后部灵均台上的无量殿前东侧。原来石砌的井沿高出台面约四十公分，裸露于台上。游人伏于井沿即可在澄澈的井水里映照出自己清晰的影子。后来，药泉井上面修建起一座小小的殿阁，将药泉井围在里面，并在殿阁内药泉井后面放置了“药王菩萨”的塑像。井沿也砌高至一米左右，只留一道殿门供游客进入取水饮用。殿门上有一块牌匾，上书“药泉”二字。

每到海藏寺，我都要快快登上灵均台，爬在药泉井的沿壁上，放下辘轳上系着的木制小桶，打成一桶药泉井水，饮一口，沁人心脾，顿感神定气清。而后，沿着石块拼砌而成的甬道徜徉在古老的大雄宝殿、三圣殿和地藏殿之间，我的目光总是细细地端详着那些已被风雨侵蚀了的石阶廊柱、檐头飞甍，想到这里所有的角落都曾留存着一代高僧萨班、一代雄主阔端的遗迹，心头总是沉甸甸的。

然而，在大雄宝殿前方东部的空地上，我看到一块用透明的钢化玻璃罩着的石碑，上书《成化御敕修海藏寺碑记》，始知面前的石阶廊柱、檐头飞甍已非萨班、阔端时期的遗迹。元末明初，海藏寺毁于兵燹。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明宪宗朱见深身边的一位极受宠信的太监来到凉州，但见海藏湖畔只有残壁断垣而已，当闻知“此古海藏寺之遗址也”，极为感佩，慨然应诺“是守之兴，我当任之”，于是倡议重新修建。这位著名的太监就是张睿。史载明宪宗朱见深当政时宠信太监，使其监督军务，提督京营，所以才有张睿抵凉监军的史事。据《碑记》载，“（张公）以能声闻于上。至凉数年，羌不敢轻犯。”说明张睿即既有权势又有军事才能，



海藏寺

在地方军政之中威望很高。所以，张睿重修海藏寺的倡议，立时得到上级官员的鼎力支持与白金资助。自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九日至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张睿召集工匠百姓，历经四年，使凋敝衰落的海藏寺又重放异彩，并大大扩张，成为河西规模最为宏大的寺院。张睿还奏请宪宗皇帝赐名为“清化禅寺”。如今，“清化禅寺”的匾额仍挂在寺前木构牌楼东北角的斗拱上。于是，张睿亲手点燃的香炷冒出的青烟又氤氲在古刹梵宫外的柳树的枝叶间了。海藏寺香火再盛，张睿亲手点亮了“海藏烟柳”的神奇景象。

海藏寺重修竣工，甘肃行太仆卿“梅江居士”钱璉亲自撰写了《成化御敕修海藏寺碑记》，而后，陕西承宣布政史司右参议刘宣亲笔书丹，勒石成碑，置于大雄宝殿前方东部的空地上。《碑记》清晰地记载道：“（张）公，七闽建安人，名睿，字希承。”“七闽”指古代福建，“建安”即福建省建安郡，郡府驻地在今建瓯市。近年来，河西名刹海藏寺佛事日隆，香火旺盛，普通的凉州吏民根本也不会想到，这所名僧所创的名寺能够再度佛光披露，满照人间，东南之滨的福建建瓯籍大太监张睿功莫大焉！

## 二

有一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日，我和兰州老友来到海藏寺。传说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显世的降生之日，后来演变为古代的浴佛节，亦称洗佛节或佛诞节。凉州民间也在这一天有上莲花山拜观音求子以及到海藏寺朝拜药王的活动。

老友是大学里研究民族宗教学的教授，对凉州风情民俗颇为知晓。在药泉井前，我陪着老友排进游人敬香祈水的长长的队伍中，至小殿门口，也虔诚地点燃三柱香，心中默默祝祷一番，叩首敬香，然后端起小和尚从小木桶里盛上的一小碗“圣水”，饮下去身心顿感清凉澄静。而后二人携手来到无量殿之后，凭台远观，凉州城北乡野尽收眼底。凉州谚云“四月八，麦子盖住黑老鸦”，果不其然，但见万里平畴，禾黍青碧，令人心旷神怡。老友则风雅地吟出“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家停”的诗句。

绕台一周再次来到殿门前，殿门西侧有一棵

郁郁葱葱的苍天古槐，古槐浓密的丫枝下矗立着一块高约一米、宽约四十公分的石碑。老友懵立碑前，仔细端详，但见碑文极简单，右侧小字竖写“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之古台”，中间大字竖写碑之主题“晋筑灵钧台”，左侧小字竖写落款“安肃兵备使者摄甘凉道事廷栋立”。我说，这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凉道道台所立之碑，证明灵钧台为前凉王张茂所筑。老友则说，既然张茂筑灵钧台在前，萨班建海藏寺在后，灵钧台的历史已有一千六百多年，而海藏寺的历史不过六百年，为何萨班建寺后却要在高达八米的灵钧台上开掘这口水井，何不在台下掘井更加省事省功呢？老友的疑问令我们陷入沉思。我推测说，既然是“圣井”，可能早就藏于台下，萨班受佛祖神示，掘开台面，其井自见，也未可知。没想到我的一番“推测”，竟令老友颌首称是。

但是，这块被烟熏火燎过的难辨尊容的《晋筑灵钧台》石碑，倒让我想起了前凉张茂筑台的故事。《晋书·张茂传》称，张茂修筑灵钧台的决心非常大，曾不顾朝臣非难，先后两度启动了筑台工程。太兴四年（321年）二月，张茂修筑灵钧台，周围有八十多个城墙，地基有九仞高。但是，武陵人阎曾夜晚假称张茂之父张轨前来质问责骂，坚决反对。太府主簿马觔等人也劝谏张茂不宜大兴劳役修亭筑台。张茂迫于朝中反对势力，就暂时停止了已经筑成一半的灵钧台工程。然而，未至两年，太宁元年（323年）秋天张茂再次启动了修筑灵钧台的工程。别驾吴绍仍以劳民伤财为由再次带人劝谏。张茂置之不理，执意颁令修台。

《晋书·张茂传》称“茂雅有志节，能断大事”。张茂为何要力排众议，决心修筑灵钧台呢？

张茂筑台的前一年，即太兴三年（320年），前凉国主张寔被部下阎沙、赵卯等人杀害，国人推举张茂为大都督、凉州牧。张茂继任后虽然诛杀了阎沙及其党羽数百人，但国内政局仍不稳定。而国外前赵刘曜多次发兵攻掠前凉国土，危机四伏。在内忧外患的危难局势下，张茂想通过修筑灵钧台来开拓前凉僵化的政治和社会时局。在危难之中通过修筑高台向国人树立前凉国的威信和尊严，登

高远望、眼界开阔,具有振兴士气的精神作用。退一步讲,即使兵败危亡之际,仍可利用高台本身的防潮和通风功效屯积物资,组织兵力做好最有效的战略防御防备工作。可叹举国之境无一人能够理解张茂的良苦用心。张茂决定“独断专行”,指出:“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系常言,以太平之理责人于迍邐之世!”一席话令众臣无言以对。数月后,气势磅礴的灵钧古台便矗立在凉州大地上了。灵钧台的修筑,确实为危难中的前凉帝国带来了福祉。太兴四年(321年)十二月,灵钧台的修筑竣工仅月余,张茂就命令将军韩璞率领部众进攻前赵刘曜,一举攻取了陇西、南安地区,设置秦州。次年,刘曜派部将刘咸在冀城进攻韩璞,张茂任陈珍为平虏护军,率步骑一千八百救援韩璞,刘曜大兵再次溃败。张茂成功收复了南安一带曾经丧失了的大片国土,前凉国力为之大振。

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如今,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凉州吏民很难从诗词歌赋中感受到张茂的功勋事迹,而海藏寺里的这座“雄峙无际”的古台却能让人感知到这位前凉国主的雄才大略。

### 三

灵均台上的无量殿建筑宏伟、风格古朴。殿内十六个描金大柱上均书立粉对联,笔力浑茁雄健,文词清丽。最能攫人双目的是中间立柱上的那付对联,联云:“阙影身池塘,足下龟蛇低戏水;台灵高坎位,座旁旗剑上凌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在灵钧台上观赏海藏寺景色的疏廓辽阔之致。

乾隆元年(1736年)无量殿更名为“藏经阁”,从此名扬天下。《海藏寺藏经阁记》碑文详尽地叙说了更名缘由。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海藏寺经过重修,规模更为宏大,香火日盛一日。雍正年间,海藏寺主持际善法师望着修葺一新的寺院,慨叹寺内所存经卷数量单薄、形容陈旧。于是弘誓大愿,拿着钵盂,拄着法杖,乞斋东行,前往京师请经。际善法师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关山几万重”的东行之路上寂寞地用脚丈量了八年,终于徒步抵达京师。凉州驻京按察使副使蒋洞很受感动,就通过在京的叔父蒋廷锡在皇上面前“玉成周旋”。蒋

廷锡时任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一出面,连皇上也被感动。特命朝廷赐给海藏寺明版藏经全部,计六千八百二十卷。雍正皇帝敕令蒋廷锡叔侄以及宁远大将军、太子太保、总理川陕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的岳钟琪三人,施银九百二十两,作为际善返回凉州的盘缠。际善法师用一匹白马将这批经卷驮回藏寺,供奉在灵均台上的无量殿内,无量殿遂更名为“藏经阁”。《海藏寺藏经阁记》记载了际善法师抵京取经的这一壮举——

有际善法师者,瞻金容之辉焕,慨妙法之无闻,於是发弘愿:一盂一钵,策杖孤征,南探越海,北涉燕都,冲风冒雪,八载於兹。前任观察蒋公讳洞者,心鉴其诚,先容於阿叔中堂,廷锡公玉成周旋,祈请三藏真文凡六千八百二十卷。证果有因,一任黄尘扑面;善缘不偶,好令白马驮归。行自如之视非梦。微言广被,醒众姓於迷途;遗训遐宣,布天花於边末。爰藏宝阁,祖邱重光。

《海藏寺藏经阁记》碑的撰文和书法均为时任甘肃凉庄道的军务大臣郭朝祚。郭朝祚,号硕斋,山西汾州人。乾隆元年(1736年)前任武威凉庄道、驿传道等职共历十年之多。郭朝祚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深受邑人拥戴。凉州吏民亲切地称之为“郭老佛”。郭朝祚工于书画,书法尤精。凉州大云寺钟鼓楼上迄今悬有其书法匾额一块,上书“慈海鲸音”四字,书于乾隆九年(1745年)九月,其字苍劲雄浑,笔力天成。佛经是镇寺之宝,在庙宇里的地位至高无上。际善法师历经千辛万苦赴京师取经归来,郭朝祚感于“瞻盛事之难逢,喜福缘之有庆”,便在存放经书的无量殿的正门檐下悬一匾额,亲笔书写了“藏经阁”三字。而后亲笔撰文书写了《海藏寺藏经阁记》,命刻工镌石为碑,立于无量殿之侧,弘扬际善法师“微言广被,醒众姓於迷途;遗训遐宣,布天花於边末”的大功大德。

凉州邑民因为《海藏寺藏经阁记》而记住了际善,记住了这位祖籍青海河湟的大德高僧。汾州人郭朝祚也因《海藏寺藏经阁记》而名垂青史。身为奉政大夫分守陕西甘肃凉庄道的郭大人,亲笔撰写匾额,并用行楷书写碑文,体现了一位地方官员

重视凉州历史和佛教文化的可贵精神。时光悠悠，睹物思人，际善法师与郭朝祚对于千年古刹的善缘将与普度众生的佛教经义一起流传后世！阿弥陀佛！

#### 四

海藏寺东侧有河名曰海藏河，河水清冽，细涛流淙。海藏河流经海藏寺，形成天然镜湖，沿湖林木葱郁，芳草如茵，游鱼溪流，禽鸟和鸣，历为古代凉州天然游览胜地。夏日清晨，寺庙东湖之畔常有青烟袅袅而上，氤氲于白杨垂柳之间，蕴郁缥缈，给海藏古刹平添一种神奇绝妙的气氛。多年以来，“海藏烟柳”历为凉州八景之一。所以，海藏寺也成为凉州文人操琴煮酒、酬唱赋诗的最佳场所。而且，煌煌六千八百二十卷经书收存于灵钧台藏经阁，更使海藏寺遐迩有名。文人墨客来到凉州，无不以一睹海藏寺风采为之风愿。乾隆年间著名学者、诗人沈翔从京师抵达凉州，写下了“广泽断流寻漪野，古台雕额指灵钧”（《凉州怀古·其八》）的诗句。

被誉为“凉州魁杰”的清代著名诗人、学者张澍对海藏寺情有独钟，多次携友游览海藏寺，赋诗多首。特别是写于嘉庆五年（1800年）的《游海藏寺》一诗，历为他人称道——

缕缕清泉向北流，招提切汉惯来游。不询僧腊嫌饶舌，久读碑文觉渴喉。曲沼嘉鱼跳拨刹，高松怪鸟叫钩璠。此间消夏真佳境，况有溪边卖酒楼。

是年，张澍二十五岁，正是其进京参加科考顺利成为进士的第二年。张澍刚刚从京师返回凉州之后，兴奋难抑，便携友再游海藏寺，并因之乘兴赋诗。“曲沼嘉鱼跳拨刹，高松怪鸟叫钩璠”的诗句对清凉幽美的海藏寺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不仅如此，张澍晚年寓居西安时又写了一首《忆海藏寺》。诗中有“三月妍暖游人多，冠盖车马纷如蚁”等诗句，回忆海藏寺外暮春三月美丽的景色和车水马龙的盛况，特别是“安得飞轮返宇园，寻得捷推击袖子”的诗句，强烈地表现了诗人思念家乡凉州的深厚感情。

文人聚会，焉能无酒。张澍《游海藏寺》中便有“此间消夏真佳境，况有溪边卖酒楼”欣喜之情。在

《忆海藏寺》中再次写道“酒家帘外燕子飞，红白花开桃与李”，可以想见当年诗友相聚，列坐其次，曲水流觞，兴会空前的盛大场面。无独有偶，凉州籍著名历史学家，诗人李铭汉携诸友来到海藏寺，也写下了诗酒酬唱的风雅诗句——

灵钧台畔草萋萋，欲话前朝夕照低。萧吹紫玉人何处，帘挂真珠苑已迷。乘兴来看新柳绿，多情休问暮鸦啼。前村剩有春醪卖，遮莫沽来醉画溪。（《立夏日偕友人郊游·其二》）

夕阳西下，灵钧古台，柳绿草萋，清新明快的风景反衬诗人怀古悼今的意绪。然而，“前村剩有春醪卖，遮莫沽来醉画溪”，则点出了诗人的旷达豪迈之态，“饮春醪”“醉画溪”，极言诗人墨客沉溺于风光如画的海藏美景之中的喜乐之情。遥想昔日海藏湖，那一亭、那一阁、那一桥、那一木，无不见证了本邑文人墨客兴会一堂、诗酒酬唱的隆盛画面，令人油然而生心翔神往之念。

#### 五

凉州著名学者、诗人张澍歿世已逾五十多年，历史学家李铭汉也已辞世十多年之后，有一位凉州后生段永恩也来到了海藏寺。依然是碧天苍穹、清溪流淙的优美风光，依然是双峰夕照、古木凌空



《晋筑灵钧台》石碑

的绝妙景致,依然牵动了凉州游子的万斛诗情,于是段永恩写下一阕《登灵钧台》——

依旧灵钧结构工,溪边流水绕台东。双峰宝塔孤城里,一角危楼夕照中。拱翠梯山高入座,参天松柏秀凌空;登临最是春秋日,才有风光便不同。

凉州后生段永恩颇有才气,光绪二十七年(1901),参加县试中了晚清时代最末两届的举人。民国年间还出任了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知事。民国五年(1916年)曾把凉州进士郭楷的《梦雪草堂诗稿》和乾隆年间因文字狱罹祸的凉州才子诗人李蕴芳的《醉雪庵遗草》合为《姑臧郭李二家诗草》,在兰州刊行传世,并曾在家乡编纂《武威段氏族谱》等,对凉州历史文化遗产和传播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世事苍桑,人物两非。虽然古寺犹在,风物依然,但置身清末民初的凉州才子段永恩,其游历海藏寺的心胸襟襟俨然没有了大清乾嘉年间诗人学者的豪情逸气。亡国之音哀以思,故此笔下的灵钧台也就染上了苍凉和寥落之气。“双峰宝塔孤城里,一角危楼夕照中”等诗句,散发着前朝旧臣的衰弱悲凉气息。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后,河西古刹海藏寺再度焕发发生机。一九九二年三月,兰州籍缅甸华侨傅凤英居士向海藏寺捐赠了两尊玉佛和日本大正版大藏经,又成了今日海藏寺的镇寺之宝。是年九月,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来到海藏寺,游历梵宫殿宇,穿行古树古台,但见海藏寺香火紫烟,袅袅寺间。赵老兴致大增,欣然赋诗《海藏寺》——

由来圣哲经行处,智慧慈悲才华行。鲁殿灵光存海藏,还期善护免侵袭。

赵朴初还为海藏寺大雄宝殿题写了“大慈大悲”四字匾额,又为无量殿重新题写了“藏经阁”的牌匾,而后离开了凉州。八年后,即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噩耗传来,海藏寺僧众为大师举行了虔诚的经教祈祷仪式。是日,古台肃穆,廊阁幽静。微风偶来,林壑喟啼,梵铃叮呤,发出阵阵悲鸣之声。

## 六

斯人都已归黄土,明月依然海藏寺。今日海藏,依然游人如织,人们大多不是去感悟历史的苍桑和佛教的悲悯,只是去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在自然闲适中寻找一些天人合一的和谐与默契而已。晴阳之下,银子似的阳光平静地流泻在澄静的海藏湖上,反射出的七彩光线交织出一道道旖旎的光影。杨柳婀娜多姿,树影间轻舟浅碧,和着声声鸟鸣,将海藏寺划入了凉州文人恬淡隽永的梦境。虽然湖光倒影里不见了古凉州的双峰宝塔和高阁危楼。但灵钧台东面的海藏河仍在四季里呢喃絮语,耸立在清波碧涛之间那些亭台楼阁、幔亭廊桥仍在慢慢诉说着古老岁月里均已逝去的那些圣哲贤人和大德居士的佚事,默默地感念他们对海藏寺的恩遇和仁缘。东晋张茂、元初萨班,明代张睿,清代际善、郭朝祚、沈翔、张澍、李铭汉,还有近人段永恩和赵朴初,他们,连同他们的真经佛心、诗文碑铭、遗迹墨宝,将和海藏寺的苍松翠柏、古井古台一道,汇入到海藏寺风雨六百年的历史烟云之中。

此文写成一年后,在《天马诗刊》上读到了本邑诗词名家鲁放的《望远行·访灵钧台》——

萋萋野草,名台翳,往日高塚残敝。蠹梁颓柱,我辈无觅,原址略存痕记。雨打风剥,昔貌弃摇松翠,楼绕小溪无继。废游踪,何日危楼再峙?民冀,重现古台旖丽,引客谒、骤兴经济。盛世景幽,逾唐越宋,山欢水笑群裕。千里凉州秀,遗迹林立,远近游人来憩。带裔登楼眺,雄峙无际!

感于鲁老此词雄奇豪放,逾越古今,盛赞凉州海藏寺内灵钧台“雄峙无际”的壮丽之景。又想起昔日和友人登临灵钧台的前尘往事,也不嫌拙陋,戏填一阕《江城子·登灵钧台》以和之——

姑臧城外海藏寺,林荫路,碧玉湖。东风过处,烟柳参差舞。灵钧台上且少驻,倚古木,听禅语。锦瑟华年荏苒度,济世志,谁人诉?怅望天宇,孤云悠闲去。休言人生难脱俗,陶然居,一床书。

(作者单位:武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 《嘉峪关市志》（1978—2010）评审会召开

为贯彻落实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地方志书“一评三审”制度，嘉峪关市分三个层次召开了《嘉峪关市志》（1978—2010）评审会。3月16日，召开市志编纂委员会委员评审会，39名市志编委会委员对志稿进行了评议；3月19日，召开周边市县区志主编座谈会，邀请酒泉市、张掖市、武威市、金昌市、肃州区、金川区、金塔县、瓜州县志办主任及部分专家学者40多人再次评议志稿；5月29日，市志编委会再次召开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评审会，并邀请省史志办领导参加会议。嘉峪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市委书记郑亚军，嘉峪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市长柳鹏，省史志办副主任钱旭、省史志办市县志指导处处长贺红梅及其他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评审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嘉峪关市志办主任杨生宝关于《嘉峪关市志》编纂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对志稿编纂发表了评审意见。与会人员指出，《嘉峪关市志》的编纂政治观点正确、篇目设置基本合理、收录资料翔实可靠、语言文字朴实，但还存在照片和人物排序混乱、文字不规范、人物简介要素不全等问题。希望通过此次评审会，认真汲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力争把《嘉峪关市志》打造成一部精品佳志。



明月清风夜

马西园书画作品

